

被偷走的房间



罗贝尔·卡萨诺瓦

小说



简介

1920年秋,巴黎。热爱西方艺术的日本贵族松方幸次郎购得梵高的《阿尔勒的卧室》。这幅杰出的画作丰富了他数十年来怀着对欧洲艺术的热爱与敬意所建立起的非凡收藏。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彻底改变这批藏品的命运。1944年,在法国临时政府的办公室里,策划了现代史上最为精密的艺术掠夺之一。八十年后,一位怀抱正义渴望的教授皮埃尔·贝尔捷发现了这场掠夺背后隐藏的机制。仅凭一己之志,他向法国外交机器发起了一场艰巨的斗争。这部取材于真实事件的小说所讲述的松方事件表明,正义的衡量标准不仅在于获得具体的归还,更在于公众讨论的逐步转变。有时候,坚持不懈地提出正确的问题,比立即得到正确的答案更为重要。

关于作者

罗贝尔·卡萨诺瓦是荣誉高级中学正教授,法国文人协会(Société des Gens de Lettres)会员。作为一名醉心于艺术收藏史的法学家,他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国家对艺术品的侵占问题。他担任非政府组织“国际归还”(International Restitutions)主席,并就此课题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



被盗的房间

罗伯特·卡萨诺瓦

casanovas@hotmail.com

法定缴存日期：2025年9月—电子书及印刷版

© 2025 Casanovas. 版权所有。

ISBN：978-24-889994-8-9

www.international-restitutions.org

封面：文森特·梵高油画《阿尔勒的卧室》



法语版

第二版（修订校订版）

声明

这部历史小说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虚构作品。已故人物的姓名予以保留，在世人物的姓名则有所更改。为叙事连贯之需要，书中还加入了一些虚构人物。书中提及的国际机构运作机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来文程序）皆经过简化处理。

原著以法语写成，现已译为多种外语。译本中可能存在语言错误、误译或不够精确之处。

目录

序幕

第一章：乌云密布

第二章：1944年阴谋

第三章：钳制渐紧

第四章：秘密谈判

第五章：归还的闹剧

第六章：遗忘的岁月

第七章：斗争重燃

第八章：国际战役

第九章：法国的反应

第十章：立法僵局

第十一章：漫长的战役

尾声

被盗的房间

序幕

巴黎，1920年秋

十月的巴黎笼罩在一片低垂潮湿的天空之下。松方幸次郎竖起他钟爱的英式三件套大衣的领子，显得额外帅气。他放慢脚步，在花园里寻求片刻宁静，为即将到来的重要约会做好准备。

他的人生轨迹颇为奇特。他是日本前首相之子，凭借造船业积累了巨额财富，毕业于耶鲁大学……然而，他却像个孩子进了糖果店一样，在巴黎的画廊里流连忘返。他的母亲永远也无法理解他的这份热情。“你为何对这些西方蛮夷的艺术感兴趣？”她曾这样问他，语气中带着明治时代贵族女性那种不自觉的残酷——她们懂得如挥动折扇般，轻巧地施以羞辱。她至死都未曾意识到，他或许是对的，也未曾明白，他的收藏正是他化解内心撕裂之矛盾的方式：既是身处日益西化世界中的日本人，又是一个被传统美学萦绕不去的现代实业家。

他口袋里沉甸甸地装着一本红色的小笔记本，上面一丝不苟地记录着他收藏的每一件艺术品：这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的标记，他无法割舍，并通过有条不紊的积累，将自身的脆弱转化为力量。如今，他已拥有超过一千幅画作，每一处细节、每一个故事，他都烂熟于心——这种惊人的记忆力让他成为社交圈的焦点，但也让他无法忘记哪怕最轻微的失败。而今天，保罗·罗森伯格向他许诺了一件非凡之物。

拉博埃蒂街的画廊里弥漫着清漆和枯萎玫瑰的气味。罗森伯格有个习惯，喜欢在各处摆放花束，仿佛要用色彩呼应展出的画作。他既优雅又精于算计，成功地将自己真挚的品味转化为经济实力的工具。

“啊，松方先生！”商人惊呼道，“希望您今天心情愉快。”

罗森伯格脸上挂着大商人特有的迷人微笑。松方欣赏他的坦率。至少在他面前，没有丝毫虚伪。人们知道自己是来买东西的，他也清楚自己是在卖东西。这种直白的商业交易，与巴黎沙龙的虚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巴黎沙龙里，人们假装只对纯粹的艺术感兴趣。

“那就让我看看这件宝物吧。”松方回答道，几乎掩饰不住心中的焦躁。

“梵高。《阿尔勒的卧室》。第三版。”

这个名字像鞭子一样划破空气。松方感到胸口一阵紧缩。梵高……他一直对这位疯狂的荷兰人情有独钟，而这份迷恋也让他内心深处的收藏家本能感到不安。文森特身上，集中体现了松方幸次郎所极力压抑的一切：放纵、创作的疯狂、对社会评判的漠视。他笔下描绘的孤独，与一个本质上孤独的人产生了共鸣：一个实业家，他囤积艺术品，是为了填补商业无法填补的空虚。

画布静静地躺在画架上，沐浴在画廊柔和的灯光中。蓝色的墙壁，红白相间的地板，还有那张仿佛在召唤你躺下的床……松方走了过来。他并非那种会触摸画作的收藏家；不，他只是专注地凝视着。他举止间的克制既体现了他的日本式教养，也透露出一种恐惧——害怕自己的触碰会玷污他视为神圣之物的东西。艺术是他的避难所。

“他是为他母亲画的，”罗森伯格低声说道，他深知自己客户的弱点。“想象一下……文森特独自一人在圣雷米的医院里，为赋予他生命的女人画了一间简朴的房间。”

日置幸三郎——他是松方最亲近的顾问；松方身边虽聚集了众多专家，但最深奥的技术问题，他只留给艺术史学家矢代幸雄——那天也陪同在侧，轻轻清了清嗓子。日置生性低调，这既是他的天性，也是现实所迫：他凭借揣摩主人未言明的心愿的本领，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并将

出身卑微带来的自卑感，转化成了一种武器。他的忠诚里，既有真挚的感激，也夹杂着一丝精明的算计——效力于一位富有远见的人物，让他得以借他人之光，分享一份伟大。

“她拥有特别的灵魂，”他用日语说道，特意选择这种语言是为了拉近与卖家的距离。“她可以成为你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松方点了点头。他的博物馆……这个看似疯狂的梦想——为日本打开一扇通往西方艺术的窗口——揭示了他真实的自我。他游走于两个世界之间，希望通过和谐将它们调和起来。他的同胞们认为他古怪，但他们的不理解也助长了他与众不同的自豪感。松方喜欢挑战，这种热情有时甚至近乎过分的骄傲。

——你知道吗，罗森伯格，那间房间……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在京都的房间。同样的简朴，同样的对宁静的追求。梵高在寻找避难所。某种程度上，我也是。

这种坦白，对于一向沉着冷静的他来说实属罕见，揭示了这位收藏家的脆弱一面。在这位功成名就的实业家背后，隐藏着一个从未摆脱童年严苛环境阴影的受伤孩童。艺术成了他情感的语言，是他唯一允许自己流露脆弱的领域。

商人知道他已经找到了顾客。罗森伯格擅长洞察买家的心理弱点。他举止优雅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务实主义，这种务实主义模糊了愤世嫉俗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之间的界限。

—它是你的了……

他们讨价还价了一个小时。并非价格——松方完全买得起——而是细节、真伪、来源。简而言之，就是那些重要的东西。他的一丝不苟掩盖了他的焦虑。万一这次的收藏，像他以往的收藏一样，也无法填补他内心的空虚呢？但现在反悔已经太晚了。他对艺术的渴求已近乎成瘾，这是他赋予人生意义的唯一途径，因为社会上的成功无法完全满足他的这种需求。

当晚，在位于第七区的公寓里，松方认真地在笔记本上写道：

《阿尔勒的艺术家卧室》，文森特·梵高，1889年，布面油画，57.3 × 73.5厘米。1920年10月15日购自保罗·罗森伯格。这幅画作长久以来一直萦绕在我的梦中。

他一时兴起，随口加了最后那几句话。他素来不习惯在清单上流露情感。但这幅画却以不同的方式触动了他。或许画中描绘的孤独与他内心的孤独遥相呼应，或许画中的坦诚与他作为一位都市上流人士所经历的痛苦而复杂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梵高成功地将他的疯狂转化为优雅；他试图将他的忧郁转化为一系列作品。

他或许不会想到，自己寥寥几笔，竟开启了一段超越他个人生命的故事。一位饱受折磨的艺术家笔下宁静的房间，竟会成为一场激烈法律战的焦点。各国政府、律师与继承人，将为了这幅描绘着动人朴素之境的画作，展开长达数年的争夺。历史的讽刺之处在于，一个寻求平衡的人，竟会成为一场冲突的主角，而这场冲突也将揭露文化外交中最卑劣的欲望。

松方放下笔，凝视着窗外巴黎的灯光。明天，他还要继续他的寻宝之旅。他总是渴望为这幅拼图添上一块，总是疯狂地追求着一个总是与他擦肩而过的审美理想。他总是坚信自己正在为未来创造一些重要的东西。他是对的，但并非以他想象的方式。他个人的探索最终却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冲突，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他对和解的渴望，最终却暴露了民族国家最丑陋的占有欲。

然而，历史并不会顾及良好的初衷。

第一章：乌云密布

伦敦，1939年8月初

日置幸三郎与潘泰克尼康仓储公司的经理有约。他提前到达，在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等候，办公室里弥漫着霉味和蜂蜡味。

这种气味让他想起了京都的古老寺庙——考虑到他在伦敦的流亡生活切断了他与精神根源的联系，这种联想令人不安。

透过肮脏的窗户，伦敦在雾气中苏醒。匆匆忙忙的上班族，报贩们高声叫卖着头条新闻：“希特勒拒绝一切妥协！”仿佛还有人对此抱有怀疑似的。种种迹象令他感到沉重。几个月来，他早已察觉到其他人视而不见的警示信号，而这种清醒的悲观情绪正逐渐将他与那些依然乐观的同代人隔离开来。

等待的时间很长，足足二十分钟。

他回想起1896年与松方幸次郎的初次会面。当时的他，只是神户一家银行的一名普通职员，而这位年轻的贵族却扬言要革新日本的艺术。那时，他不仅被这个计划的宏伟构想所吸引，更被其出身卑微所带来的社会晋升希望所打动。“日置……”在会面中，他曾对松方幸次郎说，“我们将把西方的美带给我们的人民。”然而，这

个梦想却险些葬身于战火之中，而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也将随之崩塌。

他趁着这片刻的空隙，从口袋里掏出一封几天前收到的信。他的手微微颤抖——并非因为年事已高，他才六十四岁——而是因为信中的文字他已经反复读过十多遍。这份焦虑让他回想起早年在日本的经历，那时父亲教他书法之美。 “*手抖，说明内心充满疑虑，*”父亲常这样告诉他。为松方家效力四十二年，他从未感到如此迷茫。

他只能看到松方用他熟稔的漂亮笔迹写下的字：“做好最坏的打算，我忠实的朋友。军方已经掌权。我们的国家正在滑向深渊，我们的收藏品也可能随之沉沦。”

与主人的这种亲密关系一直让他感到受宠若惊，这个卑微的职员竟然成了日本最有权势的人之一的亲信。但现在，这种关系却让他背负了沉重的责任，而他从未想过要承担这些责任。

那是什么意思？无论日置如何反复琢磨这句话，都无法让他感到安心。他很了解松方，知道他从不夸大其词。如果松方说的是深渊，那就意味着深渊已经存在了。

一阵轻柔的敲门声将他从沉思中拉了出来。

“是日置先生吗？我是莫里森。抱歉来晚了，我的出租车抛锚了。”

詹姆斯·莫里森经营潘泰克尼康公司……多久了？二十五年？更久？总之，他是个很可靠的人。他是那种说话时会直视你眼睛的英国人。和他圈子里的许多人一样，他也是一名共济会成员。他是英格兰联合总会成员，曾任伦敦市901号分会会长，人脉广泛，消息灵通。日置很看重他。莫里森对待日本藏品如同对待皇室私人收藏一般尊重。要知道，他的一些同行对待“异国”客户时可没那么尊重。

“别放在心上，车子有时候就是爱闹脾气。我正要……”

“抱歉打断您一下，但恐怕我们遇到麻烦了。一个大麻烦。”

莫里森在事情出错时，对“问题”一词的发音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并非那种会无事生非的人。这种典型的英式矜持与日置的奔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正是这种对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们之间逐渐发展出了一种默契。

“把一切都告诉我。”

莫里森在吱吱作响的绿色皮椅里坐了下来。他看起来很疲惫，不，应该说是疲惫，而且很担忧，非常担忧。日置认出了这些疲惫的迹象：他早就怀疑，莫里森肩负的责任远比他在仓库里的工作要重得多。

“昨天上午，内政部来了两位先生。彬彬有礼，举止得体——太得体了，您明白吗。这种客套背后，往往藏着陷阱。”

日置看得一清二楚。他在日本就和这类官员打过交道。

“他们对什么感兴趣？”

“对您感兴趣。确切地说，是对这些藏品感兴趣。他们想知道这里存放了什么。这类问题，通常是在准备……某些措施之前才会问的。”

莫里森停顿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酒壶。他把酒壶递给日置，日置摆摆手拒绝了。这位英国人抿了一口威士忌，然后继续说道。

“他们有档案。厚厚的档案。上面有您的名字，松方先生的名字，还有您自1916年以来的全部购藏清单。他们甚至知道您在1923年从杜朗-吕埃尔手中买下了那幅小小的德加。”

“真是令人震惊……”

“他们问了我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作品的价值，您的资金来源，您与欧洲其他日本收藏家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他们想知道您是否与日本大使馆有联系。”

日置感到额头渗出汗珠。他当然和大使馆有联系。身为旅居海外的日本公民，怎能没有呢？但在眼下，这些联系却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时刻提醒

着他，他永远都是个外国人。在欧洲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依然备受怀疑，注定要不断地为自己的存在和活动辩解。

“我直说了吧。如果战争爆发——它一定会爆发，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日本选错了阵营……这些艺术品将被视为『敌产』。我们都知道战时敌产的下场：没收、强制变卖，或『意外』焚毁。”

日置闭上了双眼。他一直都知道这一天终会到来。但知道和面对现实却是两回事。就像远远望见悬崖和站在悬崖边上截然不同。他这种预知未来的清醒，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虐。他自满地做好了迎接灾难的准备，却又希望它永远不会发生。

在他的脑海中，他重温了与松方一起穿梭于欧洲各地的那些岁月。巴黎的画廊、蒙马特的画室、伦敦的拍卖会。老板对西方艺术的痴迷，令他心潮澎湃。这些令人兴奋的回忆将他带回了那个他觉得自己肩负着文化传播使命的时代。

“日置……” 1920年，松方站在他们刚购入的那幅梵高画作前，对他说，“……你看，梵高画一个房间，却把它变成了永恒。这就是西方的天才：将日常事物转化为艺术。”这句话对日置的影响远比他自己承认的要深远

。它在他心中种下了对欧洲艺术的迷恋，这种迷恋有时甚至让他对本国的审美传统嗤之以鼻。

一切都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因为那些对艺术一无所知，却对权力动态了如指掌的政客们。

“您认为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莫里森挠了挠下巴。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这个熟悉的动作，出乎意料地让日置感到安心。他从中看到了坏消息传递者背后，莫里森的人性光辉。

“很难说。我估计三个月，最多四个月。过了这个期限，任何属于日本公民的财产都可能被『出于预防措施』没收——他们现在就是这么说的。”

“三个月……要搬空这一切……”

日置停顿了一下。他该如何解释这项任务的艰巨性？数百件作品。莫奈、雷诺阿、罗丹的雕塑。他毕生的热情浓缩成几个贴着标签的箱子，堆放在伦敦的一个仓库里。他的存在被简化成几件物质，这让他感到既羞辱又反感。

他记得每一件藏品。比如1918年直接从莫奈手中购得的《睡莲》。松方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是纯粹的光，日置。光被捕捉并永远定格了。”这份共同的情感成为了他最珍贵的记忆之一，与师父之间那份精神上的亲密交流，弥补了他身为下属所遭受的一切挫折。

还有罗丹的那件作品，《加莱义民》的精美习作。他们曾在罗丹位于默东的工作室里，与他本人就这件作品进行了三个小时的洽谈。罗丹真是非凡。他讲述每个人物的故事，仿佛自己与他们相识已久。这次会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与西方艺术巨匠平起平坐，这种令人振奋的感觉激发了他内心深处渴望被认可为鉴赏家的雄心壮志。

“莫里森，我要告诉您一件鲜为人知的事。”

他究竟能信任他到什么程度？但归根结底，他已经别无选择。在欧洲生活多年后，莫里森仍然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

“我们这里只存放了部分藏品，另一半在巴黎，存放在罗丹博物馆的地窖里。”

“天哪……有多少件作品？”

“将近三百件，也许更多。松方先生原本打算在1925年把这些全部运回日本，可是……”

“可是？”

“百分之百的关税。日本政府认为，西方艺术会分散国内产业的资金，他们想扶持的是本国的传统艺术。”

“这么说，您是腹背受敌了。”

“这已经是轻描淡写了。日本政府认为我们的收藏有悖爱国精神；欧洲各国政府很快也会把它视为敌产。”

莫里森起身走到窗边。在那个装有滑动门的仓库里，他看到一摞摞的箱子。每个箱子里都装着一笔巨款。每个箱子都讲述着一个故事。或许几个月后，这一切都将成为记忆。眼前的景象加深了莫里森心中隐隐的愧疚感。作为即将掠夺他日本朋友的体制的代表，他发现自己成了这场不公的帮凶，却无力阻止。

“我要告诉您一件也许不该说的事。我在外交部有几个熟人，他们提到柏林、东京和罗马之间正在秘密谈协议。目前还没有正式消息，但据说谈判已经相当深入了。”

“秘密协议？”

“军事协议。看来是三国同盟条约。如果属实，您存放在伦敦的那些作品就完了。巴黎的恐怕也难逃一劫。”

“您确定吗？”

莫里森拿出一封信递给了日置。这一举动展现了这位英国人令人钦佩的道德勇气。他以这种方式背叛消息来源，冒了相当大的风险。

“您读读吧。是我伯明翰的一位同行昨天寄来的。他也接待了和我一样的来访，只不过对象是一位德国客户。”

日置迅速扫了一眼信。措辞虽显专业，但信息却很明确：英国政府正准备没收所有“潜在敌对”国家国民的财产。他怎么还会相信，艺术能够超越政治的仇恨呢？

“我不能透露更多关于我的消息来源的信息，”莫里森继续说道，“但它们足够可靠，伦敦方面可以开始拟定名单了。”

“什么名单？”

“要查封的资产，要监视的人，要『保护』的艺术品。这种委婉说法，您明白吗？”

日置完全明白了。这让他感到恶心。他一生都笃信法律、契约和财产权。而现在，他却被告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这一切都不过是虚张声势。对现实政治的发现彻底粉碎了他一直以来奉为圭臬的西方理想化愿景。

“您建议我怎么做？”

莫里森重新坐了下来。他脸上露出了在困境中常见的严肃表情，就像1929年那场危机几乎迫使潘泰克尼康公司倒闭时一样。这种严肃让日置感到担忧。

“说实话？能保住的就保住。悄悄地把最重要的几件藏品转移到法国。卢浮宫雕塑部助理策展人奥贝尔先生很有影响力，他离罗丹博物馆也很近；他或许能保护它们。至少能暂时保护。”

“如果法国也沦陷了呢？”

“那么，祈祷战争终有结束的一天，也祈祷有人还记得这些作品原本属于谁。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入这一行的，亲眼见过当局如何对待德国和奥地利的藏品。官方说法是『暂时扣押』，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作品物归原主。”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英国政府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将这些作品据为己有。而且在战争的混乱之中，『暂时扣押』很容易演变成彻底的、永久的没收。”

“可这是明目张胆的偷窃！”

“不，这是政治，不是偷窃。偷窃意味着违法；而我说的这件事将是合法的，受战时通过的特别法律保护。您甚至连申诉都没有地方。”

日置站了起来。外面，伦敦正享受着最后的和平。人们奔跑、工作、娱乐，浑然不知他们的世界很快就会天翻地覆。

“莫里森，您认识马塞尔·奥贝尔吗？”

— 他在业内备受尊敬。而且，他还是松方先生的私人朋友，对吧？

“将近二十年了。1925年莱昂斯·贝内迪特去世后，是他接手了我们在巴黎的收购事务。此人非同寻常：博学，正直，对艺术满怀热忱。如果说还有谁能帮我们……”

— 既然如此，你就应该尽快去看他。越快越好。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日置回想起这些年来遇到的所有商人。其中有多少人会成为盟友？又有多少人会趁机中饱私囊？

“莫里森，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

英国人拿起酒壶，又喝了一口。

“想听我的看法？这场战争会和我们经历过的任何一场都不一样：更长，更具毁灭性，更彻底。至少五年，也许十年。”

“十年……”

“最终，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世界将不复存在。帝国、国界、游戏规则……一切都将改变。”

“包括有关艺术财产的法律。”

“您是说……”

“我想，十年之后，如果我们还能活着走出这场战争，私人收藏这个概念或许会彻底消失。各国会逐渐习惯控

制艺术一决定什么可以被看见，谁有权看见。而一旦拿到这种权力，它们绝不会轻易交还。”

想到这里，日置不寒而栗。一个没有私人收藏家、没有赞助人、没有那种成就顶级收藏的个人热情的欧洲？这简直难以想象。

“您大概是夸张了……”

“也许吧。但愿我说错了。可您看看德国：纳粹控制着一切——谁能展出，谁能买，谁能卖。是他们决定什么是『颓废艺术』，什么不是。”

莫里森向日置倾身。

“如果这场战争蔓延到整个世界，这种国家管控的模式，恐怕会成为处处皆然的常态。”

谈话继续进行。莫里森从包里拿出联系人名单和欧洲地图。他解释了可能的秘密转移路线、需要避开的人以及可以信任的人。

巴黎有一位名叫亨利-皮埃尔·罗谢的艺术品经销商，他认识所有美国艺术收藏家。或许他可以安排将艺术品运往美国？但费用会非常高昂，而且在国际局势紧张时期，保险公司很可能拒绝承保此类运输。

还有一种选择是瑞士。瑞士保持中立，一些日内瓦的银行家同意将艺术品存放在他们的金库中。但同样，付款

必须以现金支付，而且需要出口许可证，这可能会引起当局的注意。

“那意大利呢？”日置问道。

“风险太大。墨索里尼虽然还不肯承认，实际上已经站在德国那一边了。如果日本和德国结盟，意大利也会照搬同样的没收手段。”

“西班牙呢？”

“西班牙刚打完内战。佛朗哥眼下虽然还在回避表态，但他的立场正越来越倒向希特勒。”

莫里森在桌子上铺开了一张欧洲地图。

“您看：红色是敌对国，或迟早会变成敌对国的国家；橙色是有被入侵风险的国家；黄色是靠不住的中立国。”

日置凝视着地图。只剩下几块绿色区域，而且越来越小。

“我们被困住了。”

“不一定。还有一个办法我们没提过。”

“哪个？”

“卖掉。尽快，悄悄地，卖给美国或南美的私人收藏家。把钱收回来，放到安全的地方。”

“可是松方先生绝不会同意……”

“松方先生或许宁愿换回藏品的价值，也不愿一无所有。有了这笔钱，他战后还能东山再起。”

这个想法很吸引人，但日置太了解他的老板了。松方收藏并非为了致富，而是为了建立他的博物馆。

“不。他宁愿冒失去一切的风险。”

“那么您只能寄望于奥贝尔在巴黎能找到办法了。”

莫里森合上文件，把地图收了起来。

“我给您三个名字，三个在巴黎能帮上忙的人。但要小心：这种动荡时局里，贪婪常常比友情更快。”

他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着什么，字迹匆匆，透露出一种紧迫感，这给日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保罗·纪尧姆—画廊在米罗梅斯尼尔街。与美国藏家交好。丹尼尔-亨利·卡恩韦勒—人脉极广，门道精通。但他是德裔，因此也启人疑窦。安布鲁瓦兹·沃拉尔—老江湖，门道精通。但未必可靠。”

“这些人可靠吗？”

“在这一行里，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算不错了。不过还是要多留个心眼。战争会剥出人的本性，而那本性并不总是好的。”

“您这话什么意思？”

“我是说，有些人可能会趁您处境艰难，索要不合理的佣金，或者，在运送途中『弄丢』几件作品。”

“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

“一个即将开战的世界。而战争年代，尊严是少数人才负担得起的奢侈品。”

当晚，日置回到酒店，头晕目眩。他必须做出一些决定，这些决定将关乎一份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的未来。

布卢姆斯伯里的罗素酒店是那种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店，昔日辉煌已不复存在——但从它依然高昂的房价来看，似乎仍对往昔记忆犹新。日置在那里已经住了三个星期，住在四楼一间俯瞰昏暗庭院的小房间里。房间谈不上豪华，但至少私密性不错。最重要的是，酒店员工不会就他的行踪问些令人尴尬的问题。至少目前还没有。

接待员亨德森太太面带微笑地递给他钥匙，笑容中隐隐涌起的好奇心却难以掩饰。日置强装出一副礼貌的模样，试图与人保持距离，但访客的不断增多自然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怀疑。

“这是给您的电报，日置先生，今天下午到的。”

日置的心跳加速。一封电报……他盼望着能收到松方的消息，急切地撕开信封，动作中流露出过去几周积攒的焦虑。

“情况堪忧 止 当局正就藏品事宜提出询问 止 建议尽快会面 止 顺颂近祺 止 奥贝尔”

他沉重地坐在大厅里一张破旧的扶手椅上。就连巴黎也不再安全了。那份措辞简短的电报很可能掩盖了远比寥寥数语所暗示的更为严重的事态发展。

他回想起六月的上次会面。奥贝尔在罗丹博物馆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他，办公室里摆放着两尊雕塑，还有一摞摞的图录，每翻阅一次，图录就会散落一地。那里严谨而友好的氛围与这位法国策展人心中焦躁不安的心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亲爱的日置，”他用一贯沉稳的语气说道，“我感觉时代在变迁。政客们越来越关注我们的储备了。”当时，日置以为这只是一次例行的行政检查——他真是太天真了。现在他才明白，奥贝尔是对的。

他回到房间，坐在那张用作书桌的小桌子旁。窗外，伦敦笼罩在九月的雾霭中。城里的某个地方，官员们可能正在整理写着他名字的名单。与此同时，莫里森大概也在某处结束一天的工作，扪心自问，自己把这一切都告诉他，究竟是对是错。

他拿出一张纸，开始给奥贝尔回信，字斟句酌，谨慎措辞，以应对当前的形势：

“此处情况同样艰难 止 亟需与您一晤 止 下周初抵巴黎 止 请做好最坏打算 止 谨此 止 日置”

然后他写了第二份电报，发给在日本的松方。他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开口。他该如何告诉他的上司，多年的心血可能付诸东流？他该如何解释，那些他一直敬仰的、以尊重法律著称的西方民主国家，竟然准备没收他们的藏品？

“与当地当局的谈话令人担忧 止 考虑转移至巴黎 止 静候您的指示 止 谨呈 止 日置”

他犹豫了很久才说出那些话。文明精英们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他回忆起1935年与松方的一次谈话。当时他们刚从保罗·罗森伯格画廊看完毕加索的展览回来。他的老板在拉博埃蒂街的人行道上陷入了沉思。

“Hiōki……”他曾对她说，“你认为我们把藏品留在欧洲是正确的吗？”

“当然，松方先生。我们怎么可能预料到日本政府会征收如此荒谬的税呢？”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在1925年就把所有东西都运回日本，即使这意味着要支付高额的关税。至少我们的产品会安全无虞。”

“免受什么侵害？”

“战争，日置。欧洲不幸地每隔二十年就会自相残杀一次。炮火一响，艺术便归于沉寂。”

既然他的老板是对的……日置写完电报，便下楼去前台送去。

亨德森太太答应尽快寄出。她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语气中带着一丝坚持，透露出她日益增长的怀疑。

回到房间后，他拿出写了多年的日记。这成了他每天的习惯，帮助他整理思绪，应对流放生活。他写道：

“伦敦，1939年8月28日。战争即将到来，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我们的梦想的终结。莫里森让我幡然醒悟。我们不再是收藏家，而是目标。我们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日置放下笔，走到窗边。院子里，猫儿们漫不经心地翻找着垃圾。生活依旧如常，对人类的种种琐事浑然不觉。至少，这些猫儿们没有需要守护的艺术收藏。

他的思绪飘回到了早年为松方家效力的日子。他未来的主人那非凡的人格魅力，立刻深深地吸引了他。

“日置……”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在一个弥漫着香火与名贵木材气息的华丽客厅里，他曾对他说，“看看你的四周。日本正在向世界敞开大门，但仅限于科技和工业领域。又有谁明白，莫奈或罗丹的价值，胜过世上所有的通商条约？”

松方的热情丝毫未减。但世界已经改变。艺术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艺术作品沦为国家间权力斗争的人质。他年轻时的理想主义与残酷的国际权力现实发生了冲突。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他看了看表，晚上十点。会是谁呢……这么晚了，情况不太妙。

“日置先生？楼下有位先生想见您，他说有急事。”

日置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昏暗的大厅里，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正在等他。此人衣着考究，相貌堂堂，但眼神里却透着一丝令日置不安的东西。

“您是日置先生吗？我是来自白厅的爱德华·坎贝尔。可以耽误您几分钟吗？”

他顿时感到一阵寒意。一位外交部官员，晚上十点……这巧合也太完美了，不可能是偶然。莫里森说得没错。

“当然。我们去客厅说吧。”

坎贝尔跟着他走进大厅旁边的小房间，房间里摆放着破旧的扶手椅和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他未经邀请就坐了下来。

“日置先生，我就直说了。我们知道您在潘泰克尼康仓库存放着大批艺术品，也知道贵国政府目前正与德国商谈修好之事。”

日置没有回答。他还能说什么呢？否认显而易见的事实吗？对方显然掌握了所有细节，绝非仅凭猜测。

坎贝尔继续用英国外交官惯用的礼貌语气说道：“在这种情况下，女王陛下的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允许贵重物品继续由潜在敌对国家的国民持有。”

“坎贝尔先生，我们的业务是合法的。所有收购都是公开透明进行的……”

“我并不怀疑这一点，”坎贝尔插话道，“但是和平时期的合法性和战争时期的合法性是两回事。”

这种区别令日置不寒而栗。他们甚至懒得掩饰自己的意图了，也不再需要任何借口。法律正变得可以随情况任意解释。

“您有什么提议？”

坎贝尔笑了。

“我们建议您自愿将藏品交由政府保护，直到国际局势明朗为止。”

“如果我拒绝呢？”

“那我们恐怕就要采取更……强制性的措施了。为了大家的安全……”

日置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份伪装过的最后通牒：要么接受『保护安置』，要么坐视没收。这层虚伪的外衣，让盗窃披上了合法的外表。

“我还有多少时间考虑？”

“比如说……四十八小时。您觉得这个时限合理吗？”

四十八小时……莫里森之前说的是三个月。显然，事态发展比预期的要快得多。或许莫里森的估计有误，这种可能性也存在。

“坎贝尔先生，如果我接受您的提议，具体会怎样处理？”

“您的作品将被转移到安全的政府保管处，妥善保存至战争结束。我们会编制详细清单，并开具收据给您。一切照章办事。”

“战后呢？”

“战后，我们会根据贵国政府在这场冲突中的立场，逐案审查处理。”

换句话说，如果日本与德国并肩作战，那么松方藏品就将不复存在。这个逻辑是无法回避的。

“如果我决定把这些作品转移到中立国呢？”

坎贝尔轻蔑地笑了笑。

“亲爱的先生，您以为在这样的国际危机时刻，我们会批准出口属于日本国民的贵重物品吗？”

“可是我有权利……”

“您『曾』有这个权利，日置先生。时代变了，权利也跟着变了。”

坎贝尔站起身，仔细地抚平了外套。

“四十八小时，日置先生。过了这个期限，我们就将依法行事了。”

他走向出口，然后转过身来，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这骗不了任何人。

“哦，我差点忘了。听说您这几天打算去一趟巴黎？”

“这有可能……”

“我强烈建议您别去。跨国旅行恐怕会变得……相当复杂。”

他把日置独自留下，任由他心中那些正一个个崩塌的信念，继续挣扎。

回到房间后，日置瘫倒在扶手椅上。四十八小时……他该如何通知奥贝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又该如何安排这一切？独自一人面对一个已下定决心要碾碎他的政府，他还能创造什么奇迹？

他拿起笔记本，补充道：

22:30—坎贝尔（外交部）来访。变相的最后通牒：四十八小时内接受『自愿』没收。巴黎之行告吹。我们已四面受敌。

他还有其他选择吗？他可以联系日本大使馆吗？但据莫里森说，大使馆可能也处于监视之下。而且，他们又能做什么呢？敷衍地抗议一番，然后屈服于压力吗？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对大英帝国没有任何影响力。

或许是一位私人艺术品经销商？一位能够秘密安排资金转移的人……但谁会冒这样的风险？中间人又该如何支付报酬？松方的财富被困在日本银行和日益受到审查的欧洲账户之间。

他突然想起莫里森提过的一个名字：亨利-皮埃尔·罗谢。这位巴黎古董商认识所有美国收藏家。如果有人能想出个办法……当然，前提是他们愿意，而且风险对他们来说也不算太大。

日置拿出一张新纸，开始给罗谢写电报，字斟句酌：

“伦敦日本藏品，情况紧急 止 寻求秘密转移或保护方案 止 莫里森告知尊姓大名 止 可否安排一次秘密会晤 止 日置，伦敦罗素酒店”

这是一场冒险的赌博。罗谢并不认识他，也没有理由帮助他。但这或许是他最后的机会。除非罗谢早已知情，并且正静观其变，等待这些作品以低价流入市场。

他还亲自去把这封电报送给了亨德森太太。一个晚上三封电报，再加上一位部委特使深夜来访……她肯定对他的行踪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日置先生，一切都还好吗？”她问道，语气中带着典型的英国式好奇，藏在礼貌的措辞之下。

“是的，谢谢。还有几件急事要处理。”

“当然。晚安。”

但她的语气清楚地表明，她并没有被蒙蔽。

回到房间后，日置辗转难眠。他望着窗外沉睡的伦敦，不禁思忖，这会不会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这座城市的安宁。

明天就必须做出决定。是接受这种伪装的没收，寄希望于战后能找回藏品？还是尝试秘密运往法国？无论哪种选择，他都可能失去一切。但至少，尝试一番，他可以安慰自己，他曾努力挽救松方先生的遗愿。虽然这弥补不了多少损失，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好。

他终于在凌晨三点左右睡着了，心中思忖着旧时的日本不信任西方是否正确。或许他的国家当初向世界敞开大门是个错误。或许，最终，与世隔绝比所谓的西方文明更安全。

第二天，日置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看了看表，早上六点。会是谁呢……这么早，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日置先生！日置先生！事情紧急！”

他认出了亨德森太太的声音。

他打开了门。接待员还穿着睡袍，头发披散着。

“日置先生，您得听听这个。新闻里正在播！”

她领他走进客厅，那里收音机里传来噼啪声。BBC播音员的声音低沉，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预示着灾难的来临：

“……卡姆登镇的潘泰克尼康 (Pantehnicon) 仓库发生火灾，消防员彻夜奋战，但未能阻止建筑物几乎完全损毁。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英镑。据信，多件珍贵的艺术收藏品已被毁。”

一切都结束了。伦敦馆藏一夜之间化为灰烬。真是巧合。坎贝尔在火灾发生前十二个小时来过这里，现在潘特克尼康大楼却在燃烧。

亨德森太太给他端来一杯茶，他机械地喝了下去，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在喝茶。那茶尝起来像灰烬。

“真的很抱歉，日置先生。您跟我说过，您的东西都存放在那儿……”

他没有回答。他还能说什么呢？伦敦上空仍在升腾的烟雾，带走了四十年的激情。

不到一个小时，电报就到了。当然，是莫里森发来的：

“一切尽毁 止 谨致哀悼 止 情况已然明朗 止
尽力保住巴黎那部分 止 多保重”

现在，只剩下奥贝尔画廊里保存的那些作品了。如果它们还在那里的话。

他回到房间，机械地收拾行李。巴黎……尽管坎贝尔“劝阻”他，他还是得去。这是他对松方的责任。或许也是他从这场灾难中挽回些什么的最后机会。

他合上行李箱时，想起了坎贝尔。坎贝尔曾说过给他四十八小时考虑。但由于伦敦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没收的了，这个提议也就作废了。这场大火比任何谈判都更有效地解决了问题。

还有巴黎，还有奥贝尔，还有那渺茫的希望——希望法国的局势会有所不同。

他错了。

第二章：1944年阴谋

巴黎，1944年10月

这批藏品多年来一直保存完好，藏于罗丹博物馆的地下室，由马塞尔·奥贝尔守护。他必须极尽机巧，才能阻止纳粹染指这批珍宝。事实上，他的直属上司乔治·格拉佩曾公开与维希政权合作，这导致他在战后清洗中先被停职，继而被解职。但到了1944年10月，事态骤然加速。马蒂尼翁的办公室里，仍残留着占领时期的气息。在一间镶着金边的会议室里，四个人正准备实施一起白领抢劫案。

嗯，这算不上偷窃，更像是披着爱国外衣的掠夺。

戴高乐身着将军制服主持会议。他的目光扫过面前散落的文件，不时在盖有红色印章的“松方收藏”文件上停留片刻。这位将军一向崇尚直接行动，而非繁文缛节，这些法律上的细微之处显然令他感到恼火。然而，他深知自己新近恢复的合法性要求他展现出无可挑剔的合法性。

在他右侧，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勒内·普莱文正紧张地翻阅着他的财务估算。这位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正在精打细算。在他看来，日本艺术品正在被兑换成法郎。大量的法郎。普莱文肩负着法国财政枯竭的重任；每一份潜

在的收入来源在他眼中都如同救命稻草，即便这会引发一些他宁愿不去深入探究的问题。

在他对面，亨利·托雷斯大师正在阅读他的报告。这位杰出的律师正在寻找法律漏洞。他该如何将不合法的事情合法化呢？托雷斯正是凭借其游走于法律灰色地带的能力而声名鹊起。

最后，雅克·若雅尔兴奋地翻阅着摄影图录。这位艺术与文学部主任深知这些作品的重要性。在占领时期，他曾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国家藏品。如今，他却发现自己成了窃贼。

路易十五座钟敲响了下午五点整。

“先生们，”戴高乐用他洪亮的声音说道，“我们今天来这里并非为了例行公事。这关乎法国的文化未来。我们重建被四年不幸摧毁的艺术遗产的能力至关重要。但这同时也关乎国家主权。重生的法国必须捍卫它的权利。它的一切权利。包括它作为战胜国所拥有的权利。”

普列文第一个发言。他精心准备了演讲稿，用一连串令人安心的数字掩盖了自己的紧张情绪。

“将军，请允许我总结一下情况。”

他打开一个活页夹，试图在抽象的统计数据中寻找逃避自身焦虑的避难所。

一轰炸、纳粹掠夺、各种破坏……我们的博物馆损失了数千件藏品。重建藏品需要20亿法郎。这相当于战前20年的文化预算。

“现在，”普列文继续说道，“我们偶然发现了一笔天赐的财富——日本松方藏品，这批藏品奇迹般地从战前就保存了下来，大部分都存放在罗丹博物馆的地窖里。我的部门估计它的价值超过四亿法郎。”

“四亿？”若雅尔惊呼道，“你在开玩笑吧？单单梵高的《阿尔勒的卧室》就价值数千万！”

若雅尔的愤慨暴露了他的痛苦：他毕生致力于保护艺术，却发现自己竟然在讨论艺术的价格，仿佛艺术是一种普通的商品。

普列文耸了耸肩。

——如果我们让这些作品流向日本，我们将错失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且，我们将给一个敌对国家一个重塑自身文化的机会。

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做笔记的托雷斯终于抬起了头。

“各位先生，这批藏品的分类存在问题。”

戴高乐皱起了眉头。这位将军最讨厌别人在他已经下定决心是时候给他设置障碍。

一当然，日本是在1940年9月加入轴心国的。但是法国与日本开战的具体情况，至今仍……可以说……见仁见智。

将军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他不喜欢别人质疑他的决定，尤其是在他认为次要的细节问题上。戴高乐通常会驳回那些与他的政治理念相悖的技术性异议。

托雷斯先生，请您澄清一下您的观点。1941年12月我们对日本宣战，难道还不足以将日本列为敌人吗？

托雷斯紧张地咳嗽了几声。他意识到这样做可能会惹恼将军，但他的知识分子正直品格促使他提出这些困难。

将军，这个问题源于几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首先，宣战书从未在自由法国官方公报上刊登。这是一个程序问题。其次，宣战书出自法国国民委员会，而该委员会的合法性在当时备受质疑，甚至连我们的一些盟友也对其持怀疑态度。

耳边只有时钟滴答作响的声音。普莱文和若雅尔交换了一个担忧的眼神。

“还有更令人不安的事情，”托雷斯继续说道，“维希政府从未对日本宣战。相反，它与东京一直保持着正常关系，直到1944年8月。”

他抬起头，意识到自己正走在雷区上。

——但我们继承了法国国家的延续性，包括维希政权的许多行径，这些行径无法用笔墨抹去。

戴高乐挺直了身子，脸色凝重。每当有人提及与维希政权的任何延续性，这位将军都会怒火中烧，因为他正是建立在与国民革命彻底决裂的基础上的。

托雷斯先生！您肯定不希望戴高乐主义的法国承认贝当行为哪怕有一点点合法性吧？

他的声音提高了一个音调。

——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

“将军，这并非是要使维希政权合法化……”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托雷斯又开始咳嗽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进一步恶化。

“必须承认，法国在占领时期采取的许多行动至今仍然有效。这也是当时缔结的许多条约至今仍然有效的原因。”

若雅尔是一位深谙艺术的行家，他开口缓和了气氛。这位司长察觉到将军的情绪正变得暴躁，便想把话题引回更熟悉的领域。

“总的来说，将军，这个……姑且称之为法律问题吧，虽然重要，但不应让我们忽视其中非同寻常的利害关系。”

他打开一本相册，在面对困扰他的道德困境时，从欣赏照片中找到了慰藉。

我仔细查看了藏品的内容。一件具有极高国际价值的珍宝：梵高在阿尔勒的卧室，多年来美国人一直羡慕我们。三幅塞尚成熟时期的作品。一幅美得令人窒息的圣维克多山画作。世上独一无二的罗丹作品。还有几尊大师从未打算出售的《地狱之门》石膏模型……

“总共有多少件作品？”普列文打断道。

一约共有三百五十件杰出藏品，另有一系列日本版画。仅此几件藏品就足以提升我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水平。

“正是如此！”戴高乐大声说道，一拳砸在桌子上。“正因如此，我们才不能让这样的机会白白溜走。先生，我理解您的顾虑。但我们绝不能让个人情绪瘫痪国家。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托雷斯知道结局会是什么。将军一如既往地做出了决定。

我准备了三个方案，各有利弊。第一个方案很简单，就是颁布一项关于敌方财产的普遍法令，日本自然包含在内。他们位于我方领土上的所有财产立即予以没收。

“有哪些优势？”

—速度至上。无需议会辩论，无需公众讨论。我们直接执行，就这么简单。在国内法下，这在法律上无可指摘。

“那么缺点呢？”

— 范围太广。我们可能会面临中立国家的抗议和尴尬的外交要求。美国也可能对这种暴行感到震惊。

戴高乐用手势驳斥了这一反对意见。

—美国人对德国资产如此大惊小怪吗？罗斯福本人不是在1941年冻结了所有日本资产吗？

“当然，”托雷斯承认道，“但是，发布一项全面禁令会引起人们对我们做法的关注。第二个选择更为谨慎：发布一项针对性禁令，仅针对松方藏品。我们将援引法国政府对日本的战争行为索赔。”

“也就是说？”

—印度支那。官方说法是，日本吞并了我们在亚洲的殖民地。损失估计……比如说……数十亿法郎。这批藏品自然成了一种合理的补偿。

雅尔德皱起了眉头。

问题在于，维希政府通过1941年的《达尔兰-加藤协定》授权日本占领印度支那。从法律上讲，日本并没有窃取任何东西。它得到了我们的授权。

“所以我不建议走这条路，”托雷斯回答说。“还有第三种选择，也是最巧妙的。我们不触及正式的所有权，只是以‘战时保护’为由冻结藏品。然后，我们在未来的和平条约框架内组织一场漫长的谈判。事实上，谈判会持续很久，直到他们厌倦了斗争，最终放弃他们的权利，以换取一些象征性的让步。”

“还要多久？”普列文问道。

五年？十年？谁也说不准。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里，这些作品留在法国，留在我们的博物馆里，由我们保管。

将军心想，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

——我喜欢这个主意。以保护之名行掠夺之实。真够法国的。托雷斯先生，给我起草一份结合第一和第三种方案的法令。立即查封，然后进行无休止的谈判。

“将军，我必须警告您……”

“警告我什么？”

——这项命令如果今天通过，明天就会引发问题。一旦日本要求我们解释，我们将很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尤其是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的宣战被证明在法律上站不住脚的话。

戴高乐站起身来，高大的身躯显得格外威严。

“托雷斯先生，您担心的是明天。我今天必须重建法国。这批藏品代表着数年的文化经费。它能够让巴黎重回世界艺术之都的地位。您真的认为我会因为法律上的顾虑而错失这样的机会吗？”

他的语气不容置疑。托雷斯低下头，看向他的文件。

“好的，将军。我这就去起草法令。”

将军转向普列文。

普列文，我指望你帮我们准备好与盟国的谈判立场。我们需要让他们接受条约赋予我们保留这些工程作为战争赔款的权利。

普列文感觉到远处有障碍物逼近。

“您认为我们的盟友会接受吗？”

我们的盟友在日本有着巨大的利益。美国将获得天文数字般的赔款。他们不可能剥夺我们因在印度支那遭受的损失而获得赔偿的权利！

托雷斯像疯了一样奋笔疾书，试图跟上将军的思路，同时在脑海中构建必要的法律框架。

将军，为了使我们的战略行之有效，我们需要详细记录法国因日德同盟而遭受的所有损失。这当然包括我们在印度支那的损失，但也包括太平洋战争对我们在该地区经济利益造成的所有损害。

“说得太好了！”戴高乐赞同道，“我已指示奥赛码头方面准备一份档案。档案越详实，我们的立场就越无懈可击。”

雅雅尔听完了整个对话，感到越来越不自在。

“将军……请原谅我这么说，但是……我们这样做会不会损害法国的形象？这会不会被视为一种变相的掠夺？我们国家……嗯，我们一直以来都以尊重私有财产而闻名……”

戴高乐的目光变得像北极的冰一样冷峻。房间里的气氛仿佛骤然凝固。任何对他的决定提出质疑的人，尤其是来自他最亲密的合作者，都会激起他压抑已久的怒火。

——雅雅尔！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

他猛地跳起来，像只被困的野兽一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这是个不祥之兆。将军一旦开始踱步，就意味着他情绪激动，急需发泄心中的不满。

“我们损失了数万件艺术品，你们听见了吗？它们被掠夺、被摧毁，还被纳粹以极低的价格‘买走’！德国人洗劫了我们的博物馆，美国人窃取了我们所有的艺术市场，你们竟然指望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机会溜走？”

他猛地转身，眼神阴沉。

不！法国拥有合法权利，它必将行使这些权利。

“可是，将军……松方基金在战前就已存在。据我所知，它的主人甚至还是法国的朋友……”

“正是如此！”戴高乐惊呼道，“那他本应在日本建造的那座著名的西方艺术博物馆又在哪里呢？”

他的举止越来越戏剧化，仿佛在对着一群看不见的观众讲话，显露出他作为一位习惯于营造宏大效果的演说家的气质。

“军国主义的日本已经把一个崇尚美的国度变成了战争机器！松方先生的美好愿望已经被他国家的演变所吞噬。我们只是在保护这些作品免遭军国主义的蹂躏！”托雷斯察觉到房间里紧张的气氛正在升级。他试图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让大家冷静下来，凭借着他作为一名习惯于化解紧张局势的律师的经验，他成功地缓和了气氛。

“将军，如果我们按计划推进，我们的部门就需要准备一份扎实的论证材料。我建议组建一个专家小组，评估这批藏品的具体内容。”

“好主意！”普莱文表示赞同，他松了口气，终于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技术层面了。“我们还需要做好法国和国际舆论的准备。无论如何，这次行动都不能像是一次趁机没收财产的行动。”

“你打算怎么做？”雅雅尔问道，他仍然对将军的爆发感到震惊。

普列文在脑子里已经把一切都算好了。

一通过反复强调几个关键点。首先，日本在亚洲犯下的战争罪行。这些罪行如今已有大量证据，无可否认。其次，他们与纳粹德国结盟。然后，他们给我们在印度支那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公众需要知道，这批藏品是对我们巨大损失的合理补偿。

“那么文化方面呢？”雅雅尔不肯放弃，坚持问道。

— 从文化角度来看，我们将解释，这些西方作品在原产国比在日本保存得更好，因为在日本，这些作品可能会被忽视，因为日本是一个饱受战争蹂躏、一心重建的国家。

戴高乐点了点头。

各位先生，我看得出你们完全理解局势的复杂性。我们的会面将严格保密，不会留下任何书面记录。明白了吗？

然后他分配了角色。

托雷斯先生，我最迟要在四十八小时内收到法令草案，一分钟都不能多。普莱文，准备一份详细的财务备忘录，并对预期收益进行精确评估。若雅尔，谨慎地甄选出

最有价值的作品，并制定一份计划，将它们分配给我们主要的国家博物馆。

“将军，您打算在哪一天签署法令？”托雷斯问道，他已经在心里盘算着自己的日程安排了。

一越快越好。每拖延一天，日本人试图将这些文物归还给中立国的风险就越高。或者，他们会找到其他方法将它们从我们手中偷运出去。

他重新坐下，神情坚定，用他表现出的决心掩盖了国际社会反应带给他的恐惧。

——一旦该法令签署并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他们将不再有任何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

“如果松方家的继承人仍然在我们的法庭上提出异议呢？”托雷斯追问道，他正在考虑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

戴高乐随即露出了严肃的表情，暴露出隐藏在他爱国热情背后冷酷的一面。

托雷斯先生，请扪心自问：谁会同意为他们辩护？哪位法国律师有胆量为了前纳粹盟友的利益而违背法国的最佳利益？告诉我……即便他们找到了如此胆大的人，他们又能以什么理由提出异议呢？我们的裁决将具有法律效力。

普列文坚定地点头表示赞同：他作为经济学家的本能让他欣赏这种无需任何成本就能带来大量收入的巧妙操作。

“他们的地位将非常脆弱。战败的日本对我们不会有任何筹码；相反，它需要我们的善意来求得重建。”

托雷斯补充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如果有人提出质疑，那只能是质疑我们行动合法性的律师。我们可以辩称，质疑我们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有损国家利益的行为。”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就连起初还有些犹豫的若雅尔，也开始被这套方案的稳健周密所折服。

会议拖延了很久。每一个实际细节都被仔细审查：如何确保藏品安全、如何进行详细的清点并确保安全移交至博物馆库房、以及精心策划的沟通事宜。正是这些细节决定了项目的成败。

托雷斯甚至制定了一个非常紧凑的时间表。订单必须在十月的第一周签署，物品必须随后立即被扣押，完整的清点工作必须在十一月底之前完成，物品必须在圣诞节前移交给博物馆。

“费用呢？”普列文问道。

托雷斯回答说：“运输和保险费用将从藏品的估价中扣除。基本上，这些艺术品将为自身的没收买单。”

“完美，”戴高乐评论道，“这是一项零成本行动，却为我们带来了价值数亿法郎的艺术品。”

当托雷斯提出库存问题时，若雅尔决定放手一搏。他认为自己或许能够将损失降到最低，从而在行动中保留一丝道德底线。

为避免日后出现任何争议，我建议由一个包括法国和外国专家在内的联合委员会进行清点。这将使清点工作更具公信力。

“绝对不行！”戴高乐断然反驳，表达了他对任何外部控制的不信任。“我们绝不会赋予任何外国人权力来控制我们在我们领土上的行动。清点工作将完全由法国人负责，由我们自己的专家执行。”

“但这可能会造成国际信誉问题，”若雅尔怯怯地反驳道，“其他国家会开始质疑……”

戴高乐反驳道：“法国的国际信誉并非取决于少数外国专家的意见，而是取决于我们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

当晚四人分道扬镳时，十月的夜幕已降临巴黎。他们刚刚为一场日后将成为现代史上最骇人听闻的艺术掠夺事件奠定了基础。每个人都带着各自的责任和辩解的说辞回到了家乡。

这种掠夺之所以更加恶毒，是因为它披上了共和法律的外衣。就像一个穿着西装打着丝绸领带的窃贼。

在马蒂尼翁宫的走廊里，秘书和招待员们照常忙碌着。他们对刚刚做出的决定一无所知。无知保全良知。

巴黎街头，生活正逐渐恢复正常。咖啡馆重新开张，剧院也重新开放。人们终于可以再次自由呼吸了。谁也想不到，就在共和国静谧的办公室里，刚刚书写了一章颇为肮脏的篇章。

1944年10月5日，正如计划的那样，戴高乐亲自签署了这项法令。法令文本不容任何解释。所有在法国境内的日本国民的财产都被“为了国家更高利益”而预防性地没收。

大局已定。松方基金已经落入一个冷酷无情的机制之网，绝不会轻易放手。

在奥赛码头档案馆，一份命令副本被归档在一个标有“日本事务”的文件夹中。其他副本则被送往相关部委。每个部门都收到了各自的具体指示，这些指示是用官僚们喜欢的暗语写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明文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明白。

与此同时，情报部门开始监视所有仍居住在法国的日本公民。他们的一举一动、所有联系、所有与外国的沟通

尝试都被记录在案。目的是什么？阻止任何可能延缓计划中的扣押行动的发生。

10月8日上午，即签约三天后，财政部的专门小组抵达了主仓库。此次行动内部代号为“秋收”，其计划之周密堪比军事行动。

罗丹博物馆当天，由于首席策展人乔治·格拉佩因与占领者合作而被下达驱逐令，因此他不在场。早上七点，两名官员和一名法警将马塞尔·奥贝尔召到他的办公室。

当头棒喝。

他毕生致力于促进法日友谊，坚信艺术能够超越民族间的敌对情绪。眼见自己的努力被这一举动摧毁，他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难以掩饰。

“助理馆长先生，”使团团长告诉他，“我们前来清点并扣押贵处存放的日本财产。”

他自信地递上一份文件，面无表情地掩饰着看到奥贝尔明显痛苦时的尴尬。

——这是授权我们这样做的命令。白纸黑字写在那里。

毕生致力于艺术和法日友谊，却在寥寥数语中崩塌。奥贝尔回忆起与松方共度的那些夜晚，他们探讨着绘画。一种痛苦的怀旧之情涌上心头，他无比怀念那个艺术似乎能够超越国界，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时代。

“先生们，”他开口说道，语气坚定，“这些作品是一位挚友托付给我的。他是一位法国艺术的鉴赏家。松方先生从未对我们国家怀有丝毫敌意。我们多年来一直携手共创……”

“奥贝尔先生，”那位官员打断道，“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讨论政府的总体政策，而是为了执行政策。”

他啪地一声关上公文包，这个机械的动作让他可以避开奥贝尔的目光。

— 这些货物属于敌国国民所有，因此属于1944年10月5日法令的管辖范围。

第二位官员年纪较轻，显然对艺术方面的争论不屑一顾，他用生硬的语气插话道。

一助理策展人先生，作品的来源或其所有者的善意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们现在的拥有者。而这位拥有者是日本人。您明白其中的细微差别吗？争论到此结束。

清点工作立即展开。专家们花了几个小时，逐一核对清单，拍摄每件作品的照片，并在所有箱子上贴上封条。这是一个细致而又毫不留情的过程。

被迫目睹这一切的奥贝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的心血化为乌有。每一枚封印都如同钉入他梦想棺材上的一颗钉子。他想起了他和松方共同构想的所有展览项目，想起了他们曾希望共同建立的文化大学。

中午时分，他出于自尊心的驱使，孤注一掷地迈出了最后一步。

“各位先生，我必须通知松方家族在巴黎的代表日置先生。他有权知道他所保管的财产的去向。”

“今天上午，我们的人已经通知了日置先生，”使团团长言简意赅地回答道，心中不禁为对方的懵懂无知感到一丝怜悯，“他再也无法接触到这些作品了。”

事实上，就在八点钟，在巴黎巴比伦街的小公寓里，日置幸三郎接待了两名法国警察的来访。他像往常一样喝着茶，这个习惯让他想起故乡，也给了他面对流亡的力量。

日置身上体现了老一辈日本人的所有尊严，他们受过良好的礼仪和自制教育。但面对毕生心血的崩塌，他感到自己的自制力彻底崩溃了。

他现在被禁止靠近仓库。任何试图联系日本官员或外国外交官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可疑举动。

嫌疑人。这个词听起来很奇怪。他，竟然成了嫌疑人？在他担任连接两种文化的桥梁这么多年之后？

他明白自己的使命即将结束。他用在欧洲多次逗留期间习得的法语——他的法语比一些巴黎人还要流利——试图为一项他明知注定失败的事业辩护。

“松方先生是……”

“日置先生，”两位警官中年纪较大的那位打断道，“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我们无权评判这些决定的合理性。很抱歉。您的个人情况稍后将由相关部门进行审查。”

那句晦涩难懂的话让他脊背发凉。他明白自己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外来者，甚至可能带有危险色彩。这种羞辱与他在巴黎艺术圈所享有的尊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他倍感痛苦。

当天下午，这些艺术品开始被转移到卢浮宫和其他博物馆的库房。军用卡车在宪兵的护送下，悄悄地穿梭在巴黎的大街小巷，运送着这些珍贵的货物。

这次行动并未对外公开。最好避免回答那些尴尬的问题。反正记者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巴黎解放的新闻仍然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在卢浮宫，雅克·若雅尔亲自监督了第一批货箱的运抵。他不禁感到一种奇怪而矛盾的心情。

一方面，馆长看到这些即将丰富国家博物馆馆藏的珍稀杰作，兴奋不已。莫奈，罗丹！另一方面，获取这些珍宝的手段却让他感到不安。若雅尔试图说服自己，结果可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但他无法压抑内心的良知。

在纳粹占领时期，他从纳粹手中抢救了无数艺术品。他曾彻夜藏匿油画，躲在地下室、城堡里，只为从戈林手中夺回它们。他记得那些卡车在夜深人静时驶离，记得

那种无声的默许。而现在呢？他竟然参与了一场有组织的掠夺。

“时代在变，”他告诉自己，语气中带着一丝他试图压抑的怨恨。

“局长先生……”

他的助手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装有莫奈画作的箱子。他知道自己处理的是什么，但也明白情况的暧昧之处。

“我们应该如何对这些作品进行编目？”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它决定着整个行动的命运，也揭示了管理层所关心的实际问题。

“将它们登记为『依据1944年10月5日法令实施保全查封的财产』。目前暂不提及最终所有权归属，一切视事态发展而定。”

“那么公开展示呢？”

副手显得有些不耐烦，既兴奋又担忧。想想也正常，毕竟是莫奈的作品……

“展览暂停。作品将继续存放，直至另行通知。”

雅雅尔叹了口气。他想起了曾经可以随心所欲表达一切，而无需反复斟酌的时光。那是段失去纯真的美好岁月。

“我们绝不能给任何潜在的质疑留下把柄。一切必须绝对保密。”

与此同时，在奥赛码头，官员们正在准备未来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论据。一份正在编纂的文件详细列出了法国因日德同盟而遭受的所有损失。

据估计，印度支那的经济损失达120亿法郎，法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损失达50亿法郎，而收复印度支那的军事费用则高达30亿法郎。至于精神和文化损失，则无法估量。赔偿总额至少高达200亿法郎，远远超过藏品的估计价值。

松方的作品最终为珍珠港事件和与希特勒的结盟付出了代价。尽管它们的主人与此事毫无瓜葛。尽管他收藏这些作品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而非出于算计。

管理层的会计逻辑不受心理细微差别的影响。

而且，谁来核查账目呢？

1944年10月8日晚，戴高乐收到了一份关于此次行动的详细报告。一切进展顺利。法国博物馆内所有物品安全无虞，前日本守卫已被监视，奥赛码头尚未出现任何抗议活动。

将军匆匆扫了一眼文件。他心事重重。美国人，共产党人……

——太好了。我们需要为下一阶段做好准备。将这次临时扣押转化为最终收购。当然，要尽可能合法。

在巴黎狭小的公寓里，日置幸三郎接到电话，得知了所有资产都被查封的消息。一个匿名的声音礼貌而坚定地告诉他，松方先生的资产现在“受到法国政府的保护”。

日置感到一股怒火在心中酝酿。他从小就被教育要尊重权威，因此无法理解公开反抗的行为。

当晚他就给东京发了一封电报：

“藏品已被法国当局全数查封 止 援引1944年10月5日
政府法令 止 情况万分危急 止 恳请速赐指示 止
日置”

他反复读了三遍，又读了第四遍。字字诛心。文中每一个代替标点的『止』字，听起来都像是为他毕生心血敲响的丧钟。

答案永远不会到来。

日本？被击垮了，彻底完了。整个国家都在为养活民众而挣扎，根本无暇顾及海外的私人利益。松方收藏也消失在了法国官僚机构的迷宫之中。

就像这个世界上许多其他正在崩溃的事物一样。

无论是日置还是法国当事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刚刚开创了一个爆炸性的先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民主国家以战争为借口，利用本国法律没收私人收藏。

松方事件由此诞生，其后的路，还很长。

三个月后，1945年1月，天气寒冷刺骨。若雅尔走进卢浮宫的库房，试图在沉思中寻求慰藉，以排解心中的疑问。

在通风良好的拱形地窖里，松方的杰作如今堆积如山，排列整齐，贴有标签，编入目录，仿佛它们一直都在那里。但若雅尔心里清楚，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雅尔在《阿尔勒的卧室》前停了下来。梵高的画作。在人造光的照射下，画布仿佛有了生命，在镀金的画框中几乎活了过来。多年以后，它最终会进入奥赛博物馆。数以百万计的参观者会欣赏它。又有多少人知道它扑朔迷离的来历呢？

几周后，义愤填膺的信件如潮水般涌来。来自日本艺术专家，来自收藏家，还有一些法国人。他们都强烈谴责这种行为，指责这是变相盗窃。

“*时间会证明一切*，”他带着一种宿命论告诉自己，但这种宿命论只有一半让他信服。

在马蒂尼翁，戴高乐签署了其他法令，他的心思转向了新的挑战。

笔尖划过纸面。重建国家势在必行。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哪怕是最令人质疑的。他很久以前就明白，衡量一个国家伟大与否，不在于它的道德底线，而在于它的行动力。

顾虑？那是和平时期的事。我们离和平时期还远着呢。托雷斯则在准备其他案件，其他敌方财产的“合法化”事宜。

1944年末，法国有比这些良心上的顾虑更紧迫的事情要处理。

在东京，在首都冒着浓烟的废墟之中，没有人再想起松方收藏了。

这个国家当时有比哀悼几幅在巴黎遗失的画作更紧迫的事情。首要任务是生存。吃饭。重建。

于是，三百五十件艺术杰作易手。没有喧嚣，没有暴力。只有共和法律的无声力量。

第三章：钳制渐紧

巴黎，1944年11月

解放的喜悦，以及重建工作亟待完成的焦虑，都笼罩着这座城市。巴黎正竭尽全力舔舐伤口。被烧毁的建筑依然触目惊心。破碎的商店橱窗被木板封住。杂货店外排起了长队。

在里沃利街，国家财产管理局的办公室里一片繁忙景象。就在几个月前，维希政权的合作者们还在这里精心策划掠夺犹太人的财产。新共和国，新主人。

贝尔纳·多里瓦尔检查了刚刚运抵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库房的第一批货箱。他当时在让·卡苏手下担任助理策展人。他代表了那些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却没有失去对艺术的热爱，同时又抱有爱国文化情怀的知识分子。

在他学者的外表下，隐藏着战争暴露出的冷酷无情。他学会了在形势需要时为不可辩解之事辩护，同时又以艺术的更高价值来维护自己的良知。

面对着他的是皮埃尔·雅科梅，他正在监督整个行动。这位国有资产主管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作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生，他对自己的部门运作了如指掌。

“多里瓦尔先生……”

雅科梅朝一排排板条箱做了个手势。巨大的仓库，配上金属货架，宛如一座储藏的大教堂。他踱步于板条箱之间，眼神贪婪，渴望着自己高效管理这项工作后将获得的认可。

“我相信，我们的专家见过更糟糕的情况。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卓越”品质。

你知道，在那些战争年代，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藏品急剧减少。轰炸更是雪上加霜。结果，与美国或英国的主要机构相比，我们相形见绌。

多里瓦尔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之情。他内心深处有个声音低语：与作品本身的美相比，收购的具体情况根本无关紧要。

“主管先生……”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

“鉴于我们在现代艺术领域存在的巨大缺口，这次收购简直是天赐良机……”

他走到一个板条箱前，将手放在上面，带着近乎宗教般的虔诚，仿佛在通过与艺术的交流寻求救赎。

“试想一下，我们的博物馆终于能够与世界顶尖的机构相媲美了！”

“你这是在谈论收购，”雅科梅谨慎地打断道，“别忘了，官方说法是预防性扣押。这些作品目前还不属于法国国家所有。我们用词要谨慎。”

多里瓦尔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没错，从形式上讲，您说得没错。不过，你我之间说句实话……”

他压低了声音，心照不宣。当他提到他们行动的违规之处时，一股罪恶的快感涌上心头。

“你以为戴高乐会放过这样的机会？这些作品迟早会充实我们的国家馆藏，我敢拿性命担保。这只是时间问题。”

雅科梅点头表示同意。他走向其中一个最大的箱子，动作精准得如同外科手术一般，打开了封条。极其谨慎，好几层防护布。

“我们来看看……”

他极其小心翼翼地拆开了包装。

当画作呈现在眼前时，他们都惊呆了。这是梵高的《阿尔勒的卧室》。画布上散发着这位荷兰大师特有的浓郁色彩。床和墙壁深邃的蓝色与椅子和地板的黄色完美融合。

多里瓦尔的声音哽咽了。

“这幅画比我研究复制品时所能想象的任何作品都要更令人震撼。看看枕头上那些厚涂的笔触！那份直击人心的强烈冲击力！还有这幅画的构图……看似简单，却又无比精妙。法国的藏品中竟然有这样一幅梵高级别的作品！您意识到这对我们的国际声誉意味着什么吗？”

“那么，单单这一件，在市面上能值多少钱？”

多里瓦尔高举双臂指向天空。

“这样的作品不会在普通市场上出售，而是代代相传的。它是全人类共有的遗产。倘若它有朝一日被拿去拍卖——那将是一种亵渎——其价值将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这正是必须向公众传达的论调。这些作品并非战争掠夺品，而是法国有道义责任保护并向全世界推介的文化遗产。”

清点工作仍在继续。一个又一个发现接踵而至。松方先生多年来满怀热情地收藏的珍品一一揭晓。

“看！”

多里瓦尔凝视着一幅刚刚拆封的画布。

——塞尚的《*圣维克多山*》。那几何般的轮廓，对普罗旺斯光线的刻画……还有高更的《*塔希提岛的女人*》，那些赭色和朱红色，宛如一首异域旋律……

在盖上最后一箱后，雅科梅的语气变得更加私密。

“多里瓦尔，我必须告诉您，上头对我们……姑且说，办事的方式，有些担忧。”

“什么样的担忧？”

雅科梅本能地压低了声音，仿佛害怕被人偷听。他喜欢秘密和阴谋——这是他逃避单调乏味工作的一种方式。

“嗯，在奥赛码头，他们担心我们的……这种攫取行为会引发反应。已经有人开始指责我们进行一种变相的掠夺，说这与法国的传统背道而驰。”

“什么样的声音？”

多里瓦尔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他开始在房间里踱步，愤怒的情绪勉强掩盖了他内心的紧张。

“职业外交官，几位吹毛求疵的法律专家，还有几个与艺术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眼下还没什么组织，但势头可能会壮大。”

多里瓦尔坐了起来。

“等等，等等！我们说的是一个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摧毁了该地区大片西方文明成果的国家。现在竟然有人要指责我们用他们的财产来补偿自己？”

他勃然大怒，仿佛义愤填膺让他摆脱了内心的疑虑。

“可这是公平的补偿啊！”

“在实质问题上，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雅科梅打着圆场说道，“但您和我一样清楚，公众舆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舆论——很容易被感性的论调打动，从而忽视现实。”

“什么感伤的论点？”

多里瓦尔的声音里明显带着恼怒。

雅科梅特从皮质公文包里掏出一大叠文件。他喜欢这种掌握信息、评估自己对事态影响的时刻。

“近几周，我们收到了松方家族的多封来信，这些信件经由红十字会转交。此外，还有一些日本艺术界知名人士的来信，措辞……不妨说，颇为动人地，恳请归还这些藏品。”

他展开了一封用法语手写的信。

“他们强调，松方幸次郎是一位伟大的艺术爱好者，一位无私的赞助人，他建立自己的收藏完全是为了文化和慈善的目的。”

多里瓦尔突然打断了他。

“那又怎样？这些好意，又能改变什么？”

“正因如此，”雅科梅耐心地继续说道，“这些人道主义和文化方面的论点，或许能引起共鸣。我们的艺术家、艺术评论家和作家，都容易被这类诉求打动。他们或

许会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侵犯了艺术财产的神圣权利。
。”

“您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吗？”

——虽然尚未公开，但据报道，巴黎几家沙龙里都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讨论。据说，勒内·金佩尔和让·科克托等名人也表达了保留意见。

这消息让多里瓦尔大吃一惊。金佩尔和科克托……这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他感到自己的信念开始动摇。

“既然如此，我们得先发制人，把握住这件事的舆论导向。”

他们的谈话被弗朗索瓦·马泰的悄然到来打断了。这位外交部的外交官小心翼翼地推开门。他似乎有些紧张，流露出权力走廊里暗流涌动的紧张气氛。

“诸位……”

他一直等到被邀请才继续。

“我此来是要向各位通报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最新进展，这与松方案有着直接关系。”

“有什么消息？”

雅科梅特疲惫地朝一张扶手椅做了个手势。这一天过得很漫长，肩上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马泰坐了下来，拿出了几个密封的信封。

美国人已经在为投降做准备。他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一次全面和平会议，以决定战败日本的命运。会议应该会在未来几年内举行，地点可能在旧金山或华盛顿。会议必然会讨论战争赔款这一关键问题。

多里瓦尔向前倾身，眼睛闪闪发光。

“那么，法国官方对这些赔偿问题的立场是什么？”

“这正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

马西的语气变得神秘起来。

“外长希望我们尽快拟定一份完整的诉求清单。松方收藏也属于这一总体框架之内。”

“您打算如何证明将它纳入其中的合理性？”

“我们将把这批藏品作为实物赔偿，以弥补日本的侵略行径及其盟国损害我方利益的行为，给法国及其国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奥赛码头的专家们目前正在核算这些损失，得出的金额极其巨大。”

“能否给我们一个大致的数量级？”

“初步估计仍属暂定，主要涉及居住在太平洋地区的我国公民所遭受的损失、沉没的船只、被毁的商业设施……”

马泰在心里简单计算了一下。

“与实际遭受的损失相比，这批藏品的价值其实相当有限。”

多里瓦尔欣喜若狂——他为自己那些自我开脱的说辞，找到了佐证。

“瞧！这不是任意的掠夺，也不是非法的侵占，而是合理的赔偿。这些作品作为战争损害赔偿，理应归我们所有！”

马泰的热情中带着老练外交官特有的矜持。他见过太多局势逆转，不会轻易得意忘形，而这份谨慎也常常让他免于挫折。

“不过，务必小心，眼下一切都还未成定局。我们必须与盟友——尤其是美国——坚定地谈判，他们对可用于赔偿的日本资产分配，恐怕另有想法。”

“您这是什么意思？”

雅科梅的声音中透出一丝担忧。

“我是说，美国人往往把整个太平洋视为他们的专属势力范围。因此，他们可能会质疑我们在该地区获得实质赔偿的权利，认为我们的利益相较于他们，是次要的。”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反驳这种质疑？”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非常充分的论据。”

马蒂重拾了信心。

“首先，应当强调我们在太平洋各地由来已久的权利和经济投资。其次，必须着重我们在战争中付出的人员与物质代价：阵亡的士兵，惨遭屠杀或驱逐的平民，被摧毁的设施，被彻底击垮的商贸。”

“那文化方面呢？”

多里瓦尔忍不住插手此事。他的专业领域为他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证明自身立场的平台。

“从文化角度而言，要点在于将这批藏品呈现为艺术遗产中一份卓越的部分——凭借悠久的传统与举世闻名的博物馆，法国比任何国家都更有资格去保护、研究并弘扬这份遗产。”

雅科梅看起来很满意。

“依我看，这套论证相当严密。”

马西神秘兮兮地向前倾身，显然对自己的效果很满意。

“还有更妙的一招。可以主张，这批主要由法国及欧洲艺术家作品构成的藏品，某种意义上是重返故土。梵高、高更、塞尚、罗丹……这些艺术家全都生于欧洲，活于欧洲，创作于欧洲。他们的作品，留在欧洲的博物馆——尤其是法国的博物馆——远比留在日本更为合适。”

这句话让多里瓦尔兴奋不已：这正是他一直期盼的宽恕。

。

“这真是个决定性的论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品是在回归故里。我们不过是在纠正一个历史的偏差。”

讨论继续进行。马蒂介绍了日本国内局势的最新情况。

“这个国家已经彻底垮了，政府已经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那日本的公众舆论如何？”

日本民众的首要关注点是生存。饥荒威胁着人们，城市遭到破坏，经济崩溃。收藏欧洲艺术品并非他们眼下的当务之急。

“那日本的知识分子呢？艺术界呢？”

多里瓦尔坚持不懈，力求消除他们事业上的任何障碍。

“他们要么死于轰炸，要么彻底陷入瘫痪。战前的日本已被战争摧毁殆尽，重建需要数年时间。”

傍晚七点左右，十一月的夜幕降临巴黎，三人终于结束了漫长的商议。他们为一项全面的战略奠定了基础，这项战略旨在将暂时的查封转变为永久的占有。由于这项战略建立在看似无可辩驳的论据之上，因此更显其威力。

“诸位……”

雅科梅特站起身来，一脸满意，享受着工作圆满完成的喜悦。

“……我想，我们已经具备了所需的一切要素。马泰，我指望您与奥赛码头密切协调我们的行动。多里瓦尔，请继续清点工作，并着手准备将这些作品纳入国家馆藏。”

接下来的几周里，法国媒体开始提及这批“日本藏品”，它们丰富了法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公众舆论也逐渐接受了这些藏品如今已成为法国文化遗产一部分的观点。

专业期刊上发表了精心撰写的文章。文章阐述了法国注定要收藏和推广这些艺术杰作。一些资深记者宣称，这些作品在法国博物馆比在日本更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研究。

在东京这座几乎沦为废墟的城市里，身患重病的松方幸次郎越来越焦虑地关注着法国局势的发展。

在他位于镰仓的家中——这座房子奇迹般地躲过了美军的轰炸——这位家族长者凝视着他留在日本的几件作品。这些绘画和雕塑，是他毕生艺术热情的见证，却也残酷地提醒着他所遭受的巨大损失。

“四十年的收藏……”

他低声对一直尽心尽力守在他身边的女儿花奈说着话，声音微微颤抖。

“……四十年来，我游历欧洲，结识艺术家，与艺术品经销商洽谈……到头来，却眼睁睁看着我的作品，被一个自诩文明的国家没收……”

哈娜从小就和父亲一样热爱艺术，她试图安慰他，但她心里只有一半相信他。其实，她心里早就明白了。

“父亲，或许这只是暂时的。等到和平回归，两国关系恢复正常，法国会承认自己的过错，归还您的藏品……”

老人悲伤地摇了摇头。他一直都很清醒。太清醒了。

“不，我的女儿。我了解国家机器的运作方式。它们一旦攥住了珍贵的东西，就再也不会松手。我的这些藏品，对我们家族来说，已经永远失去了。”

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作品，却沦为了一场残酷游戏的棋子，这场游戏将使它们从他的家族遗产中消失。

更重要的是，此案在国际艺术法领域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

这一先例会开创先例，并引发更多掠夺行为。每一次都披着同样的冠冕堂皇的外衣：正义、更高的文化价值、回归艺术源泉。

在奥赛码头，一个由经验丰富的外交官领导的特别小组成立，专门处理这一敏感事件。其目标很明确：将事实上的侵占行为转化为官方的胜利。

“外交的艺术，”该部门负责人向同事们解释道，“在于用国际法的外衣，去装点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不是拿取，而是收回；我们不是没收，而是修复；我们不是掠夺，而是把西方艺术归还给它的故土。”

他用词巧妙。他为此感到自豪，津津有味地欣赏自己这番语义上的妙笔，将盗窃行为粉饰成伸张正义之举。

这种论调很快被所有相关法国人士所采纳。在各种沟通渠道和官方新闻文章中，同样的词汇不断出现：“归还”、“赔偿”、“合法归还”、“正义”。

最引人注目的是，相关术语迅速在所有相关领域得到广泛接受。博物馆馆长们谈到作品的“归还”，律师们提到局势的“规范化”，外交官们则提到文化关系的“正常化”。

“没收”这个词已经无人再提及，它成了禁忌。

这种语义上的转变并非偶然，而是精心策划的沟通策略的结果。事先已下达明确的指示：避免使用任何可能暗示强行挪用的词汇，尽量使用中性词语，并强调此次行动的文化和教育意义。

短短几个月内，松方事件在法国公众眼中便成了一件成功之事。法国既捍卫了自身利益，又丰富了艺术遗产。任何潜在的批评都被如潮的赞扬声淹没。

只有少数巴黎知识分子圈子里的异议人士继续表达质疑。但他们的声音很容易被官方说法压制，尤其是因为大多数法国人对事件的细节一无所知。

勒内·金佩尔本人虽然起初并不情愿，但最终还是支持了政府的立场。社会压力和他自身的世俗野心战胜了他的犹豫：“这些作品在法国找到了它们真正的精神家园。艺术没有国籍，但它有自己选择的土地。”

他在一次公开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了轰动。最后的抵抗力量也逐一瓦解。

让·科克托被能在卢浮宫欣赏梵高杰作的想法深深吸引，收回了最初的反对意见。艺术评论家们也被近距离研究此前难以接触的作品的的前景所吸引，纷纷成为热情的支持者。

梵高这个诱饵，纵是最敏锐的良知，也难以抗拒。

到1944年12月底，国内的行动已经完成。所有作品都被清点、储存，并纳入国家馆藏。此后，法国再也没有人对这项征用提出异议。

剩下的任务是在国际舞台上巩固胜利。这是最艰巨的挑战，因为必须让盟国相信法国立场的正确性。

与华盛顿的初步非正式接触令人鼓舞。美国人当时正忙于准备结束战争和重建亚洲，无暇顾及此事。他们认为

法国收回被日本收藏家购得的法国艺术家的作品并无大碍。

尽管事实陈述带有偏见，但其优点在于清晰明了。梵高是欧洲人，高更和罗丹是法国人……他们的作品应该保存在欧洲而不是日本，这合乎逻辑。

英国人历来关注私有财产问题，因此态度比较保守。

但他们的反对意见更多是针对形式而非实质。他们希望法国的程序能够一丝不苟地尊重表面形式。

“没问题，”法国外交官自信地回答道，“我们将严格按照战争赔偿法的框架行事。一切都会井然有序。”

这份保险足以让伦敦安心，尤其是因为英国自己也曾对在其领土上的德国货物进行过类似的行动。

因此，到1945年初，法国在各方面的立场都已巩固。在国内，法国获得了一致支持，盟军也没有提出任何不可逾越的反对意见。只有日本可能提出抗议，但日本当时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松方事件就此结束了吗？远非如此。它仅仅进入了最漫长的阶段：事后辩解和向现实妥协的阶段。

因为迟早有一天，我们需要向世界解释法兰西共和国是如何以及为何没收了一位私人公民的财产，而这位公民唯一的“罪行”就是生为日本人。

但眼下，随着欧洲逐渐从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中恢复过来，道德考量显得无关紧要。关键目标已经达成：法国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现代艺术收藏之一。

无论这些藏品是由日本赞助人收集的，还是通过正当途径获得的，亦或是武力没收的，如今都已成为历史。历史，一如既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而这次的赢家是法国的保守派人士，他们的博物馆因此增添了许多艺术瑰宝；是法国的外交官，他们捍卫了国家利益；是法国的领导人，他们化军事失败为文化胜利。

只有失败者，一位年老体弱的贵族，住在镰仓的家中，以及他悲痛欲绝的家人，才明白这场“掠夺”造成的真正人间代价。

在巴黎的沙龙里，人们开始兴致勃勃地谈论未来的展览。

“你敢相信吗？卢浮宫里居然要挂一幅梵高了！”

社交名媛们搓着手，艺术评论家们准备好了热情洋溢的评论，艺术学生们则幻想着能近距离研究这些神话般的作品。

没有人好奇他们从哪里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人们宁愿不去过多地思考这个问题。

多里瓦尔则开始重新布置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厅。他构思了画作的摆放方式，如何运用理想的灯光来凸显梵高的色彩，以及如何完美地摆放罗丹的雕塑。这对他来说，是作为策展人的梦想成真。

他不再追问它的来源。即便追问，也只是匆匆略过，便转移到其他事情上。

雅科梅特则在敲定最后的细节。每件作品都必须列入清单、编目，并纳入国家藏品目录。

马泰继续往返于巴黎和盟军首都之间。必须保持压力，以确保没有人能够挑战法国的战果。

在日本，松方日渐虚弱。从法国传来的消息更加深了他的绝望。

他的女儿花奈竭尽全力保持希望。她给法国当局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为父亲的名誉辩护，重申他的善意和他对西方艺术的真挚热爱。但她的信件却迷失在法国官僚机构的迷宫之中，杳无音信。即便最终送达，也只是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有时，它们甚至根本没有被拆阅。谁也没有闲工夫，去理会一个日本人的这些心绪。

机器已经启动了，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

再过几个月，至多几年，松方收藏就会归法国所有。艺术专家会撰写论文，论述这些战后“获得”的作品。导

游会盛赞法国国家遗产的辉煌。学生们会了解到，法国拥有世界上最精美的印象派艺术收藏之一。

没有人会记得这位痴迷艺术、甚至将全部身家都投入到艺术收藏中的日本男子。

那个时代抹去了松方幸次郎的痕迹。只有他的作品得以留存，从此永远属于法国。

或者差不多。

第四章：秘密谈判

旧金山，1951年夏

1951年夏天，旧金山的费尔蒙酒店热闹非凡。这家坐落在诺布山上的豪华酒店，已经接待了来自51个国家的代表团数周之久，他们前来谈判旨在结束太平洋战争的和平条约。至少在官方层面上是这样。

在盛大的仪式和关于和解的动人演讲背后，每个人都觊觎着自己应得的那份战利品。广岛和长崎惨案发生六年之后，日本帝国的残余势力不得被瓜分。尽管无人敢公开承认，但人们的贪婪却异常强烈。

在五楼的月桂厅，透过窗户可以一览无余地欣赏到海湾和阿尔卡特拉斯岛的景色。四个男人围坐在一张长桌旁。他们开会的目的是什么？“战争赔款问题。”但事实远比这残酷：他们正在敲定未来条约的第十四条，该条款将决定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日本资产将归谁所有。

莫里斯·舒曼象征着战后法国的雄心壮志。作为外交部长和前抵抗运动成员，他属于经历过无数风雨的一代，决心让法国重拾其应有的地位。他的文件上满是手写的笔记。他背负着一个饱受屈辱的国家的伤痛，在他外交辞令的背后，隐藏着复仇的渴望。他一直生活在1940年战败的阴影之下，每一次谈判都为他提供了一个重塑形象

的机会。他的礼貌勉强掩盖着他那在抵抗运动中磨砺出的坚定决心，在抵抗运动中，妥协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他对面，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心事重重。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别代表，艾森豪威尔未来的得力助手，他深知在这个房间里做出的决定至关重要。作为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他精通国际法的复杂之处。对他而言，道德考量必须让位于政治需要。他在华盛顿的政治生涯中早已明白，感伤主义在国家事务中毫无立足之地。然而，他那副冷漠的神态背后，却隐藏着对亚洲共产主义崛起的深深忧虑。

在他右侧的奥利弗·弗兰克斯爵士以外交部闻名的亲和力捍卫着英国的利益。作为一位在伦敦金融城和白厅都经验丰富的资深人士，他巧妙地驾驭了贸易和地缘战略的复杂性。英国既要安抚日本——这个未来对抗苏联的盟友——又要维护其在亚洲的经济地位。弗兰克斯体现了英国化解矛盾的艺术。他优雅的着装和无可挑剔的举止掩盖了他多年在伦敦金融圈磨练出的敏锐洞察力。他深知大英帝国正在瓦解，每一次谈判都是一场捍卫伦敦影响力的后卫战。

面对三位西方领导人，吉田茂一副认命失败的模样。这位日本首相以尊严承担着被占领国家的重担。作为一名

前大使，他深谙游戏规则。但他的回旋余地几乎为零。在美国的掌控下，日本根本没有谈判的余地。吉田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隐藏着深深的苦涩。作为一名老派外交家，他始终坚信谈判的价值。如今，他却不得不为并非自己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去捍卫一个被军国主义领导人摧毁了所有和平崛起希望的国家。

所有人都知道，抛开空洞的言辞，他们正在瓜分数以千计的日本财产，其中包括让巴黎为之着迷七年的松方收藏。

杜勒斯打破了沉默。他的声音里透着疲惫；数周反复的谈判已经耗尽了他的耐心。

“舒曼先生，我必须承认，您在日本私有财产问题上的立场，让我们有些为难。杜鲁门政府希望让日本成为对抗共产主义的可靠盟友，过于强硬的做法，可能引发日本舆论的反感，那将适得其反。”

舒曼报以微笑，笑容中丝毫没有流露出他的真实意图。他早已学会掩饰自己的想法。

“杜勒斯先生，我想提醒您几个在和解的喜悦中容易被遗忘的事实。法国因日本在印度支那的侵略行为，遭受了巨大的物质与人员损失，更遑论日本与纳粹德国的勾结。我们的诉求，完全符合国际法——而这国际法，正是美国在1918年之后帮助确立的。”

法国部长私下里明白，法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否则就只能沦为一个二流国家。1940年的屈辱仍然让他耿耿于怀，从昔日敌人那里争取到的每一项让步，都算是对过去的一次小小的报复。

他打开面前的一个纸板文件夹，上面标有“机密 - 印度支那的损害”。

“我方评估的损失超过两百亿法郎：基础设施损毁，生产损失，法国平民惨遭屠杀……不胜枚举。我们理应以位于我国境内的日本财产，追回部分损失，这合情合理。”

奥利弗爵士以典型的英式风度介入此事。但他的言论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无辜。

“我们都希望，日本能成为亚洲抵御苏联扩张主义的一道屏障。这就需要我们……展现某种宽宏。”

弗兰克斯斟酌着每一个字。他和蔼可亲的外表下，隐藏着深深的挫败感。大英帝国正在瓦解，而他却不得不与那些颐指气使的美国人打交道。他曾亲眼目睹维多利亚时代帝国的辉煌，如今却只能无奈地看着它走向衰落。每一次谈判都让他意识到，伦敦如今不过是华盛顿的次要伙伴。

他转向吉田。

“此外，总理先生，我们想知道您对私有财产问题的立场。”

吉田认真聆听着他们的对话，斟酌着每一个字。他说话极其谨慎，如同一个被占领国家的领导人。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幻灭的沉重。他毕生都信仰西方文明，信仰其正义和公平的价值观。然而，战争让他彻底失望，让他明白，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民主政体也可能像专制政权一样冷酷无情。

先生们，日本政府理解你们关于战争赔款要求的合理性。我们准备承担我国在1937年至1945年间推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损害的责任。

他试图表达反对意见，但又不想显得是在挑战胜利者的意志。他曾倡导温和，如今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被那些披着道德外衣的人肢解。

“然而，必须区分日本的国有财产——它可以合法地作为公共赔偿而被没收——与我国国民的私有财产：根据西方法律传统，私有财产享有不同的法律地位。”

这番恭敬的话语激怒了埃蒂安·瓦瑟尔。这位法国副代表对这份文件了如指掌，正是因为如此才被选中。瓦瑟尔怀揣着未能如愿的抱负，他曾渴望身居要职，却最终满足于次要角色。他用过分的热情弥补了这一点，尽职尽责地履行职责。

首相先生，这种区别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泾渭分明。有很多案例表明，名义上的私有财产被用于资助贵国的战争，或者通过军事征服所得的利润获得。举个具体的例子：松方幸次郎收藏的著名西方艺术藏品目前位于法国，自1944年以来一直被法国合法扣押。

吉田撅起了嘴。他的声音里透着一丝恼怒，再也掩饰不住了。

“瓦瑟尔先生，您这是在暗示，所有日本私人财产都天然可疑，都可以以曾为我国战争出力为由加以没收吗？”

“不，我们并没有采取不分青红皂白的没收政策，”瓦瑟尔故作和蔼地回答道，但这番话骗不了任何人。“至于松方先生的藏品，它是由一位实业家收集的，他的钢铁和造船公司为日本的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松方先生掌管川崎造船厂，该造船厂建造了你们舰队的大部分舰艇。参与珍珠港事件和太平洋战争的多艘战列舰和航空母舰都出自他的造船厂。因此，可以合理地认为，他的私人财富，以及他的艺术收藏，都是靠战争工业的利润积累起来的。”

这段论证充分暴露了瓦瑟尔的诡辩伎俩。他擅长将近似值转化为确定性，将相关性转化为因果关系。

这场争论引起了轰动。杜勒斯感到有必要介入，与其说是出于对日本人的同情，不如说是出于维护地区平衡的考虑。

“瓦瑟尔先生，您提到的这批藏品，眼下是什么状态？”

舒曼想代替瓦瑟尔作答，于是转向他的一位顾问，顾问递给他一份专门为此准备的四页纸的说明。

杜勒斯先生，这批独一无二的藏品是法国当局根据1944年10月5日关于敌方财产的法令合法查封的。它包含数百件无价的西方艺术作品。

“您是说，应当以战争赔偿的名义没收它？”奥利弗爵士问道。

“正是如此，”舒曼证实道。“考虑到法国遭受的巨大损失，这算是合理的赔偿。此外，这些法国或欧洲艺术家的作品理应留在它们的原产地。”

这位法国部长展现了他高超的修辞技巧。他的论证背后蕴藏着坚定的信念。法国有权利，也确实有义务，收复战争和占领给她造成的损失。在舒曼看来，道德准则是一种奢侈品，只有最终的胜利者才有资格承担。

吉田的抗议异常激烈，这与他一贯沉稳的外交作风截然不同。他对西方正直的最后一点幻想也彻底破灭了。

“各位，我必须提醒诸位几个基本事实。松方先生是一位热爱西方艺术的伟人，一位开明的赞助者，他建立收藏完全是出于文化目的。”

日本首相意识到，尽管披着法律外衣，他正目睹强权战胜法律的局面。他毕生信奉外交，如今却发现外交的真面目：一场伪装成思想辩论的权力斗争。

瓦瑟尔露出了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表情，这足以说明他内心的想法。

一首相先生，松方先生的良好意愿，无论多么值得尊敬，都无法抹杀一个客观事实：他的收藏是靠重工业的利润积累起来的，而这些利润随后又大规模地用于支持你们对抗西方民主国家的军事机器。

他佯装出一副同情的表情，向吉田倾身。瓦瑟尔享受着这掌控一切的时刻。纵观他的职业生涯，他一直不得不向比自己强大的人低头。而现在，他终于有机会行使自己的权力了。

“法国只是在依照赔偿原则，收回本应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其中，绝无针对松方先生的任何个人恶意。”

谈判的真正利害关系逐渐明朗。杜勒斯急于维持会议的平衡，试图重新聚焦讨论。这位美国人开始变得不耐烦。在他看来，与冷战的挑战相比，这些欧洲国家围绕文化声望的争执显得微不足道。

“各位，我建议我们从更具体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条约第十四条究竟应当赋予盟国没收其领土内所有日本财产的权利，还是应当依据财产性质加以区分。”

舒曼立即抓住机会，拓宽辩论范围，以便更好地宣传自己的立场。这位法国部长深谙如何将具体案例转化为普遍原则。

“杜勒斯先生，这正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主张的。第十四条应当明确规定，每一个盟国都拥有主权权利，可以毫无例外、不受限制地保留其领土管辖范围内的一切日本财产。”

“但我认为这种措辞过于宽泛，”奥利弗爵士反对道，“理论上，这将允许任意没收财产，而不受任何控制或追索。”

弗兰克斯表达的是真切的担忧。这位前银行家深知，信任是任何国际经济体系的基石。过于系统性的没收行为有可能破坏这一体系的稳定。

“不，”瓦瑟尔回答说，“因为这些没收行为将受各盟国国内法的约束。因此，可以保证在有管辖权的国内法院寻求救济。”

吉田不再掩饰心中的愤恨，他愤愤不平地摇了摇头。

“瓦瑟尔先生，您所说的这些保障，纯属纸上谈兵，因而也是一种幻象。实际上，没有任何一国的法院，会判决一名日本公民胜诉，对抗它自己的政府。”

吉田的这番话让法国代表团一时尴尬。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拟议制度的根本虚伪之处。

舒曼很快重新掌握了主动权。

“总理先生，您把情况说得太严重了。法国法院独立运作，严格尊重财产权。但它同样尊重政府为国家最高利益而采取的合法行动。”

“换句话说，”吉田带着失望的清醒低声说道，“我们的公民最终将无法有效地追究你们的没收决定。”

舒曼反驳道：“你把事情说得太负面了。这仅仅是应用几个世纪以来文明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的经典国际战争赔偿法的问题。”

这位法国部长采用了当时盛行的论调：援引“文明”来为不可辩解的行为辩护。舒曼并没有被他的诡辩所蒙蔽，但国家利益凌驾于道德考量之上。法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重夺其地位。

杜勒斯认真聆听了这段意味深长的对话，斟酌着措辞。这位美国政治家意识到，他正在目睹一种合法掠夺机制的形成，但迫于形势，道德顾虑最终还是被压倒了。

“各位，在深思熟虑双方提出的论点之后，我认为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合理方案。”

他先咨询了顾问，然后才继续进行下一步。

“第十四条可以赋予盟国保留其领土内日本财产、以充作战争赔偿的权利，但应注明：这项权利的行使，须符合各自的国内法律，并尊重各自的传统。”

吉田抗议道：“这种澄清并不能改变根本问题，反而使情况更糟，因为它让那些仍然任意妄为的没收行为看起来合法了。”

日本首相感到脚下的土地开始崩塌。他的整个世界观正在瓦解。他曾笃信西方理想，如今却发现这些理想不过是掩盖世俗欲望的一层外衣。

“或许如此，”杜勒斯坦率地承认道，这令在场众人感到惊讶，“但它的好处在于能够维护体面，并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框架。每个盟国都将在运用其自身的正义观念方面，保有主权。”

这位美国人正是以此来阐释他的全部理念：只要形式上符合规范，信念本身并不重要。

奥利弗爵士点头表示同意，明显松了口气。

一在我看来，这项妥协方案合理且平衡。它既维护了盟国的利益，又维持了一个避免纯粹任意性的框架。

舒曼内心无比喜悦。他终于得到了他来旧金山的目的：一个无可辩驳的国际依据，使没收松方收藏品和法国境内所有其他日本财产的行为合法化。

“杜勒斯先生，这一切，我们完全同意。”

吉田意识到自己败局已定。他最后的辩解未能动摇西方人的决心。战败并被占领的日本已无力保护其海外公民的私有财产。他所感受到的失望与他对这次会议寄予的期望成正比。他曾天真地以为自己能够唤起西方人的良知。如今他发现，良知是有地域限制的。

接下来的几天都在对最后的细节进行微调。所有代表团对最终文本的正式同意至关重要。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至关重要。每一个细微差别都可能造成数百万美元的损失。

1951年9月8日，旧金山歌剧院成了虚伪的舞台。48个国家在数百名记者面前庄严地签署了和平条约。经过艰苦谈判，最终达成的第14.2.1条规定，每个盟国都有权“*扣押、保留、清算或以其他方式利用其领土内所有日本及其国民的财产、权利和利益*”。

一句看似无关紧要的句子，淹没在大量赔偿条款之中。实际上，它决定了松方收藏以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数千件其他日本文物的命运。这些文物将永远无法回到原主人手中，而他们的追索权也荡然无存。

协议签署后不久，法国媒体便精心策划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恶意炒作。官方机构早已向其联络人做了详尽的通报。《费加罗报》的头条标题赫然写着：“法国收回日本艺术杰作”。《世界报》则故作高深地解释说：“这些法国艺术家的作品正在回归故土”。《人道报》甚至赞扬了“将私人收藏移交给国家博物馆，实现了艺术获取渠道的民主化”。

法国公众舆论大多对真正问题一无所知，几乎一致表示赞同。谁又能质疑法国向其昔日敌人索要赔偿的权利呢？只有少数来自最见多识广的艺术圈人士，才怯懦地质疑这种大规模挪用的道德合法性。

这台精巧的织机已臻于完美。松方收藏品却失传于后人之手，被困于一张错综复杂的网中，即便耗费数十年，也难以解开其所有复杂的机械构造。

更严重的是，此案开创了一个重大先例，启发了许多其他“合法”的掠夺行为。每当一个国家想要侵占外国财产时，它都可以援引《旧金山和约》以及法国对该条约第14条的解释。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一法律先例被广泛援引。英国人用它来没收德国在马来亚的种植园。澳大利亚人用它来查封日本在南太平洋的资产。甚至一些南美国家也援引这一先例将外国公司国有化。

松方案几乎是偶然地催生了一个新概念：“文化赔偿”。根据法国法学家事后提出的理论，遭受侵略的国家可以没收侵略者的文化财产，不仅可以作为经济赔偿，还可以“丰富国家文化遗产”。

这一理论被系统化地阐述在多篇博士论文、专业期刊的学术文章以及国际公法课程中。短短几年内，最初出于机会主义目的的挪用就发展成为一套受人尊敬的理论。法国此举的精妙之处在于将武力行为转化为法律原则。

在日本，这场盗窃造成的惨痛后果令人痛心。1950年6月，松方家族的族长去世，他们悲痛欲绝，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艺术遗产被洗劫一空。

已故收藏家的长女松方花奈经常把幸存的家人聚集在镰仓的祖宅。这些充满深沉忧伤的聚会，见证了面对那台已经启动的、针对他们的机器时，这个家庭所遭受的痛苦。

“我亲爱的兄弟们，”她在1951年秋天的一次会议上，一边读着报道条约签署的报纸，一边说道，“报纸解释说，政府已经接受了盟军的条件。他们说这是为了国家重建，为了我们的未来。但我们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父亲的收藏没了。永远没了。”

她的声音里透着一丝苦涩的无奈。花奈继承了父亲对艺术的热爱，也继承了他对国际权力格局的敏锐洞察力。她明白，她的家族正在为她一直以来都反对的那个军国主义政权的错误付出代价。

松方博，家中最小的儿子，也是被占领者摧毁的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凝视着客厅里仅存的几件战后幸存的西方艺术品。他手里拿着一封皱巴巴的信，这是父亲去世前写下的最后一封信之一。

“父亲这几个月来的担忧不无道理。你还记得吗，花奈？他彻夜难眠，在屋里来回踱步。他预感法国人永远不会归还他的画作。临终前，他常对我说：‘他们找到了让盗窃合法化的办法，博。真是诡计多端，高明至极。’我当时觉得他言过其实，以为是病让他变得悲观……”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深深的愧疚。博自责没有认真对待父亲的担忧。他一直认为，艺术方面的事情远不如重建的经济挑战重要。

兄弟中最小的幸介以最小的孩子特有的天真无邪介入了此事。

“但是，我们难道不能向法国法院上诉吗？聘请律师？陈述我们的理由？肯定有办法的……父亲在法国受人尊敬，他有人脉，在艺术圈也有朋友……”

哈娜悲伤地摇了摇头。她已经尝试过所有这些途径，也谨慎地联系了巴黎的一些熟人。她的失望与她曾经怀揣的希望成正比。

“可怜的幸福，哪来的钱？我们的财产被没收了，生意被拆散了，家道中落。就算我们有钱——但我们根本没有——相信我，你觉得法国法庭会判日本人胜诉吗？我们成了贱民，昔日的敌人如今也只能勉强被容忍。”

她起身走向俯瞰自家花园的阳台，那里还摆放着几座西方雕塑，见证着父亲曾经的热爱。看到它们因为无力维护而任其风吹雨打，她心如刀绞。

“我的兄弟们，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已经不是那些藏品了。当然，这很令人心痛。但最让我愤慨的是，像法国这样的文明国家竟然会侵占一位私人收藏家的财产……爸爸如此热爱这个国家。他在这里有朋友，有自己的生活节奏。而他们就是这样回报他的吗？这简直是对超越国界和民族仇恨的艺术的扼杀。”

这段对话揭示了松方案背后隐藏的人性悲剧。但谁又会在乎呢？

法国当局忙于处理征用事宜的具体细节，无暇顾及此类抱怨。他们的重点是组织将这批藏品融入国家遗产体系。他们需要采取切实可见的行动。

1951年秋，雅克·若雅尔启动了一项庞大的计划，旨在修复和编目被没收的艺术品。他组建了多个团队，负责评估每件艺术品的状况并建立详细的记录。一项重大的行政改革也随之展开。

“先生们，”若雅尔说道，“我们有责任——我强调这一点——保护和弘扬这份遗产。我们必须向世界证明，法国是收藏这些艺术杰作的最佳国家。我们绝不能让人说我们掠夺了战争的战利品。”

在公众面前的自信背后，若雅尔内心深处却隐藏着令他夜不能寐的良心不安。作为占领时期抵抗运动的一员，他曾冒着生命危险从纳粹手中拯救国家藏品。如今，他却发现自己身处自己曾经与之对抗的掠夺者的位置。他深知此境的荒谬，但为了法国的福祉，他选择压抑这种感受。

负责监督这项行动的伯纳德·多里瓦尔全身心投入其中。他对现代艺术有着近乎痴迷的热情。

——我们现在拥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彻底革新我们的国家馆藏！有了这些藏品，我们的博物馆终于能够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国家美术馆等世界顶级博物馆并驾齐驱……

多里瓦尔内心深处怀有深深的挫败感。他一生都只是二流策展人，却将松方事件视为在法国艺术界留下自己印

记的良机。他屡遭挫折的抱负最终在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中找到了出口。

1952 年 6 月，卢浮宫开幕，举办了名为“重新发现的杰作：西方艺术服务于法国文化”的展览。

国民教育部长亲自出席。巴黎各界精英云集博物馆：艺术评论家、寻求文化熏陶的社交名流，以及出席著名展览开幕式的常客。

《法国星期日报》的头条标题是“一件杰作！”其他报纸也纷纷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蜂拥而至的参观者们也热情高涨，纷纷驻足欣赏画作。许多人发现，这些作品是他们从未想过会在大西洋彼岸看到的。

在专业期刊上，专家们竞相展现渊博的学识。他们对藏品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就其对法国文化遗产的贡献发表了学术评论。最终，各方意见一致。

差不多吧。

少数捣乱分子，主要来自极左翼，暗中提出了这笔“财富积累”背后可疑的内幕。但他们的抗议淹没在官方的祝贺声中。再说，当人们可以欣赏莫奈和雷诺阿的画作时，谁又愿意听这些扫兴的人呢？

法国公众舆论迅速接受了松方藏品，仿佛它一直都是国家文化景观的一部分。如此看来，任务完成了。

既成事实本身就具有合法性。

但任何精妙的机制都有其缺陷。而这个机制却是建立在一个弥天大谎之上的。

与官方宣传的说法相反，松方幸次郎绝非“战争投机者”。他的公司确实为日本的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与日本所有公司一样，面对独裁军国政权，他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做。

更令人不安的是，他的收藏品可以追溯到战前。这些收藏品非但没有体现日本的侵略性，反而象征着一个面向世界、尊重其他文化的日本。

真相被法国官方版本所掩盖，并将长期隐藏在阴影之中。

与此同时，在卢浮宫和其他法国博物馆恒温恒湿的藏品库中，被没收的文物默默地见证着一场无人愿意目睹或聆听的人类悲剧。

当时，到了1952年底，这起案件似乎已经结案。松方一家悲痛欲绝，家道中落，除了哀悼他们的族长之外，别无他物。

松方幸次郎的去世使家族失去了最受尊敬的领袖。只有他的子女才会永远铭记这段痛苦的回忆。

松方花奈将余生都奉献给了这项工作，耐心地收集与父亲收藏有关的所有文件，希望有一天真相能够大白——这

在1952年似乎是一个相当渺茫的希望。直到1958年底，事情才开始有了进展。

第五章：归还的闹剧

拉布瓦斯里耶，科隆贝双教堂镇，1958 年 12 月

《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法国没收了松方藏品的全部，这令所有人都感到不满。法国当然可以全部据为己有。但几个月来，为了维持与日本的良好关系，法国方面似乎认为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于是，他们考虑部分归还藏品。这是一项自愿行为，被包装成慷慨之举……

戴高乐将军在1958年5月13日阿尔及尔政变后几个月重新掌权，如今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他周末在位于科隆贝双教堂镇的私人住所“拉博瓦塞里”度过，这是一次认真研读的周末。整个星期六，他都用来阅读大量文件，特别是司法部长米歇尔·德布雷起草的关于松方藏品的法令草案。

星期一早上，将军正准备返回马蒂尼翁酒店，政府首脑就住在那里。

早上八点左右，由司机弗朗西斯·马鲁驾驶的DS 19型轿车已准备就绪。戴高乐将军上了车，坐在后排右侧的座位上。这通常是留给他妻子伊冯娜的座位。但由于她身体不适，当天未能同行。在前排，副官加斯顿·德·博纳瓦尔上校发出出发信号。博纳瓦尔毕业于圣西尔军校，曾在黎凡特服役，之后加入抵抗运动。1943年，他被盖

世太保逮捕，随后被驱逐到毛特豪森集中营，并于1945年获释。作为将军的知己，在戴高乐将军的“荒野岁月”——那段艰难时期，他没有担任任何政府职务，也退出了政治活动一期间，博纳瓦尔上校一直是他的忠实伙伴。

将军很难适应新车的液气悬挂系统，这让他感到恶心。他更喜欢之前驾驶的那辆15马力、6缸前驱车。然而，正是这辆DS 19在几年后的小克拉马尔刺杀事件中救了他的命。尽管两个轮胎布满弹孔，这辆雪铁龙仍然凭借自动水平调节悬挂系统和独立车轮系统继续驶向维拉库布莱机场。

车队由一辆支援车和两名宪兵摩托车手组成，已经行驶了近一个小时。

将军向博纳瓦尔示意，请求休息一下，舒展一下筋骨。正当他要离开时，又邀请博纳瓦尔坐在他身边。博纳瓦尔对这位伟人如此亲近的举动感到受宠若惊。

“博纳瓦尔，关于一件让我颇为挂心的事，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戴高乐比他的副官年长约二十岁，经常向他征求意见。这种代沟对戴高乐来说弥足珍贵，使他能够获得不同的视角。

“将军，我随时听候差遣。”

戴高乐迅速向博纳瓦尔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向他概述了德布雷提出的法令草案。

“博纳瓦尔，如果我们把手上的部分作品归还给日本人，你认为公众舆论会感到震惊吗？媒体会有不利的反应吗？”

“将军，我绝非这方面的专家，恐怕我的看法帮不了您太多。不过我认为，眼下民众更关心阿尔及利亚的局势。母亲们担心军队征召了义务兵。每天都有数十名士兵在冲突中伤亡。至于媒体，他们原则上对您抱有敌意。这桩日本事务不会引起太多人的兴趣。公众舆论还有更紧迫的事情要操心……”

“是的，但在国际层面上，这难道不会对我们不利吗？”

“将军，自去年11月以来，苏联向西方列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六个月内从西柏林撤军，各国外交部都因此备受煎熬。在这种情况下，松方文集的再版不太可能引起任何轰动。”

“谢谢，博纳瓦尔。和往常一样，你的看法总是入情入理……”

当时是上午 11:30。从“La Boisserie”到马蒂尼翁酒店，全程 263 公里，一路平安无事。

戴高乐立即前往办公室，那里已经安排了一场会议。在休息室里，几位同事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例行问候过后，讨论便开始了。

“将军，”德布雷指着摊在桌上的装订好的文件说道，“有了我上周发给你的这份文件，我们就能解决松方藏品这个棘手的问题了。当然，同时也能维护我们重要的文化利益。”

德布雷受过律师训练，但他的职业是政治家。戴高乐曾在1944年亲自处理过这个棘手的问题，当时这个问题被扣押，如今他再次审阅法令草案的条款，并像对待国家主权问题一样认真对待这些问题。

“司法部长先生，请提醒我一下我方与日本人谈判达成的协议条款。我要确保我们没有做出任何可能损害我方立场的让步。”

“总的来说，我们达成的协议符合我们的利益。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已从松方氏继承人那里获得了对包括我们所持有作品在内的全部藏品的最终且不可撤销的放弃。该协议还涵盖了所有程序性问题。它将由日本主管当局批准，并按照相应的国际程序进行登记。”

的部长级代表安德烈·马尔罗认真地听着。然后，他用他所有关于艺术的演讲中都特有的强调语气发表了讲话。

就他而言，审美热情与近乎荒谬的夸张言辞的过度喜好并存。

“总而言之，这项协议巧妙地保留了我们核心藏品，同时又展现了国际慷慨的姿态。法国保留了最重要的十八件作品。作为交换，我们将其余藏品一约三百件次要作品——‘赠予’日本，在东京一座专门建造的博物馆中展出。由此，我们将一次被迫的归还转化为一次意义非凡的和解之举。”

“请您详细说说继承人对这项安排的接受情况，”戴高乐问道，语气中带着一位早已习惯于对政策逆转抱有戒心的政府首脑的怀疑。

外交部长兼谨慎的外交官莫里斯·库夫·德·穆维尔郑重地从他的皮质公文包中取出几封饰有立体印章的官方信件。

“将军，我们已从继承人那里获得了明确且无可辩驳的放弃声明。这是由他们的代表松方三郎签署的正式信函。在这份文件中，他明确且最终地放弃了对其已故父亲全部藏品的所有现有和未来权利。”

他小心翼翼地展开了文件。

我们经过数月的谈判才获得这份文件。它不仅涵盖了归还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还涵盖了保留的作品。继承人正式放弃在任何法院提起任何后续诉讼的权利。

戴高乐仔细审阅了这份文件，逐字逐句地推敲。他厌恶这种将他臆想的宏伟与日常生活琐碎割裂开来的交易。

“这份弃权声明，您认为完整而确定吗？我们的法务部门核实过所有细节了吗？”

“绝对如此，”时任将军参谋长的乔治·蓬皮杜肯定道，“我们已经仔细审查了所有形式方面，没有任何瑕疵。”

蓬皮杜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拥有古典文学教师资格，他的职业生涯始于马赛的一所高中，之后加入法国最高行政法院，随后又进入罗斯柴尔德家族。他在银行业的经历让他掌握了盈利交易的技巧，但也培养了他对金钱近乎病态的迷恋，这与他高雅的文学品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亲自监督了谈判中的财务环节。他了解市场价格，并且深知法国正在进行一项稳妥的投资。

“此外，”他补充道，“我们保留的这十八件作品占总价值的80%以上。恕我直言，我们留下了精华，把糟粕都送人了。”

马尔罗用诗意的语言阐述了他对这项手术的理解。

将军，这批藏品充分展现了永恒的法国的辉煌与文化底蕴！我们并非像私人收藏家那样将这些杰作束之高阁，而是将它们捐赠给日本人民，让他们有机会欣赏西方艺

术，同时保留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丰富我们的国家文化遗产。

他激动地比划着手势，疯狂地眨着眼睛，这种小动作在他情绪激动时会更加剧烈。

一将军，这才是最高水平的文化外交！法国正在充分发挥其作为文明国家的作用，并将争端转化为影响力工具！

“马尔罗，”戴高乐插话道，“你和我一样清楚，我们根本不‘捐赠’任何东西。我们只是归还那些我们再也无法在道德上保留的东西，同时保留那些我们最感兴趣的東西。”

将军一针见血的评论让马尔罗一时语塞，他只是尴尬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泄露了他的不自在。即使在他最真挚的发言中，他仍然保持着足够的清醒，能够把握自己言辞的界限。德布雷急于将讨论的重点重新拉回到实际问题，他承认戴高乐思路清晰，同时也赞赏将军直奔主题的能力。

将军，您已经充分认识到这次行动的真正利害关系。但就国内和国际宣传而言，重要的是要让这次部分归还被视为法国对日本真正慷慨的姿态。在我们亟需亚洲盟友的当下，这将极大地有助于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库夫·德·穆维尔考虑到长远影响，阐明了整个谈判背后的问题。

“将军，此事属于我们新的亚洲政策的大框架之内。日本正成为欧洲重要的经济伙伴。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我们非常重视与东京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的法国出口商正在日本市场占据重要地位，我们的制造商正在与日本同行签署重要合同，我们的银行也在东京开设分支机构。在此背景下，任由一场正在毒害我们双边关系的文化争端持续发酵，实属愚蠢。这一切仅仅是为了几幅从未离开过我们馆藏的画作……我已经私下联系了国民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罗伯特·舒曼。他对此事非常了解，因为他曾代表法国参与1951年《旧金山和约》的谈判。他的意见很明确：我们目前的利益要求我们将大部分藏品归还给日本。”

“那就这样吧，”戴高乐宣布道。“但让我们回到这项行动的宪法层面。为什么以法令而非通过正常的立法程序来进行呢？”

这个直白而尴尬的问题让餐桌旁的人明显感到不自在。德布雷尴尬地和蓬皮杜交换了一个眼神。他的个人野心驱使他去讨好戴高乐，但他的法律背景却让他警惕专制主义的危险。

“一般来说，正常的立法程序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议会辩论，其中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而这项法令属于监管权力的范畴，使我们能够更快地推进，避免可能令政府难堪的公开辩论。你能想象共产党议员们会如何利用这个问题吗？或者更糟的是，那些顽固的戴高乐主义者会如何指责我们‘出卖国家遗产’？”

“尴尬？究竟是指哪方面，司法部长先生？”戴高乐带着他那毫不留情的好奇心追问道。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总能察觉到有人在对他隐瞒什么。

德布雷犹豫了。他内心的律师本能与朝臣本能正在交锋。

一嗯，将军……一些反对派成员可能会忍不住想打探消息。甚至我们多数派内部也可能有人会这么做。他们可能会质疑我们1944年获得这批藏品具体情况。最好还是避免重提这些陈年旧事，毫无意义。

库夫·德·穆维尔谨慎地介入，他的矜持暂时压倒了他的忠诚。

而且，议会辩论必然会给松方家的继承人提供发声的平台，也会给所有想要反驳我们说法的人提供机会。

戴高乐皱起了眉头，而且眉头皱得很紧。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的自尊心无法容忍别人质疑他过

去的决定，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混乱时期做出的那些决定。

“各位，我真诚地希望，你们不是在暗示，1944年那次征用一由我亲自决定并承担全部责任一本身就有问题？或者说，在道德上应受谴责？”

“不，当然不是，将军！”德布雷回答说。“绝对不是！但您也知道议会辩论就是这样……它们经常会偏离主题，讨论一些次要问题。而我们的对手就喜欢这样。”

马尔罗觉得有必要缓和一下气氛。这位文化部长有能力将讨论引回更有利的方向，他那略带自负的知识分子作风反而服务于集体利益。

将军，这项法令也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它并非一项例行的行政措施，而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举措。它与您对法国辉煌成就以及我国在世界文化影响力的愿景不谋而合。

戴高乐看起来平静多了。那些客套的恭维话总是能让他产生这种效果，满足了他渴望被认可的需求，而这种需求与他对公众舆论的公开蔑视却又奇怪地并存在一起。

“好，诸位。但这项法令，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吗？”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的做法有违宪法，但谁也不敢当着将军的面承认这一点。

蓬皮杜巧妙地采取了行动。他作为银行家的训练教会了他如何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规避法律障碍。

“将军，宪法是一部活的文本，必须适应政府施政的具体需要。这项法令，正契合我们制度的精神。”

戴高乐回答说：“蓬皮杜，宪法不是手风琴，不能根据情况随意伸缩。它的制定非常精确，旨在规范公共权力机构的行为。”

德布雷意识到局势变得危急，决定亮出底牌。

“将军，我们都希望您签署这项法令，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困扰我们并开始使我们与日本的关系紧张的问题。从严格的宪法角度来看，这项法令或许并不完全符合正统，但它无疑符合法国的最大利益。”

这种直言不讳反而让戴高乐感到安心。他喜欢别人直接跟他说话，比起那些令他反感的外交辞令，他更喜欢赤裸裸的真相。

“司法部长先生，我很感激您的坦诚。好。但请不要指望我相信，这项程序在宪法上无可指摘。我们都清楚，事实并非如此。”

德布雷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

“将军，这是否意味着，您愿意签署？”

戴高乐权衡了这一决定的利弊。他在苦难中磨砺出的现实主义最终战胜了他的理想主义。

“是的，司法部长先生，我同意签署。但有一个绝对且不容商榷的条件：这项法令的措辞，必须完整维护法国

的荣誉与尊严。我们绝不能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寻常的掠夺者，或是任意妄为的没收者。”

马尔罗急忙就这一关键点向戴高乐保证，他的爱国情怀与将军的爱国情怀不谋而合。

将军，该法令序言强调了法国的传统辉煌及其文明作用。我们明确强调，这次部分归还还是“本着法日和解与文化合作的精神”进行的。这体现了法国对昔日敌国的慷慨。

“那么，关于我们保留的那十八件主要作品，具体怎么安排？”

我们郑重声明，这些作品旨在“丰富法国文化遗产，造福全人类”。它们将“在我国最著名的国家博物馆展出，以促进我国公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的艺术教育”。任何人都无法指责我们行事心胸狭隘或自私自利。

戴高乐点点头，他被这维护法国形象的措辞所打动。他找到了一种方法，既能调和自己的政治利益，又能体现他对法国伟大的理解。

“这样很好，诸位。松方事件，就此了结。”

他拿起刻有共和国国徽的金笔，以坚定果断的姿态签署了命令。

但距离马蒂尼翁宫几百米远的地方，在皇家宫殿的一间小附属建筑里，气氛却截然不同，远没有那么欢欣鼓舞。文化部顾问安德烈·布吉瓦尔正在第十遍重读法令文本。他作为法官时培养的严谨职业操守，使他无法对最明显的违规行为视而不见。在房间里，四面墙的书架上堆满了文件，博物馆总监皮埃尔·莫伊诺就站在他对面，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莫伊诺以近乎固执的正直著称，但也正是这种正直为他赢得了所有同行的尊重。

“安德烈，”莫伊诺说道，“从道德角度来看，这项命令让我非常不安。我们实际上是在认可一种在宪法上存在疑问的程序，以掩盖同样可疑的挪用行为。”

布吉瓦尔苦涩地表示赞同，他因数周失眠而面容憔悴。

“皮埃尔，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好几个星期了。宪法第92条根本不能充当这项艺术品捐赠的法律依据。这需要议会依正当程序表决通过一项法律，经过公开辩论，并允许提出修正案。”

“倘若有朝一日，这项法令在国务院受到质疑——无论是继承人还是独立法律界人士提出的一——我们具体会面临什么风险？”

布吉瓦尔思考了很久。

“坦白说，皮埃尔，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国务委员会历来尊重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特权，避免干预我国外交的具体细节。但它也通常非常重视尊重宪法程序，并且毫不犹豫地谴责滥用权力的行为。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身处一个灰色地带。此案涉及物权法、宪法、国际法等多个方面……对于这种混合情况，尚无明确的判例。”

“从法律角度看，依你之见，我们最薄弱的一环是什么？最可能在长远来看给我们带来麻烦的，又是哪一点？”

布吉瓦尔没有丝毫犹豫。

“毫无疑问，是对日宣战这一根本问题。我越是仔细研究这些事实，就越发意识到，我们对日本的官方交战状态，建立在极其脆弱、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存在的基础之上。”

莫伊诺打开面前厚厚的活页夹，里面塞满了档案文件和泛黄的电报。他对细节的关注让他有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发现。

“我让人做了一些调查。结果证实了此前发现的疑点：宣战声明从未正式公布过。”

他拿出了几张纸。

“更严重的是，这份宣战声明甚至从未正式通知过日本有关当局—无论是直接通知，还是通过第三国转达。严格依照国际法，一份既未公布、也未通知的宣战声明，不具备任何效力。”

“那岂不是说我们在法律上从未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布吉瓦尔越来越惊讶地问道。

“没错，安德烈。如果我们从未正式与日本交战，那么1944年那项把日本人定性为‘敌国国民’的法令，就完全没有法律根基。整个没收体系，都将随之崩塌。”

布吉瓦尔起身走向可以俯瞰皇家宫殿花园的露台。

“皮埃尔，我们正在见证一座看似坚固的脚手架被搭建起来—可它的地基，却摇摇欲坠。”

“你这是什么意思？”

布吉瓦尔回来坐下，把文件摊在桌子上。

“你仔细想想这中间的逻辑链条。1944年的法令，依据的是一种从未在法律上真正存在过的对日战争状态。1951年《旧金山和约》适用于‘敌产’，可如果我们从未与日本交战，那么在法国境内的日本财产，按国际法的定义，根本就不是‘敌产’。这项法令，实际上是在为一桩本应完全属于立法机关职权范围的艺术品‘捐赠’背书……”

“你真的认为，这整座大厦有朝一日，会像纸牌屋一样轰然倒塌？”

“我认为，我们搭建的是一座并不稳固的建筑。终有一天一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后一会有人拥有足够的勇气、财力和必要的人脉，在有管辖权的法院正式提出挑战。到那时，这一切都会崩塌。”

他们的谈话被贝尔纳·安东尼奥兹的到来突然打断了。这位将军的姻亲侄子—安德烈·马尔罗办公室的文化事务顾问—带来了首相的最新指示。他似乎很着急，也没什么心情说话。

“诸位，松方事件必须了结。将军不想再听到任何形式的争议。”

安东尼奥兹说话的口气像是不容置喙的人。布吉瓦尔觉得他需要谨慎行事。

“安东尼奥兹先生，我们对整套安排的长期稳固性，有一些……疑虑。”

“什么样的疑虑？”

他的语气中明显带着不耐烦。莫伊诺开始滔滔不绝地解释，详细列举了他发现的每一个缺陷和矛盾之处。安东尼奥兹听着，但他脸上的表情却预示着不妙。

“诸位，这些细枝末节，从学理上说固然有趣。但我们不该因此忽视法国的重大利益。”

啊，所谓的“更高利益”……布吉瓦尔并没有被蒙蔽。

“什么样的利害关系？”

“首先，”安东尼奥兹带着圈内特权人士惯有的居高临下解释道，“松方藏品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保留的十八件主要作品价值数千万法郎，若考虑到它们的独一无二，价值恐怕更高。其次，这些杰作将为我们的博物馆吸引大量外国游客。文化影响力，国际声誉……”

“那么对外关系呢？”莫伊诺问道。

一部分赔偿体现了我们对昔日敌人的宽宏大量。这有助于我们与日本—欧洲日益重要的经济伙伴—实现关系缓和。

安东尼奥兹的论述条理清晰，仿佛早已烂熟于心。宽宏大量……当最好的部分被保留下来时，这个词才显得格外动人。

“当然，安东尼奥兹先生，但是如果整个行动的基础很脆弱……”布吉瓦尔坚持道，他鼓起的勇气连他自己都未曾意识到。

“布吉瓦尔先生，我必须提醒您一个事实：戴高乐将军今天上午已经签署了这项法令。它因此在整个法国领土上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人都无法质疑它。”

安东尼奥兹的姿态十分明确。但莫伊诺并没有被吓倒。

“我们总不能对共和国的宪法规则视而不见吧！”

“莫伊诺先生，宪法应当服务于法国的伟大，而不该被形式主义的考量所束缚。这项法令，符合国家利益。”

两人意识到，他们面对的逻辑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这是一种波拿巴主义的理念，在这种理念中，国家利益凌驾于一切规则之上。

1958年12月18日，该法令在官方公报上隆重公布。法令中对法日和解和法国文化慷慨大方的慷慨宣言，立即引发了宣传机器的轰动。

与德·博纳瓦尔上校的预期相反，受政府消息人士影响颇深的法国媒体对这项“慷慨的总统倡议”大加赞扬。《曙光报》头版刊登了题为“戴高乐慷慨向日本赠送艺术瑰宝”的头条新闻。《十字报》在半版社论中解释说，“这项高尚的倡议体现了法国的普世情怀及其文明教化作用。”《法兰西晚报》也表示赞同，称其为“艺术普及化”。《阿尔及尔回声报》甚至在头版刊登了一篇图文并茂的报道，配以彩色照片和采访，着重强调了“法

国的宏伟气魄”。少数持不同意见的声音小心翼翼地质疑这批藏品的最初购置，但这些谨慎的批评很快就被政府精心策划的公关宣传所淹没。

在东京银座一家传统茶室温馨舒适的氛围中，松方幸次郎的女婿、日方首席谈判代表松本茂治重读了一遍他被迫签署的弃权协议条款。一股怒火在他心中翻腾。他一向温文尔雅，如今却在残酷的权力博弈面前，体会到了礼节的局限。律师界德高望重的山本武大师试图安抚他。山本武大师也对这份被迫达成的协议的合法性有所怀疑，但他的智慧使他能够理性地看待问题。

松本先生，客观来说，在这场谈判中您别无选择。法国掌握着所有筹码，我们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

山本慢慢地喝着他的绿茶。

“山本律师，恐怕我贱卖了岳父的文化遗产。他们留下的那十八件作品，正是整个收藏的精华所在。”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份详细的清单。

梵高、高更、塞尚、罗丹……所有赋予这批藏品国际重要性的元素都留在了法国。我们确实在收购三百件作品，但它们都是一些次要作品、习作，以及一些不太知名的艺术家的作品……

“我理解你的悲伤，”山本表示同情，“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如果没有这份协议，哪怕它并不完美，你也什么都拿不回来。至少剩下的东西会回到日本，将来可以在东京西洋美术馆展出。”

——多么屈辱的条件！我们不仅要自己建造一座专门用于收藏这些文物的博物馆，还要放弃对法国所扣押文物的权利，并且接受法国当局将这部分归还标榜为慷慨之举……

他猛地放下杯子，怒火冲昏了头脑，失去了往日的优雅风度。

“这真是奇耻大辱，山本律师！我们竟然还要感谢那些掠夺者，感谢他们归还了他们自己偷走的东西的一部分！”

山本点了点头，他意识到其中的不公。他多年的法律经验让他明白，面对蛮力，国际体系是无能为力的。

松本先生，我们发现自己无力有效地挑战法国的决定。

《旧金山和约》显然赋予了他们对其领土内日本财产的所有权利。

“但是这项条约真的适用于我们的情况吗？”松本突然重燃希望，问道。

这个问题让律师感到惊讶，他饶有兴趣地抬起头来。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让最能干的几位同事，悄悄做了一些调查。结果显示，法国从未正式与日本交战。如此一来，《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本不该适用于我岳父的私人财产。”

山本猛地向前倾身。这是一条他从未探索过的路。

“您能具体说说您的分析吗？依据的是哪些文件？”

松本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他的手微微颤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兴奋。

“律师，您看这个。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仔细梳理了日本的档案和解密的美国文件。”

松本开始详细解释法国当局自以为已经有效掩盖的种种缺陷。山本认真听着，心中盘算着挑战法国这套体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松本先生，那样的对抗会持续数年。更重要的是，整个法国国家机器都会联合起来对抗我们。您确定要进行这样一场冒险吗？”

松本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他的声音变得坚定起来，流露出他平日里彬彬有礼的外表下隐藏的決心。

“为了岳父的名誉，是的。也为了他收藏的荣光。还有……为了真相，山本律师。我准备战斗到底，哪怕因此倾家荡产。”

这个想法在松方家的继承人们心中慢慢萌芽。他们终于开始意识到，这种伪装得如此巧妙的剥夺，其根基远比任何人愿意相信的都要脆弱得多。

但问题是：1958年，他们既没钱，也没人脉，更没必要的通讯录。戴高乐执政，法国一片辉煌，法国的荣光也达到了顶峰……

在卢浮宫和其他法国艺术殿堂的地窖里，法国保存的十八件艺术杰作继续着它们默默无闻的生活。

1958年12月18日的法令正式决定了松方收藏的命运。

然而，这项法令本身就蕴含着其自身垮台的种子。它通过正式“归还”一些次要作品，同时保留最精美的作品，承认法国或许并不拥有全部藏品的绝对所有权。这在原本完美无瑕的法国体系中留下了一道细小的裂缝。多年以后，其他更加顽固、装备更精良的人将会利用这道裂缝。

这项法令宣称法国“慷慨大方”，却反而使一件巴黎原本希望被历史遗忘的事情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局原本希望掩盖的争端，却因这项法令而意外曝光。

最后，由于依赖了一种在宪法上存在疑问的程序，它开创了一个脆弱的先例。这就像玩“挑棍游戏”，稍有判例法的改变就可能使其崩塌。

法国当局对这些弱点完全毫不知情。

松方事件远未结束，它仅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消化和成熟阶段。这是一个漫长而又极其漫长的阶段。1958年的事件主角们将一个接一个地消失——死神无情地夺走了他们的生命——但他们的决定却将继续毒害后人的生活。

此案提出的问题超越了时代和政权的界限。能否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侵占他人的文化财产？在文化政策领域，目的是否可以为任何手段辩护？一个自诩民主的国家，是否有权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违背其自身原则？

当然，这些问题很尴尬。但1958年谁会在意呢？

这场“归还的闹剧”，就此圆满收场。

直到20世纪末的剧变——柏林墙倒塌、全球化、文化产品新的国际标准出现——松方案才再次浮出水面。

但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一个发生在与1958年截然不同的世界里的史诗。在这个世界里，各国再也不能轻易地以神圣利益为由掠夺邻国的财富了。

第六章：遗忘的岁月

巴黎，1975年

电钻的轰鸣声在奥赛旧火车站宽敞的大厅里回荡。空气中弥漫着石膏粉尘。这里宛如一片建筑战场：扭曲的金属梁柱、敞开的墙壁和破碎的地板。就在这片混乱之中，未来的法国艺术殿堂即将诞生。

奥赛博物馆首席策展人兼未来的馆长弗朗索瓦丝·卡钦小心翼翼地跨过瓦砾堆，高跟鞋敲击着龟裂的水泥地面。她身着那套常年穿着的黑色套装，这套衣服是她只在重要会议上才会穿的。她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标有“松方藏品”的黄色文件夹。在她身旁，法国博物馆协会主席米歇尔·拉克洛特缓缓走来。他那身无可挑剔的西装与周围如同世界末日般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卡钦带着既着迷又担忧的心情观察着这件作品。她是一位著名外科医生的女儿，也是著名共产主义活动家马塞尔·卡钦的孙女，曾在艺术与考古学院学习。从小就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米歇尔，看看这里！”弗朗索瓦丝·卡钦惊呼道，她指着宽敞的中央大厅。“我们可以把整个印象派收藏都摆在这里。莫奈的画作与雷诺阿的画作相对，德加的画作

则摆放在后面的壁龛里……还有这光线！这自然光倾泻而下，正是我们欣赏粉彩色调所需要的。”

拉克洛特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目光扫过手中的计划表。他心事重重。作为一名老练的管理者，他凭借着卓越的才能和赤裸裸的投机取巧，一步步攀上了文化行政管理的阶梯。他尤其擅长妥协的艺术，这种智力活动能让人化解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

“弗朗索瓦丝，我们需要认真谈谈松方作品的展出问题。我昨晚接到部长办公室的电话。他们……该怎么说呢……担心这批作品的知名度会受到影响。”

“担心？”卡钦带着一丝讽刺的语气重复道，“他们担心什么？担心我们收藏了世界上最美的梵高和高更的作品吗？”

一名工人推着一辆装满瓦砾的手推车从他们身边经过。拉克洛特等到他走开后才继续说话，本能地压低了声音。

“弗朗索瓦丝，你很清楚我在说什么。这批藏品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如果记者开始深挖它的来龙去脉……”

“你说的是‘收购’？米歇尔，你指的是‘没收’吧。咱们就直说吧。”

拉克洛特做了个鬼脸。他最讨厌卡钦说话这么直白。在他们的圈子里，委婉语和拐弯抹角才是主流，只要能避

免直白地指出问题所在就行。这位同事这种不守规矩的说话方式让他很不自在。

“没错，”他继续说道，同时紧张地环顾四周。“我们必须避免使用这种词。听着，我已经准备了一份备忘录。我这就读给你听。”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打印好的文件，开始用单调的语调朗读。

“《关于展出原松方藏品的指示。根据文化部的指示，建议对这些作品的来源采用中立的命名方式。应使用以下术语：「国家收藏」「法国国家购藏」「匿名捐赠」。任何明确提及松方藏品的内容，均须事先获得法国博物馆管理局的批准。》”

卡钦强颜欢笑地打断了他。

“匿名捐赠？你在开玩笑吧？我们说的是几百件重要作品的收藏，不是一位老姑妈送的一幅画！”

“我知道，”拉克洛特叹了口气，收起了文件，“如果我们把整个故事都讲出来——一战时查封、战后谈判失败、1958年的闹剧——最终会引发一场巨大的争议。而新博物馆真的不需要这样的争议。”

她们边走边绕过脚手架，工人们正忙着加固拱门。噪音震耳欲聋，但矛盾的是，这噪音却让她们的谈话显得格外亲切。卡钦感到一股怒火在心中升腾，她愤怒于自己

职业的妥协。这愤怒中夹杂着自我厌恶，因为她知道自己最终会屈服。

“你知道这一切最让我困扰的是什么呢？”卡钦最后说道，“那就是我们正在做我们指责德国人对待纳粹掠夺品所做的事情。我们掩盖真相，淡化事实，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弗朗索瓦丝，这样的比较太过分了。情况完全不同。”

“真的吗？一个外国收藏家在法国建立了一个收藏系列。战争爆发了。国家没收了他的财产。战争结束了。国家保留了这些财产。请给我解释一下这其中的根本区别，我在听。”

拉克洛特突然停下脚步，转身面对她。这场谈话激起了他内心深处一直压抑的疑虑。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建立在他忠实地为国家效力之上，无论国家内部存在怎样的矛盾。质疑这份忠诚令他感到恐惧，远超他愿意承认的程度。

“区别在于，松方是日本人，日本是敌人，而且当时还有正式的国际条约。旧金山条约，你听说过吗？一切都是合法的。”

“或许合法，但绝对不道德。”

拉克洛特反驳道：“道德何时开始指导政治了？”

她们来到了后来成为伟大的印象派画廊的地方。空间巨大，沐浴在斑驳的金色光线中。卡钦在房间中央停下脚步，缓缓转身，环顾四周。在这样的时刻，她对艺术的热情再次涌上心头。

“我想把《阿尔勒的卧室》放在这里，”她说道，“就在正中央，配上顶灯。它将成为整个系列的亮点。”

“好主意，”拉克洛特赞同道。“这幅梵高的画作非同凡响。鲜艳的黄色，房间扭曲的透视……绝对是一幅杰作。游客们一定会蜂拥而至。”

“而且，文中完全不会提及它出自松方收藏？”

“我们会提及需要提及的内容：‘布面油画，1888年，奥赛博物馆藏。’仅此而已。”

一声沉闷的撞击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几米外，一个工人正在钻孔，扬起一阵白色粉尘。他们咳嗽着走开了。拉克洛特感到自己正在助长这些国家谎言的沉重。一种道德上的疲惫感在他的举止、他的沉默中显露无疑，在他那副热忱公务员的面具下，那些不易察觉的裂痕中，都显露了出来。

“上周，我见了绘画部策展人库隆热，”卡钦在他们安全进入卢浮宫后继续说道，“他给我讲了一个有趣的轶事。据说，在20世纪60年代，松方家的一位继承人曾来卢浮宫参观馆藏作品。”

“所以呢？”

他哭了。真的，在他祖父的一幅塞尚画作前哭了。当时的助理策展人库隆热不知所措。他递给他一块手帕，护送他到出口，并承诺会妥善保管这些作品。

“这很感人，”拉克洛特评论道。“但这并不能改变现状。这些作品现在是法国的了。”

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东京代官山住宅区，松方三郎站在自家传统房屋的阳台上，凝望着禅宗花园。他手中拿着一张褪色的照片，照片上是他的父亲松方幸次郎，摄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照片中他站在自己巴黎收藏的艺术品前。他身后的墙上挂着几幅曾被法国博物馆收藏的画作。松方三郎是众多饱受战败之苦的日本人之一，他内心挣扎于家族的骄傲与民族的耻辱之间。按照传统，他是一位恪守荣誉的人，然而，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不得不学会妥协。这种矛盾的矛盾折磨着他：既要维护家族的尊严，又要接受无力感。父亲收藏品的遗失，象征着他所处时代的所有妥协。他的妻子美智子默默地走过来，在他身边放了一杯温热的清酒。她痛苦的无奈，正是日本妻子们的写照——她们习惯于抚慰丈夫受伤的自尊，却从不评判他们。然而，每当她看到三郎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回忆时，她眼神中总会闪过一丝沮丧。

“你还在看那些照片，”她温柔地低语道，“这只会让你的痛苦再次涌上心头。”

“我怎么可能忘记呢，美智子？”他回答道，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照片。“父亲毕生致力于收藏这些照片。他想在日本建立一座博物馆，让我们的人民了解西方艺术。”

“三郎，是时候翻开新的一页了。”

他缓缓地摇了摇头。这种执拗地纠缠于此事的态度，表明他无法接受悲伤。

“翻过这一页？每年有数百万游客在巴黎欣赏我们的画作，却根本不知道它们是偷来的？不，美智子。我不能翻过这一页。除非正义得到伸张。”

他放下照片，用布满皱纹的手捧起那杯清酒，细细品味着掌心传来的温暖。

“我昨天收到了罗丹博物馆馆长的来信，”他继续说道，“他们正在筹备一个关于19世纪法国雕塑的展览。他们想借用几件1958年‘慷慨归还’给我们的作品。他们自己留下了杰作，却要求我们把他们好心归还的零碎物件借给他们。”

“你打算怎么回答？”

“什么也不说。我不会回答。让他们自己去面对良心的拷问吧，如果他们还有良心的话。”

两人之间陷入了沉默，只有花园里小竹喷泉潺潺的流水声打破了这份宁静。美智子终于在丈夫身边坐下，轻轻地将手放在他的手上。这个动作，多年来重复了无数次，既流露出她坚定不移的爱，也诉说着她对三郎沉思的疲惫。

“健二长大了，”她说道，“他问的关于他曾祖父的问题越来越多。前几天，他问我，为什么我们家没有西方绘画作品，尽管曾祖父幸次郎是一位收藏家。”

“你跟他说了什么了？”

“真相是，他们现在在法国。但我没有勇气向他解释他们是怎么到那儿的。那是你的责任；这是你的家族传承。”

传承火炬的重任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该如何才能在不玷污纯真的情况下保存记忆？他该如何才能在不灌输仇恨的情况下传递真理？

“你如何向一个十岁的孩子解释，世界是由强者生存法则统治的？如何向他解释，他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美好的概念——正义、公平、尊重——在国家间的关系中都只是空洞的词汇？”

“他会理解的。孩子们比我们想象的更能理解。”

“或许吧。但我希望尽可能让他免受这种痛苦，让他再多相信一会儿这个世界是公正的。”

巴黎，法国博物馆管理局，1976年

位于瓦卢瓦街的法国博物馆管理局会议室里，弥漫着战时会议厅的气氛。十几位高级公务员和博物馆馆长认真聆听着局长莱昂·图伊耶汇报他与文化部秘书长共同制定的计划。

图伊耶属于那种将国家奉为圭臬的高级公务员。他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持有教师资格证，对国家机构的崇拜如同信徒般虔诚。正是这种绝对的忠诚将他推上了高位。在松方事件中，他只看到了一个需要解决的沟通问题，刻意忽略了其中的伦理层面。

“女士们、先生们，”他用低沉而沉稳的声音说道，“我们正面临一个棘手的挑战。我们的国家藏品中包含着令我们博物馆引以为傲的珍品。但我们必须妥善处理这些藏品购置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部长办公室已要求我们制定一套清晰一致的行动方案。”

他站起身来，开始踱步。这种踱步的动作暴露了他试图掩饰的紧张情绪。

“松方收藏的都是重要作品，”他继续说道，“我们谈论的是一套具有重大市场价值的藏品。但除了经济层面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国际声誉。”

博物馆总监雅克·奎尼亚姆感到有必要介入此事。他曾经经历过数次危机，并形成了一套能够让他以客观视角看待道德问题的哲学。

“恕我直言，我认为我们把事情过度渲染了。内阁的建议是什么？”

图伊耶回到座位上，摆出他只有在宣布重要消息时才会摆出的庄严姿态。

秘书长提出了一项明确的方案：逐步抹去。在十年时间内，我们将从所有公开文件中删除所有与松方收藏相关的内容。当然，这些作品仍将继续展出，但它们的来源将被逐步……可以说……抹去。

“你是什么意思？”卢浮宫的一位策展人问道。

也就是说，我们将把它们完全整合起来。不再特别提及，不再区别对待。它们将成为“卢浮宫博物馆的藏品”或“奥赛博物馆的藏品”。就好像它们一直都在那里一样。

“但是档案呢？现有的目录呢？”奎尼亚姆提出异议。当然，档案仍将对专业研究人员开放。我们又不是在苏联。至于目录，它们将被新的、精简的版本所取代。

路易·巴赞，卢浮宫前部门主管，应邀担任顾问，发表了讲话。他已年过八旬，年事已高，这让他享有年轻同事们所不具备的言论自由。

“1951年条约谈判期间，我在那里。那时我还年轻，但参加了一些会议。我们所做的……该怎么说呢……从法律角度来看，颇具创造性。我们利用战败日本的虚弱，将一种说白了就是赤裸裸的没收行为合法化。”

“巴赞先生，”图伊耶打断道，“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改写历史，而是为了管理当下。”

“正是如此，”巴赞带着岁月沉淀的傲慢反驳道，“应对当下需要了解过去。而过去告诉我们，我们正身处险境。日本经济正在复苏，他们不会永远保持沉默。”

“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趁他们还在虚弱的时候采取行动，”局长总结道。

会议继续进行。他们讨论了具体细节：如何修改艺术品的标签，如何向博物馆工作人员简要说明情况，以及如何回答记者或研究人员的提问。图伊耶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主持着讨论，几乎掩饰不住他内心的疑虑。在独处时，他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上演一场闹剧。

奥赛博物馆，1978年

博物馆仍在建设中，但几个展厅已初具雏形。在未来的后印象派展厅里，一群技术人员正围着一个巨大的木箱忙碌着。箱子里装着梵高的《阿尔勒的卧室》，这幅画刚刚从卢浮宫的馆藏中运抵。

新上任的策展人让-皮埃尔·莫辛神情紧张地监督着整个工作。这是他第一次经手如此重要的作品。他出身于小商贩家庭，凭借着天赋和决心一步步攀升，一路走来，也展现出新贵特有的敏感。

“轻点！”他冲着搬运工喊道，“这是梵高的画作，不是宜家的餐边柜！”

这些早已习惯了文物修复师各种奇思妙想的工匠们，以专家的沉着冷静继续着他们的工作。他们小心翼翼地将画作从木箱中取出，放置在特制的画架上。

莫辛走近，被深深吸引。刺眼的黄色，怪异的视角，空荡荡的房间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疏离感……一切都完整无缺，令人震撼。

“莫辛先生？”

他转过身。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子站在他身后。

“是的？”

—夏洛特·切尼尔，文献部门。我需要核实这件作品标签上的信息。

她打开文件，开始像一个新手档案管理员那样阅读。

“所以……文森特·梵高，《阿尔勒的卧室》，1888年10月，布面油画，57.3 x 73.5厘米。关于它的来源，我了解到‘松方收藏，巴黎，约1921年购得；1944年被法国政府没收；1951年入藏卢浮宫；1978年存放于奥赛博物馆。’这样说对吗？”

莫辛显然有些尴尬，脸颊微微泛红。夏洛特·谢尼埃是一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她代表了莫辛在了解博物馆运作规则之前的所有特质。

事实上，我们已经收到了关于作品来源的新规定。对于这件作品，必须注明为“奥赛博物馆藏品”。

图书管理员惊讶地看着他。

“但是……这是错误的。这件作品有出处，有据可查的时间顺序。我们不能抹杀它！”

“切尼尔小姐，那不是我的命令，是上面下达的命令，非常高级别的命令。”

“但这太荒谬了！”她抗议道，“任何一个艺术专业的学生都知道这幅画出自松方收藏。有几十本出版物都提到过它！”

莫辛走近她，压低了声音。

“听着，我理解你的沮丧。我也很困扰。但我们有非常明确的指示。松方藏品，从官方意义上讲，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些作品一直都属于法国的博物馆。这就是新的事实。”

“新的真相？”她难以置信地重复道，“我们这是生活在奥威尔的《1984》里吗？”

“切尼尔小姐，如果你珍惜你的职位，我建议你毫无疑问地服从指示。这只是善意的劝告。”

年轻女子合上了文件，第一次与体制的虚伪正面交锋，令她的理想主义受到了打击。

“很好。‘奥赛博物馆藏品。’但别指望我会为这个谎言感到骄傲。”

她转身怒气冲冲地走了。莫辛目送她离去。他想起自己当初得知那些作品的真相时，也曾义愤填膺。但时间久了，人总会习惯一些事。这种道德上的适应能力，或许正是他最害怕自己的地方。

这才是博物馆界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东京，1981年

健二当时十六岁。他个子很高，对于日本男孩来说算是高个子，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显得颇具书卷气。他大部分空闲时间都泡在涩谷市立图书馆。那天，他正在翻阅

一本关于印象派的书，偶然看到了一幅《阿尔勒的卧室》的复制品。图注上写着“巴黎奥赛博物馆”。

他被某种难以言喻的东西所吸引，继续读了下去。在读到关于20世纪早期收藏家的章节时，他发现了一张黑白照片。他心跳漏了一拍。照片上的人是他的曾祖父松方幸次郎，正站在一系列画作前。而在这批画作中，清晰可见的正是《阿尔勒的卧室》。

他再次看了看复制品的说明文字。“巴黎奥赛博物馆。”只字未提松方。什么也没有。仿佛他的曾祖父从未存在过。

当晚，他与祖父对峙。健二面对家族秘辛时，难免会像年轻人一样缺乏耐心，但他同时又有着敏锐的直觉，能够识破成年人的谎言。他继承了曾祖父的固执，却还不理解其背后的原因。

“爷爷，我在图书馆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松方三郎从报纸上抬起头来。多年来，他一直害怕这一刻的到来，内心充满矛盾，既想守护孙子的纯真，又有责任传承家族记忆。

“哦，真的吗？是什么事？”

健二把打开的书放在自己面前。

“照片里的那个人是曾祖父吧？就是跟那些画作在一起的那位？”

他脸色略微苍白，但依然保持冷静。

“是的，就是他。”

“那幅画，就是奥赛博物馆里的那幅梵高画作吗？”

“是的。”

“那么，为什么博物馆不提及它曾经属于我们呢？”

三郎缓缓合上报纸。他一直害怕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必须告诉孙子真相。这痛苦的转达既是他的负担，也是他的责任。

“坐下，健二。这说来话长，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他花了两个小时把所有事情都复述了一遍。他的声音颤抖着，透露出这个故事的沉重情感，这个故事他在脑海里已经反复演练过上千遍了。

健二听着，双拳紧握。这个少年正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发现，这个世界并非由正义统治，而是由武力主宰。这一发现标志着他天真无邪的终结，但也孕育了一种足以支撑他一生的意志。

祖父话音刚落，他便大声喊道：“但是……但是那是偷窃！”

“没错。但这是受国际条约合法化的盗窃行为，因此无法受到质疑。”

“坚不可摧？没有什么是坚不可摧的！我们可以聘请律师，通知国际媒体，制造丑闻！”

三郎无奈地摇了摇头。多年的失败让他变得宿命论，或许是过于宿命论，与年轻人的活力格格不入。

“我试过了，健二。好多年了。但法国人抹去了痕迹，改写了历史。对他们来说，这些作品一直都是法国的。”

“所以我们就放弃吗？就让他们赢了吗？”

三郎凝视着孙子的眼睛，从中看到了一丝炽热，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这团火焰既是他的希望，也是他的恐惧：希望正义终将得到伸张，恐惧看到健二被一场早已毒害了他自身存在的追求所吞噬。

“不，我们不会放弃。我们在等待，我们在准备。总有一天，机会会到来。到那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所以，健二，你必须学习。学习法律，学习外语，了解世界的运作方式。单靠武力不足以夺回被夺走的一切。我们需要智慧、耐心，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比敌人更了解他们自己。”

巴黎，大皇宫，1985年

“法国艺术百年展：1885-1985”是年度文化盛事，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将亲自主持开幕式。幕后，各项筹备工作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现任奥赛博物馆馆长弗朗索瓦丝·卡钦正带领她的团队负责最后的准备工作。

卡钦的事业已达到巅峰。每一次职业上的成功都会让她想起自己为了走到今天所付出的牺牲。

松方事件凸显了她内心的矛盾：艺术爱好者与职业女性、知识分子与公务员之间的冲突。

“你的意思是，那幅高更画作的标签还没准备好？”她怒视着她的助手，大声说道。

“嗯，馆长女士，我们遇到一点小问题。在1979年的目录中，这幅高更的作品被列为来自松方收藏。但在我们新的文件中，却没有提及这一来源。记者们可能会对此提出疑问……”

松方案成了她的负担。每一次展览，每一次借展，它都像幽灵般挥之不去。她感觉自己仿佛能感受到艺术品的注视，仿佛它们在要求伸张正义。

“你看，很明显。1979年的目录里有个错误。仅此而已。如果有人质疑，你就说进一步的研究已经确定了这件作品的真正出处。”

“但是女士，专业记者对这个案子并不陌生。例如，《费加罗报》的保罗·茹尔丹在七十年代就写过几篇关于松方藏品的文章……”

“这样他就会明白，重提旧事对他来说才是最有利的，”她回答说。“奥赛博物馆和《费加罗报》关系很好。

我们经常借给他们一些藏品用于他们的活动。如果这种情况改变了，岂不是很可惜吗？”

信息很明确：胡萝卜加大棒。配合的人会得到奖励。其他人……这种运用权力的方式暴露了卡钦身上她并非一直拥有的冷酷无情。这个体制在她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她。

开幕当晚，巴黎所有文化精英齐聚一堂。部长、大使、收藏家、艺术评论家……弗朗索瓦·密特朗在致辞中盛赞“法国天才”和“巴黎，世界艺术之都”。然而，对于构成展览重要组成部分的被没收的外国艺术品，他只字未提。

人群中，一个男人带着一丝苦笑注视着这一切。他是《朝日新闻》驻巴黎记者田中幸雄，正在做笔记。他精通法语，对松方收藏事件了如指掌。他的舅舅曾在上世纪30年代为松方幸次郎工作。田中是那种既敬重法国文化又愤慨于法国所遭受不公的日本记者之一。这种矛盾在他的作品中有所体现：既欣赏西方艺术，又义愤填膺地谴责掠夺行为。他将揭露松方的真相视为自己的毕生使命。

演讲结束后，他在鸡尾酒会上走向了弗朗索瓦丝·卡钦。

“馆长女士，我是朝日新闻的田中幸雄。展览非常精彩，我尤其喜欢后印象派部分。”

—谢谢您，田中先生。奥赛博物馆很荣幸拥有世界上最精美的藏品之一。

“的确如此。这些作品中有好几幅都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比如这幅高更的画作，是不是我同胞松方幸次郎收藏的？”

卡钦的笑容悄然凝固。她认出了这是新闻记者的惯用伎俩：先是温和地试探，然后才是致命一击。

“田中先生，我想您弄错了。这幅高更画作一直都是法国国家收藏的一部分。”

“真的吗？但我这里有一份1927年乔治·佩蒂画廊展览的图录复印件，上面明确标明这件作品属于松方……”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复印件递给女校长。她只是瞥了一眼，脸上摆出一副对待不速之客的傲慢表情。

“田中先生，那个时代的展览图录经常出错。我们目前的研究要可靠得多。”

“我明白了，”记者笑着回答，笑容里透着不祥之兆，“失误。真是巧合。请问，馆长女士，目前贵馆的墙上陈列着多少件松方藏品？”

卡钦浑身僵硬起来。这个记者开始让她非常恼火，每当有人胆敢挑战她的权威时，那种熟悉的恼怒感就会涌上心头。

田中先生，我不知道您想暗示什么，但是……

一女士，我没有暗示什么。我只是在问一个很明确的新闻问题。一个您不想回答的问题。这是您的权利。但我也有权调查这起明显带有组织性掠夺性质的事件。

“我建议您在写作时务必谨慎，田中先生。根据法国法律，诽谤是会受到惩罚的。”

“那么盗窃呢？根据法国法律，盗窃是违法的吗，馆长女士？”

说完，他礼貌地鞠了一躬，转身离开，留下弗朗索瓦丝·卡钦怒火中烧。她向正在与意大利大使交谈的米歇尔·拉克洛特示意。

“米歇尔，我们遇到麻烦了。那边那个日本记者，他正在调查松方案。”

拉克洛特皱起了眉头。临近退休让他面对争议时不再那么好斗。他渴望平静地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田中？是的，我听说过他。真是个麻烦精。他想干什么？”

“显然，他正在制造丑闻。他有当时的档案，他正在提出疑问……”

“我会处理这件事。我在日本驻巴黎大使馆人脉很广，他们不希望这件事再次浮出水面。目前法日关系非常好，他们不会为了几幅画就破坏两国关系。”

几天后，田中幸雄接到东京编辑的电话。信息很明确：关于松方藏品的文章一律不予发表。“双边关系”优先于调查性新闻报道。田中意识到自己触到了敏感神经。这种审查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但他不得不将揭露真相的时机推迟到更合适的时机。

镰仓，1990年

健二今年二十五岁。他从东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刚刚被哈佛大学录取。但在前往美国之前，他想和身体每况愈下的祖父做最后一次谈话。

他躺在房间的床上，目光依旧锐利而坚定。三郎感到自己的体力日渐衰弱，但这种身体上的虚弱却伴随着一种精神上的解脱。濒临死亡之际，他不再害怕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无论多么苦涩。

“健二，过来一下，”他虚弱地低声说道。

年轻人跪在榻榻米旁。健二身上带着年轻人的急躁，什么都想立刻得到。但面对即将离世的祖父，他开始学习耐心。这种克制的教训，对于未来的挑战来说弥足珍贵。

。

“是的，爷爷？”

“箱子里，那边……有个黑色漆盒。把它拿过来给我。”

健二照做了。盒子很重，上面饰有金色的飞鹤图案。三郎费力地打开盒子，里面装着一捆捆的文件。

“这里保存了我能找到的关于这批藏品的所有资料。原始清单、与巴黎经销商的往来信件、照片……以及最重要的，这些。”

他出示了一份盖有法国政府印章的官方文件。

“1944年的查封令。由临时管理人保罗·杜蒙签署。这份文件证明法国确实没收了这批藏品。他们说什么都行，这份文件无可辩驳。”

“爷爷，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

“等等，还没完。”

他又拿出了一叠文件。

“1951年和1958年谈判的机密会议记录。一位同情我们的日本外交官在六十年代把这些记录给了我。这些记录清楚地表明了法国人是如何操纵谈判的，他们是如何利用我们战后的虚弱来使他们的窃取行为合法化的。”

健二震惊地翻阅着文件。这些文件远不止是一份家族遗产，而是一套完整的法律武器，足以让他为真相而战。但对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一份沉重的负担。

“但这可是件大事！我们可能会引发国际丑闻！”

“或许如此。但我们必须采取有效行动。法国实力雄厚，他们早已习惯这类争议。我们必须选择合适的时机。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盟友。单凭我们一己之力，什么也做不了。”

他握住了孙子的手。这简单的动作承载了代际传承的全部意义：希望、遗憾和责任。

“健二，我可能看不到这一切的结局了。但你还有时间。你有智慧。你有决心。答应我你永远不要放弃。答应我你会不辜负幸次郎的期望。”

“爷爷，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找回我们的收藏品。或者至少，我会把真相公之于众。”

三周后，松方三郎去世了。他的葬礼按照遗愿，一切从简。但在健二的心中，却燃烧着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

巴黎，奥赛博物馆，1993年

索菲·马蒂内是一位年轻的艺术博士生，专攻法国博物馆藏品。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后印象派作品的来源。一天，她在查阅奥赛博物馆的档案时，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异常情况。

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索菲对艺术怀有真挚的热情，不像她的长辈那样受社会因素的驱使。

“打扰一下，”她问那位六十多岁、头发一丝不苟地挽成发髻的档案管理员，“我正在查找这批作品的收藏记录，但我只能找到1960年以后的文件。原件在哪里？”档案管理员瞥了一眼名单。她在这家机构工作了三十年，一直在研究需求和行政限制之间周旋。这段经历让她变得谨慎。

“啊，那些作品……原始文件保存在特殊储备中。”

“列入特殊储备？为什么？”

“这些是敏感文件，需要获得管理层授权才能查阅。”

“敏感？五十年前的采购文件怎么能算是敏感文件呢？”

档案管理员犹豫了一下，然后俯身靠近她，压低了声音。尽管多年来循规蹈矩，她仍然保持着令人称道的职业操守。她懂得如何区分机构的利益和真相。

“听着，小姐，我给你一句忠告：别在那些作品上纠缠不清。论文选题应该选别的，这样能省不少事。”

“麻烦了？你在说什么？”

档案管理员环顾四周，确认周围只有他们两个人。

“上一个试图深入研究这些文件的博士生论文被驳回了。官方说法是‘方法论不足’。非官方说法……这么说吧，她这是多管闲事。”

“你是说这家博物馆对某些主题实行公开审查吗？”

“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给你一些友好的建议，仅此而已。如果你想看那些文件，就向管理层提交一份书面申请。但如果被拒绝，你也不要感到意外。”

索菲心神不宁地离开了档案馆。她原本以为自己是在知识和文化的殿堂里工作，却发现了一个远比这黑暗得多的现实。当晚，她就此事与她的论文导师伯纳德·德鲁斯内教授进行了交谈。

德鲁斯内是那些经历了1968年五月风暴却依然坚守理想的学者之一。他为人正直，在愤世嫉俗和对真理终将胜利的执着希望之间摇摆不定。

“啊，索菲，你揭开了法国博物馆界最不为人知的谜团之一：松方收藏。”

“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当然知道。所有专家都知道。但这是个禁忌话题。我们不谈论它。”

“但这太离谱了！这完全不道德！”

教授疲惫地看着她。这么多年来，他眼睁睁地看着才华横溢的学生在大学体制的残酷现实面前崩溃……

“索菲，你年轻又充满理想，这很好。但让我来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小圈子的运作方式。法国的博物馆都是权力

强大的机构，它们与政治、经济和媒体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胆敢质疑它们运作方式的人都会很快被边缘化。没有资助，没有职位，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简而言之，就是学术死亡。”

“所以我们就保持沉默？就接受谎言？”

“我们妥协。我们寻找变通之法。我们研究其他方法。或者，如果我们够勇敢，我们就等待。我们收集证据，然后，当时机成熟，我们就出手。但相信我，那一天还没到来。”

“那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

德吕内苦笑了一下。这个问题他已经问了自己很久了。

“当日本经济实力足够强大，能够施加压力的时候；当国际舆论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当那些靠谎言发家致富的老保守派都已作古的时候。索菲，耐心点。真相终会大白。但有时候，它需要时间。”

波士顿，哈佛法学院，1995年

健二当时正处于攻读博士学位的最后一年。

他的论文题目是《国际法中的艺术品归还：案例研究》。表面上，这是一个中立的话题；但实际上，它却成了对抗法国的武器。

哈佛大学彻底改变了健二。这位腼腆的学生蜕变为一位技艺精湛的战略家，完美掌握了西方强权的运作法则。但这种转变也伴随着纯真无邪的痛苦丧失。他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情感，计算行动的后果，操纵人际关系。

他的论文导师，著名国际法专家罗伯特·克劳福德教授曾警告过他。他属于美国学术界那群才华横溢却又胆怯怯懦的精英，他们更关心的是维护自身的声誉，而不是捍卫正义。

“健二，你的研究很有价值。但你现在如履薄冰。法国在这些问题上非常敏感。如果你想发表你的论文，措辞一定要非常谨慎。”

“教授，恕我直言，五十年来，一味谨慎克制并没有给我的家庭带来任何好处。”

“你有什么提议？”

“采取间接策略。我不会直接就松方藏品一事攻击法国，而是会树立先例，展示其他国家是如何归还战时被没收的艺术品的。”

克劳福德微笑着，赞赏着学生的技艺。

“那很好。但这需要时间。”

“我有时间。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拥有我祖父所没有的东西：国际人脉。哈佛是通往世界的通行证。这里的毕业生遍布各行各业：律师事务所、媒体……”

“你想创建一个网络吗？”

“是的。我们需要一个支持者网络，一个潜在盟友网络。这些人，在时机成熟时，能够支持我们的事业。”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健二坚定地执行着他的策略。他参加了所有关于文物保护法的会议，建立人脉，并暗中为未来的行动埋下伏笔。他会见了记者、律师和学者。他向每个人讲述了松方收藏案，语气温和，恰到好处地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一个会议上，他遇到了莎拉·菲尔德曼，一位专门负责追回大屠杀期间被掠夺作品的律师。

莎拉内心深处也背负着那种幸存者内疚，并将之转化为追求修复性正义的坚定信念。她立刻在健二身上看到了同样的传承创伤，以及驱使他不断前行的、同样的寻求补偿的渴望。

“你让我想起了我们自己的遭遇，”她在他解释完松方案后说道，“不同的是，我们得到了公众的同情。每个人都承认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但是，被没收的日本藏品……你知道，我在美国媒体有人脉。如果你愿意，我

可以开始散播这个故事。现在先低调一些，打好基础。”

“谢谢，我接受你的帮助。”

这一联盟标志着松方氏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巴黎，法国博物馆管理局，1997年

在法国博物馆管理局那间镶着木板的办公室里，新任局长路易·莫尼耶认真地听着顾问们的报告。他接替图伊耶，雄心勃勃地想要让博物馆现代化，却发现自己面临着与前任同样的困境。在他身旁，文化部副秘书长弗朗索瓦丝·阿尔芒正认真地做着笔记。

莫尼耶属于接受过现代管理方法培训的高级公务员群体，但他却面临着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惰性。他一方面渴望透明度，一方面又倾向于社团主义；一方面标榜现代性，一方面又公开宣称保守主义。

我们遇到了一个潜在问题。我们的媒体监测服务发现，“松方收藏”这一话题在英文媒体上的曝光率正在上升。近几个月来，美国和英国的专业期刊上都出现了多篇相关文章。

“这是怎么回事？”刚刚被任命到这个职位的弗朗索瓦丝·阿芒问道。

莫尼耶发言了。

“秘书长女士，这是一桩旧案。这是二战期间日本没收的一批藏品，后来并入了我国的馆藏。从法律角度来看，一切都合情合理。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赋予了我们所有的权利。但是……”

“但是？”

但从伦理和媒体角度来看，情况就复杂得多。如果事态升级，我们可能会重蹈瑞士博物馆收藏纳粹黄金的覆辙，这将对我们的形象造成灾难性打击。部长办公室对此感到担忧。

刚从中央行政部门调任而来的弗朗索瓦丝·阿芒，正在探索国家行政学院（ENA）未曾教过她的这些灰色地带。这种对权力现实的切入，令她比她愿意承认的更加不安。

“我们有哪些选择？”

第一种方案：我们什么都不做，听天由命。风险虽大，但并非不可能。第二种方案：我们主动出击。我们与对方沟通，承担责任，并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第三种方案：我们与日本人秘密谈判。我们归还一些象征性的作品，以换取他们对其他作品保持沉默。

“您的建议是什么？”

莫尼耶犹豫了一下。

“就我个人而言，我倾向于第三种方案。但这超出了我们职权范围，需要内阁批准。”

“目前的继承人是谁？他们好诉讼吗？”

主要继承人是松方健二，他是松方幸次郎的曾孙。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是一名律师，目前是东京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据我们的消息来源称，他正试图策划一场低调的媒体宣传活动。

“我们能见见他吗？”

“我们可以试试。但就我们对他的了解，他不会满足于一点点补偿。他想要全部的补偿。或者至少要对方公开承认所造成的伤害。”

—我们先来评估一下这批藏品的情况。有多少件作品，它们的价值，以及它们对我们博物馆的重要性。然后，看看能否安排一次秘密会面。但最重要的是，制定一个应对沟通的方案。如果事情闹大，我们必须做好反击的准备。我会把情况汇报给内阁。

—好的，夫人。但这个案例揭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我们的博物馆里充斥着来源可疑的艺术品。如果我们对松方让步，就会造成一个漏洞，所有人都会蜂拥而至。我知道。但现在是1997年，不是1951年。世界已经改变。我们必须适应，否则就会遭受损失。部长也明白这一点。

东京，山本及合伙人，1998年

松方健二，如今已是日本最负盛名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的合伙人，召集了一次会议。他的团队成员围坐在桌旁，其中包括两名年轻的日本律师、一名艺术专家，以及专程从纽约赶来的莎拉·菲尔德曼。

健二的转变令人瞩目。这位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律师。

“我们现在在哪儿？”健二问道。

艺术专家山田教授开始发言。

—我已根据您祖父的文件完成了藏品的全面清点。

“预估价格？”

—按当前市场价格计算，目前仍在法国的作品价值在8亿至12亿美元之间。仅阿尔勒的《卧室》一作，估价就超过1亿美元。

莎拉·菲尔德曼介入了此事。

—这不仅仅是金钱的问题。这是被窃取的，是一位富有远见的先驱者的文化遗产。

“没错，”健二同意道，“这正是我们需要强调的角度。不是经济层面，而是道德、文化和人文层面。”

其中一位年轻律师努卡加，带着缺乏经验的胆量问道。

“先生，我研究过《旧金山条约》。第14条似乎对法国有利。如何才能绕过这一法律障碍？”

健二笑了。他在哈佛大学研究这个问题多年，不断完善自己的论点。

“我仔细考虑过了。我们不能攻击条约本身，这没错。但我们可以说法国越权了。条约中提到了‘战争赔款’。然而，松方收藏并非战争财产。它是私人收藏，是在战争爆发前通过合法购买的方式收集的。法国无权将其视为‘赔款’。”

“太棒了！”萨拉惊呼道，“你不是在质疑条约本身，而是在质疑条约被滥用。”

“我还有另一份文件。请看这份文件。”

他将一封日期为 1946 年的官方信件投影到屏幕上。

“这是一封法国政府写给我祖父的信，信中承认这批藏品已被‘暂时保护’。这封信证明，就连法国最初也承认这批藏品应该归还。”

“那么为什么没有归还呢？”努卡加问道。

“机会主义。1946年至1951年间，法国意识到其所持资产的价值，并改变了立场。这显然是背信弃义。”

山田教授补充道。

“我在奥赛码头的档案中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一些内部备忘录显示，法国外交官承认，没收松方藏品‘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但‘政治上却很权宜’。他们明知自己在偷窃，却还是这么做了。”

“很好，”健二总结道，“我们掌握了证据。莎拉，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莎拉沉思了一会儿。

“我们需要继续加大媒体压力。我在《纽约时报》有人脉，他们对发表一篇重要报道非常感兴趣。但我们也需要一个引爆点，这将迫使法国做出反应。”

巴黎，奥赛博物馆，2000年

那是一个十一月的早晨。博物馆刚刚开门，第一批参观者开始陆续到来。其中，一位身穿黑色大衣、举止优雅的参观者正迈着坚定的步伐前行。

《阿尔勒的卧室》这幅画前停了下来。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亲眼见到这幅曾属于他曾祖父的画作。他百感交集。鲜艳的黄色，略微倾斜的视角，空荡荡的房间里弥漫着的孤独……这一切本该在东京的博物馆里，供日本民众欣赏。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好几分钟都没动。

“很感人，不是吗？”

健二转过身。一位优雅的女士正带着淡淡的微笑看着他。他立刻认出她是弗朗索瓦丝·卡钦，博物馆的前任馆长。她得知松方健二将在巴黎停留四十八小时，并希望他能来奥赛博物馆参观。她迫切地想要见到他，无疑是为了减轻内心的愧疚。她已经等了他好几个小时了。

“我猜您是卡钦夫人吧？”

“你知道我吗？”

“我知道你是谁。我想，就像你也知道我是谁一样。”

卡钦的笑容消失了。年龄和退休生活让她变得不再那么好斗。

“松方先生，我就知道您总有一天会来。”

“夫人，看到我站在这幅从我家偷来的画作前，您有何感想？”

卡钦身体僵硬起来，但他的眼神中却闪过一丝新的脆弱。

“先生，‘盗窃’这个词用得太重了。这件作品是合法的……”

“别跟我讲那些官方说辞了，”健二打断道，“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的问题是：你怎么能接受这一切？”

卡钦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放低声音回答道。

“松方先生，我毕生致力于艺术，致力于保护艺术、展示艺术，并培养人们对艺术的热爱。这些作品，无论其来源如何，都是法国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数以百万计的人欣赏过它们、研究过它们、喜爱过它们。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正义吗？”

“建立在不公正之上的公正仍然是不公正，女士。我的曾祖父想在日本建立一座博物馆。你毁了他的梦想。”

“先生，我没有破坏任何东西。我只是继承了一个在我之前很久就已形成的局面。”

“通过抹去所有关于其真正所有者的信息？”

卡钦很诚实，表现得有些尴尬。

“那是……一条指令。我并不认同，但是……”

“但你们都照做了。就像其他人一样。出于懦弱，出于私利，都无所谓。你们都是同谋。”

他转过身继续看画。

“夫人，总有一天，这幅梵高的画会回到日本。也许不是在我有生之年，但总有一天。”

“或许吧，松方先生。但至少它在这里。这难道不比放在私人保险箱里更好吗？”

“夫人，这是个伪命题。它完全可以放在东京的博物馆里，让那些永远无力前往巴黎的日本人也能欣赏到。但

您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却无法想象这一点，不是吗？”

说完，他转身离去，留下弗朗索瓦丝·卡钦独自一人和那幅画。她感到一阵愧疚。与其中一位受害者的直接对峙，击溃了她原本的道德防线。

当晚，她给米歇尔·拉克洛特打了电话。

“米歇尔，我今天早上在博物馆遇到了松方健二。在博物馆里。”

“然后呢？”

“他不会放弃的，米歇尔。对他来说，这是关乎荣誉，关乎正义的事。他会坚持到底。”

“你有什么提议？”

“或许是时候……重新考虑我们的立场了。做出一个姿态。趁丑闻还没爆发。”

“弗朗索瓦丝，你年纪大了，变得多愁善感了。我们什么都不会退还。这些作品是法国的，没有商量的余地。”

卡钦挂断电话，心事重重。她心存疑虑。这些年来，他们的选择真的正确吗？或者，他们只不过是披着合法外衣的犯罪行为的守护者？

时光荏苒，一切依旧如故。谨慎而有效的施压让松方案始终被掩盖。渐渐地，松方健二的坚定决心也无可避免地消磨殆尽。经过多年的努力，心灰意冷的松方健二最终放弃了，他被这项艰巨的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没能信守对祖父的承诺：竭尽全力确保这批藏品最终回归日本。当时，掠夺文物的问题尚未成为重大的社会议题……直到2020年代，这起案件才最终浮出水面。

第七章：斗争重燃

塞雷，非政府组织“物归原主”（Retour et Restitutions）办公室，2024年8月

在“物归原主”组织的办公室里，空气中弥漫着地中海的甜美气息。皮埃尔·贝尔蒂埃于2019年创立了这个非政府组织，其唯一目标就是：追回被盗物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团队不断改进方法。科学顾问委员会也扩大了规模：成员包括艺术专家、律师、艺术品来源鉴定专家……

皮埃尔·贝尔蒂埃以皈依者的热情统治着这个小世界。这位刚刚退休的教授放弃了讲课，投身于一场个人的圣战，这场圣战最终让他感觉自己真正地活了过来。

他是个活生生的矛盾体。一方面，他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勤奋的工作作风令人敬佩——他可以整夜埋头研究档案，那股永不满足的好奇心驱使着他在自己的领域里卓尔不群。他惊人的记忆力和整合海量复杂信息的才能使他成为一个令人畏惧的对手。但这种强烈的求知欲也掩盖了他的弱点：近乎偏执的完美主义，对任何与他观点相左的人本能的不信任，以及最重要的是，他总觉得自己掌握着真理。

贝尔蒂埃身上有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傲慢，这种傲慢渗透到他的人际关系中。他不善于倾听，经常打断别人说话，一旦他的论证没有立即得到回应，他就会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同事们欣赏他的能力，但又惧怕他一旦忽略细节就会出现的情绪波动。他纠正别人的错误时，几乎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一种愉悦感，仿佛在收集自己优越的证据。矛盾的是，正是这种让他难以共事的严苛标准，也恰恰是他的优势所在。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眼睛；任何官方的谎言都经不起他的审视。

他的办公室就像一个士兵准备发起最后进攻的房间。墙上挂着世界地图，上面插满了彩色图钉。红色代表纳粹尚未清点的掠夺品，蓝色代表殖民者带走的财物，绿色代表国家没收的物品，黄色代表各大博物馆“来路不明的藏品”。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全球掠夺版图。

他的桌上堆放着一摞摞精心标注的文件。国际法条约与他亲笔批注的展览图录并列。他与世界各地研究人员的通信证明，他一直在耐心编织着这张网。墙上挂着一幅《阿尔勒的卧室》的复制品，仿佛在守护着他的研究。这幅画每日提醒着他，每一份文件背后都隐藏着男人、女人和饱经摧残的美丽。贝尔蒂埃经常凝视这幅画，从中汲取一种慰藉，弥补他个人的孤独——因为他的奋斗逐渐将他与正常的社交生活隔绝开来。

贝尔蒂埃听到秘书敲门声抬起头。秘书是他从一开始就招募的，和他一样热衷于那些看似无望的事业。他很感激她始终如一的忠诚。

“贝尔蒂埃先生，东京的萩生田太郎先生正在通话中。关于松方案。”

他已经等这个电话一个星期了。焦急和不安交织在一起，令他难以承受。

“太好了，接过来吧。”

贝尔蒂埃拿起电话。萩生田，一位历史学博士，也是日本现代文化领域的杰出专家，是这个不愿遗忘的研究者网络的一员。此事远非一次简单的咨询那么简单。

“萩生田医生，您好。谢谢您回电。”

接电话的人的声音里充满了沮丧。卫星连接略有延迟，但这丝毫没有减轻他的沮丧之情。

“贝尔蒂埃先生，应该是我感谢您。我们非常了解您在这里对文物掠夺的研究。我们一直饶有兴趣地关注着您的努力……而且，我必须说，也充满希望。”

萩生田的语气透露出创伤之深。松方不仅仅是目录上的一个名字，他是一道难以愈合的民族伤疤。

“关于这个收藏，我必须实话实说。这是我们心中一道尚未愈合的伤口。八十年过去了，它依然隐隐作痛。松

方幸次郎是一位天才，一位富有远见的思想家，他致力于拉近我们两种文化的距离。而法国人对他所做的一切……”

他的声音微微哽咽了。

“……我们感觉就像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

法律层面的背后，是破碎的生活。松方原本想建造桥梁，但他的石头却被偷走了。

“我理解其中的情感因素。但我需要确凿的证据。否则，我们在法庭上只会徒劳无功。”

贝尔蒂埃已经深刻体会到，在与博物馆打交道时，仅仅义愤填膺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确凿、可验证且无可辩驳的证据。多年来屡战屡败，使他天生的不信任感更加强烈，也正是这种严谨性促使他坚持己见。

“你们的国家档案馆究竟收藏了什么？未发表的原始文件？最重要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你们找到继承人了吗？”

他从东京听到一声叹息。虽然不公显而易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纠正不公的进程却步履维艰。

“这就是悲剧所在，贝尔蒂埃先生。松方家族……消失了。被20世纪的灾难冲散得四分五裂。”

随后的解释揭示了命运的残酷无情。太平洋战争、1945年的战败、长达七年的美国占领、社会动荡——所有这一切都像风中的落叶一样，将日本家庭四散各地。

“有些后裔仍然居住在日本，但分散在不同的县。他们的妻子都改了姓，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还有一些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逃往美国，当时日本经济还处于崩溃边缘。欧洲也有一些后裔，法国和德国有一些。但最糟糕的是，贝尔蒂埃先生，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权获得任何遗产。”

这是一场非自愿的人口迁徙，是现代日本创伤的后果。家庭迫于无奈四散，在他们世界的废墟中竭尽全力地生存下去。

“是天生的无知还是故意的遗忘？”贝尔蒂埃问道，他的好奇心战胜了同情心。

“很遗憾，两者都是。战争切断了家庭联系，这是事实。在美国，一些后裔的身份已经明确，并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动员起来，其中一位名叫松方健二的后裔尤其引人注目，他现在居住在日本，但似乎不再积极参与此事。然而，他曾联系媒体、举办讲座、撰写文章，竭尽全力……但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却杳无音讯。许多其他人也选择了遗忘。翻过这一页，专注于未来，埋葬那

段不堪重负过去。你知道，1945年之后，生存比提出诉求更重要。”

贝尔蒂埃对这种机制并不陌生。他曾在其他剥夺财产的案例中观察到这一点。受害者宁愿选择遗忘，也不愿面对那些过于痛苦的回忆。这种否认正合剥夺者的心意。这种现实令他既恼怒又悲伤——他自己却从未能够忘记哪怕最轻微的不公。

“实际上，这是否会阻碍一切？”

“不一定，但这会让事情变得复杂。如何代表那些不了解自身权利的人提出索赔？如何动员那些甚至不知道自己遗产的继承人？法国当局可能会说：‘没有人提出索赔，所以一切都没问题。’”

“我可能找到了一些线索。在法国法律中——请原谅我的专业术语——有一个概念叫做‘事务管理’，参见《民法典》第1301条及后续条款。”

贝尔蒂埃解释说：“这项源自罗马法并经两百年法理学完善的制度，允许某人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有效地代表其行事。这种机制可以巧妙地规避继承人分散的难题。简而言之，即使没有授权，也可以为了被代表人的利益行事，前提是能够证明这种行为符合松方后裔的利益，即便他们对此毫不知情……理论上，这可以让我的非

政府组织合法地代表继承人行事，即使没有他们的明确同意，只要这种行为对他们有利即可。”

提议引来一阵沉思的沉默。萩生田最终还是开口了，语气中明显带着一丝好奇。

“这个方法很有意思，我承认。但我还想问你一个与我个人有关的问题……”

“我在听。”

“您确定继承人们真的希望看到这样一件痛苦的事情再次公之于众吗？贝尔蒂埃先生，八十年过去了。许多人已经重建了生活，从事了其他事业。为什么要把这一切重新翻出来呢？”

贝尔蒂埃停顿片刻，斟酌着自己话语的分量。这种质疑让他回想起自己的动机。他究竟是为了受害者，还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正义的个人渴望？这条界限有时模糊不清。

“你的提问体现了你对受害者的尊重，这完全值得称赞。但是，你看……抛开继承人的私人利益，此案引发的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松方家族的个案。我们能否在道德上对国家掠夺行为，即使是长期存在的掠夺行为，也置之不理？我们能否接受有组织的遗忘和时间的流逝会抹去最明目张胆的文化犯罪？难道我们没有铭记的责任，没有恢复真相的义务吗？哪怕仅仅是为了缅怀受害者，防止

此类不公再次发生……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松方家族的范畴，它关乎国际文化正义的未来。”

萩生田缓缓点了点头。

—你的观点让我深有同感。你知道，不公正现象在日本依然困扰着我们。这是一种永远无法真正愈合的集体创伤。我们的知识分子和研究人员至今仍在定期讨论这个问题。

贝尔蒂埃感到心跳加速。他对日本创伤之深的这种认识，更加坚定了他采取的行动。

“但实际上，”萩生田继续说道，“你们打算如何进行？法国政府不会轻易放弃如此重要的作品。这些画作是你们国家博物馆的珍宝，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其中的经济和文化意义都非常重大，不是吗？”

这个反对意见合情合理，而且非常准确。

“我最初认真考虑过直接将此事提交给法国主管法院。这是最自然的做法，也是古典法理学所推荐的做法。”

“那你放弃了那种方法？”

“很遗憾，是的。原因具体而又……怎么说呢……令人沮丧。”

贝尔蒂埃发现，法国司法系统对挑战国家财产掠夺的行为抱有系统性的敌意。

“我最近与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交涉让我确信，这条路不仅行不通，甚至还会让我面临巨额罚款。该法院拒绝承认我的组织在涉及国家遗产的这类案件中拥有诉讼资格，”他解释道。

“你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吗？”

贝尔蒂埃打开文件时，一丝不苟，如同一个习惯于记录自己论断的研究者。但同时，他也压抑着被拒绝者的怒火。这些挫折伤了他的律师自尊。

“我最近就两起类似案件向国务委员会提出上诉。第一起案件涉及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北京圆明园一事，2022年11月23日，国务委员会裁定我的请求不予受理。”

“依据什么？”

“啊，理由啊！”贝尔蒂埃干笑着回答道，“那条武断的理由是，只有‘自认为是合法所有者的人’才有理由质疑将战时掠夺的财产纳入国家博物馆的藏品清单。你明白其中的微妙之处吗？法国法院明知大多数受害者并不了解自己的权利，却要求他们亲自站出来，这实际上是在暗中为这些掠夺行为开脱罪责。”

这种措辞暴露了法国体制在保护自身免受不利要求方面的虚假性。

“于1519年，弗朗索瓦一世侵占蒙娜丽莎画像一案中，”贝尔蒂埃继续说道，“国务委员会于2024年5月14日以更为严厉的裁决确认了其判例。”

“更严重是指哪方面？”

尽管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愤怒还是爆发了出来。

— 法院不仅重申了其立场，而且还明确指出我的组织 “不能声称自己有资格代表这些人管理他们的事务”。

“而且你猜怎么着……法院还以滥用诉讼程序为由，对我们处以3000欧元罚款！”

“罚款！” 萩生田惊呼道，“这很能说明问题！”

— 罚款表明存在蓄意的意识形态敌意。法国国务委员会认为，对法国掠夺行为提出异议构成滥用权利。

与宣称的公正无私相去甚远，法院奉行的司法公正根据所涉利益的不同而呈现出变化莫测的性质。

“那么，您正在考虑哪些替代方案？”

贝尔蒂埃打开了一个标有“国际战略”的文件夹。

鉴于国内法律途径已完全失效，我们决定将争端直接提交给主管国际机构，更具体地说，是提交给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这种方法具有几个决定性的优势，贝尔蒂埃对此心知肚明。首先，它将辩论的焦点从法国国家利益转移到了基本权利领域。其次，它使绕过法国法律体系的障碍成为可能。最后，它使此案获得了国际关注。

“你打算以什么具体理由做出决定？” 萩生田问道。

贝尔蒂埃打开了他那本《世界人权宣言》，上面布满了他在夜间研究时做的批注。他喜欢那种将研究对象掌握到极致，甚至细致入微的感觉。

— 论点将基于两项互补的基本权利侵犯。首先是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七条，该条规定“人人有财产权”和“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那么第二项侵权呢？”

— 此举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这两条均保障了公民享有公平审判的权利。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缺乏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审查此类案件的案情，并施加威慑性制裁，这公然侵犯了这项基本权利。

“我觉得这个论点很有道理，”萩生田同意道。

贝尔蒂埃总结道：“法国剥夺了文化掠夺受害者有效诉诸司法的权利，这既违背了其国际义务，也背叛了自身的共和原则。道理就这么简单。”

“至于事实本身，你如何分析这起掠夺事件？”

这个问题让贝尔蒂埃得以展示他的调查结果：数月不懈的研究和无数个在档案馆里度过的不眠之夜。

— 这起掠夺事件是分三起连续进行的，每一起都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当然，这些违规行为都被巧妙地掩盖了

。

“您能详细解释一下这三个环节吗？”

贝尔蒂埃详细地描述了导致松方藏品被掠夺的整个过程

。

谈话继续进行。萩生田详细介绍了松方幸次郎的性格以及他收藏的缘由，而贝尔蒂埃则细致入微地阐述了自己的收藏理念。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却因对正义的共同追求而联系在一起。

贝尔蒂埃总结道：“哈吉乌达博士，您的道义和科学支持对于这项漫长、昂贵、充满障碍……但绝对必要的事业至关重要。”

贝尔蒂埃先生，您可以放心，我和我的日本同事们都会全力支持您。这项事业对我们意义重大，它所象征的远不止是归还艺术品，而是关乎我们的尊严。

挂断电话后，这位法国教授更加坚定了将此案提交国际机构的决心。日本的支持为他提供了宝贵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面对法国政府的官僚主义阴谋，他不再感到孤单。这种国际声援令他深受感动，远超他愿意承认的程度。

当天下午，贝尔蒂埃接待了贝娅特丽丝·克莱因律师，她专攻国际私法。他欣赏她兼具敏锐的专业知识和务实精神——尽管她的直率让他感到不安。

——贝尔蒂埃先生，她说，您的秘书向我解释说，您想就一起有关文化掠夺的争议征求我的意见。

她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这是业内人士惯常的机械动作。

我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最近我曾在欧洲机构处理过几起类似的案件。侵犯文化权利似乎越来越普遍了。

贝尔蒂埃把档案递给他，语气中带着一丝忐忑。他害怕专家们对他工作的评价。

“克莱因律师，感谢您抽出时间。我想提交给人权理事会的案件并不简单。”

他列举了这些困难。

“我们涉及法国宪法、国际公法、行政法，以及关于所有权的民法……”

克莱因女士审阅了初始文件。然后，她抬起头，脸上露出了那种经验丰富的律师在察觉到问题时才会有的表情。

“这个案子看起来准备得很充分。但在深入探讨细节之前，我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哪个？”

“您是否已经用尽了法国的所有法律途径？因为您应该很清楚，这是向国际机构提出上诉的第一原则。”

她的语气变得像个教授，这是她对那些有点过于急躁的年轻同事们不得不采用的语气。

“律师，这正是问题所在。从官方层面来说，我还没有就松方案向国务委员会提起上诉。但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样的上诉毫无意义，只会让我们付出高昂的罚款。现在的判例法已经很明确了。”

贝尔蒂埃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发现，法国司法系统在涉及敏感资产时奉行着一种沉默的准则，即便是为了纠正不公也不例外。这一事实至今仍令他感到愤慨。

“您能说得更具体些吗？因为国内补救措施已经用尽，正是法国政府在意见书中首先会提出的论点，”克莱因律师问道。

贝尔蒂埃老调重弹，再次讲述了他与法国最高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他重读了两项裁决中最引人注目的段落。

克莱因女士分析了刚才宣读的判决书段落。她立即意识到，根据国际标准，这些判决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一判例法非常严格，这还算是客气的说法。在我看来，罚款似乎并不合理。即使是基于事务管理这一理由（尽管这在法国法律中是一种惯例），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也

断然拒绝承认您有诉讼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合理地认为，就松方案提起新的上诉注定会失败，而且您可能面临进一步的、甚至更严厉的处罚。

一位国际诉讼专家的认可让贝尔蒂埃安心了。他并非那种执迷不悟、坚持不懈的诉讼者，而是一位务实之人，能够从法国司法体系的系统性敌意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份认可让他对自己的选择更加坚定。

——我也是这么想的。国际人权法理学承认，当国内补救措施明显无效或使申请人面临不成比例的风险时，用尽国内补救措施的义务并不适用。

“很好。初步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克莱因律师同意道，“我们来讨论实质内容。你们打算依据国际文书的哪些具体条款来提交你们的来文？”

她饶有兴趣地向前倾身。法律论据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法庭上胜诉的几率。克莱因很欣赏这种智力上的挑战。

贝尔蒂埃重复了他向萩生田医生解释的内容。通过援引司法不公，贝尔蒂埃将他立场上的明显弱点——松方案中缺乏直接救济途径——转化为反对法国司法制度本身的实质性论点。

—在我看来，您的论证条理清晰。您所指控的损害已明确界定并有据可查。然而，我想强调一个法国政府无疑会提出的实际难题：您将如何证明您有资格代表松方家的继承人行事？委员会非常重视受害者权益的有效保障。

这个问题触及了整个计划的阿喀琉斯之踵。如果没有对受害者进行清晰的陈述，即使是最精妙的论点也难逃崩溃的风险。

“这正是事务管理理论发挥核心作用的地方，”贝尔蒂埃回答道。

“请继续。”

贝尔蒂埃就这一点提出了与他之前向萩生田博士解释过的相同的论点。

“在这个问题上，你的论点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站得住脚？”

贝尔蒂埃细致地阐述了他的理由。

第一，行为人的意图是为他人而非为自己谋利。第二，该行为对受益人具有客观利益。第三，继承人没有提出任何已知的反对意见。

“你认为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了吗？”

“当然，”贝尔蒂埃肯定地说。“在我的陈述中，我将证明所有法律要求都已得到满足。我代表他人采取行动

的意图，显然源于我所在非政府组织的既定宗旨，即确保博物馆藏品的合法性，并致力于追回被掠夺的财产。此举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因为它旨在纠正一项重大的不公正行为。”

“第三个条件呢？”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继承人有任何反对意见，而且至今为止，所有继承人的身份都尚未正式确定。”

缺乏反对并非源于某种默契，而是权利持有者自身无知所致，他们也是历史所造成的四散流离的受害者。贝尔蒂埃将这一悖论转化为优势。

克莱因大师似乎深信不疑，尽管她内心深处仍然对成功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

——这种方法非常巧妙，展现了您对法国民法的广泛了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您可以援引贵非政府组织的明确法定宗旨，而该宗旨恰好与此类行动相符。理事会可能会认可您对事务的管理，并将其作为您采取行动的有效依据。但具体而言，您打算如何构建和起草这份文件呢？

律师知道，即使是最好的诉讼也可能因为缺陷或草拟不当而失败。

贝尔蒂埃向他展示了自己开始准备的结论。这份文件组织得井井有条，分为几个部分，并附有交叉引用，足以证明其准备工作十分细致。

我撰写了一份完整的沟通方案，约六十页。论证遵循逻辑框架，旨在说服国际法专家。

“你能概括一下它的结构吗？”

当然。首先，需要对掠夺行为及其机制进行详尽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实性描述，并附上所有必要的档案资料。其次，需要分析具体的侵权行为，并引用相关的国际判例。最后，需要详细阐述赔偿请求。

每个元素都与其他元素逻辑契合，形成一个连贯且令人信服的整体。

“您具体有什么要求？”

贝尔蒂埃打开了文件的最后一部分。

— 我希望理事会正式承认松方氏继承人的权利遭到侵犯，并明确建议法兰西共和国立即全面归还被掠夺的作品。

“这些建议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 不，联合国的建议在严格意义上不具有约束力，但它们具有相当大的道德力量，特别是当它们来自联合国时。

由于无法通过法律手段迫使法国屈服，贝尔蒂埃转而依靠国际压力来实现其目标。这种间接的方式符合他的性格：绕道而行，而非正面对抗。

克莱因大师点头表示赞同，尽管她仍然对这种方法的实际效果有所保留。

—联合国的正式谴责将产生强大的道德约束力。

“法国政府很难公开无视联合国的谴责。”

“这就是你在冒的风险。法国无法为维持这种已被世界舆论和媒体正式谴责的掠夺行为辩护。”

两位律师之间建立起一种思想上的默契。克莱因女士理解这项事业的逻辑，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松方藏品案本身。她钦佩这种决心，尽管她认为这种决心有些天真。

他们的讨论继续进行。律师详细介绍了人权理事会的程序，提出了一些改进草案的建议，并提醒大家注意一些陷阱。她的经验在应对联合国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贝尔蒂埃先生，”她总结道，“这一切看起来准备得非常充分。但请永远记住，法国政府将调动其最优秀的律师和所有资源来反驳您的声明。法国不会对如此严重的指控置之不理。”

这场斗争注定是一场艰苦卓绝且实力悬殊的较量。贝尔蒂埃大约六点钟离开时，心中已有了清晰的计划，可以最终敲定她的演讲稿。克莱因先生的分析让她得以完善最后的细节，并预判法国方面的反对意见。

当天晚上，贝尔蒂埃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夜间工作的习惯，给他的朋友让-米歇尔·杜兰打了个电话。

杜兰是一位国际公法教授，他的声誉远远超出了法国国界。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大学时代，那时他们拥有相同的正义理想。

——让-米歇尔，晚上好。希望我没打扰你太晚吧？我知道你一直保持着夜猫子的习惯。

让-米歇尔·杜兰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他自法学院时代起就有的那种温和的幽默。他们彼此太了解了，不需要那些客套话。

——完全不会，皮埃尔。你知道我的，我是个夜猫子！而且你那些案子都那么复杂，我很少有时间感到无聊。你现在又有什么烦心事吗？

贝尔蒂埃笑了。杜兰总能用三个恰到好处的字眼戳破他的笃定。他尊重这位朋友，即便他认为他是个温柔的梦想家。

—我想请您看一下我打算提交给联合国的一个案件。它涉及法国在战争时期遭受的文化掠夺，但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

啊！你还是老样子。总是想把死人复活。可不是嘛，你知道我最喜欢看你去挑战大人物了。

杜兰德的兴趣是真诚的。多年来，他一直热情地剖析被盗遗产案件。

随后，贝尔蒂埃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计划。整整十五分钟，他都在独白，详细阐述自己的方案。杜兰德一边听着，一边不时发出咕哝声，并提出一些专业性的问题。

皮埃尔，一切似乎都说得通了。这真是令人震惊。他们为所欲为，这是有组织的盗窃。

这份认可令人如释重负。杜兰德并非那种为了示好而随意表扬的人——恰恰相反。他的肯定让贝尔蒂埃对自己工作的可靠性更加确信。

“但是……你不觉得时机有点问题吗？八十年可不是小事。即使是为了正当的理由，法院也不太愿意复活玛土撒拉。”

贝尔蒂埃一直在等待对方的反对意见。他早就准备好了反驳论点，因为他意识到这个明显的弱点。

——让-米歇尔，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永远不会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

“理论上或许如此，但实际上……”

“自1944年以来，掠夺每天都在继续，因为法国坚持占有不属于它的东西。”

这个论点切中要害。杜兰德很欣赏这种化劣势为优势的巧妙策略。

“还不错，皮埃尔。你把祖父犯下的罪行变成了日常的现行罪案。但你还指望什么呢？他们会感谢你吗？”

“显然不是！法国绝不会自愿放弃。它有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来整顿内部，但它没有。现在，我们要帮助它。”

杜兰德开始明白其中的逻辑。贝尔蒂埃并非扮演白马王子，而是冷酷地算计着。他想利用国际丑闻作为筹码。这招虽然不浪漫，但却很有效。

“皮埃尔，起初我觉得你的想法有点疯狂。但最终……是的，这或许可行。虽然有风险，但至少你把争论引到了它应该在的地方。”

朋友最后的认可彻底打消了贝尔蒂埃的疑虑。这一肯定证实了他的直觉。

接下来的几周，贝尔蒂埃决定提高公众对这起案件的关注度。他以自己的名义在多个专业网站上发表了文章，例如Academia、莱布尼茨研究所、Village de la Justi

ce等。这些文章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很快，电话和邮件纷至沓来。美国教授、英国历史学家、德国专家和活动人士纷纷联系他。一个小型国际网络自发形成。每一次新的联系都让贝尔蒂埃确信，他并非孤军奋战。松方案正逐渐成为一个象征——对国际法纠正历史错误能力的一次现实考验。

即使他否认，这份国际认可也让他倍感荣幸。多年来默默无闻的学术生涯之后，看到自己的作品被世界各地引用和讨论，给他带来了一种他不敢承认的喜悦。

2025年3月26日，贝尔蒂埃在最终文件上签了字：这是迄今为止针对国家支持的掠夺行为所编纂的最全面的案件。凝视着即将送往日内瓦的副本，他意识到自己刚刚跨过了一道门槛。随着案件进入国际司法体系，它正从他手中溜走。国际司法体系以其出了名的缓慢和不确定性而闻名，但同时——谁知道呢？——也蕴藏着弥补过失的可能。

他的一生都围绕着这类战斗展开。如今，他已经打响了其中最重要的一场仗，他不禁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毅力坚持到最后。

“松方幸次郎，”他喃喃自语，望着墙上挂着的《阿尔勒的卧室》的复制品，“你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我将这场战斗献给你。”

第八章：国际战役

日内瓦，联合国总部，2025年6月

那天早晨，日内瓦湖面泛着金色的光芒，仿佛要驱散笼罩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办公室里沉重的学术氛围。在会议室里，工作组正在审阅每月例行公事，这些例行公事是国际官僚机构即便面对最令人痛心的人道主义悲剧也依然存在的。

这项工作以瑞士钟表般的规律性反复进行。十几位专家审查了那些认为自己受到国家不公正对待的个人或组织的投诉。这是保护基本权利体系中一个低调却至关重要的环节。

卡门·瓦斯奎兹主持会议时，展现出的权威几乎难以掩饰她对本机构真正效力的怀疑。她目睹了一切：食言、掩盖、忽视的建议。作为西班牙最高法院的前法官，她代表了后佛朗哥时代培养的那些法学家，他们怀揣着超越国界的正义理想。

然而，二十三年处理最错综复杂的案件的经历，让她对各国自发改革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她认识到，政府从不会出于善心而让步，而只会迫于舆论压力或自身经济利益。这种逐渐的幻灭感使她变得更加坚强，但也让她更加坚定地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有限权力。

她灰白的头发衬托着一张精致的脸庞，脸上从未流露出任何情感——这是她为了在那种示弱就意味着失去所有信誉的环境中生存而建立起来的一层面具。

她的同事们虽然不喜欢她，但很尊重她，因为他们看到她为了追求效率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女性特质。

她浏览着议程，那种熟悉的疲惫感再次袭来，面对日益增多的不公，这种疲惫感让她难以承受。每一个案件都代表着破碎的生活、破灭的希望和违背的承诺。

“我们的议程包括对十二份新来文进行初步审查。”

她的发音略带卡斯蒂利亚口音，自然流畅地传遍了整个房间。她懂得如何调整语调，牢牢抓住听众的注意力，而且从不显得吃力。这项技能源于她多年法庭听证会的经验，在那些听证会上，她明白说服比恐吓更有效。但今天，她平日的语气中却透着一丝疲惫。

“第一份文件编号为421/2025，来自一家法国非政府组织，涉及法国在战后初期收购的一批艺术品。我必须说，这份文件立刻展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特点。”

瓦斯奎兹过去常常认真准备每一次会议，以此弥补她在面对重大挑战时的无能为力。

“申请方非政府组织声称，其遭受了司法不公和财产权侵犯，如果指控属实，将构成法国严重违反其国际承诺

的行为。但我们暂且不妄下断言，让报告员陈述事实。
”

桌旁六位法律专家彬彬有礼，全神贯注。他们每个人都已审阅过数百份文件，练就了迅速评估论点相关性的卓越能力。

这次国际化的大会体现了联合国系统的多样性：来自不同法学传统的律师、经过再培训的外交官、以及寻求国际认可的学者。所有人都怀着同样的愿景，那就是通过法律改变世界。

克劳斯·韦伯被任命为报告员，他打开了面前的案卷。他体现了德国人的严谨。作为波茨坦大学的副教授，以及多部国际诉讼领域开创性著作的作者，他在学术界以严谨著称。他的研究方法优先考虑事实分析而非泛泛而谈。他对纳粹掠夺以及后来的殖民地侵占的研究树立了新的标杆。但他始终保持着观察者的客观视角，这使他避免了义愤填膺。对韦伯而言，不公正首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概念性问题，而非需要减轻的人类苦难。

在审阅了松方案卷后，他对申请人提出的理论框架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此案展现的复杂性正是他所欣赏的：宪法问题、国际法和行政程序交织在一起，需要进行细致的分析。

韦伯开口道：“主席女士，我最近几天一直在仔细研究这份文件，我必须承认，它所展现出的特点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韦伯喜欢在全神贯注的听众面前展示他渊博的知识。

“我们收到一份请求，质疑法国收购一位名叫松方幸次郎的日本艺术收藏家的藏品的合法性。松方幸次郎于1950年去世。这些作品的失踪情况……至少可以说，扑朔迷离。”

开幕报告条理清晰，营造了大会专注的氛围，为接下来对重要案例的审议奠定了基础。工作组成员已经学会迅速区分有价值的来函和那些有时会充斥议程的无意义请愿。后者通常在匆匆浏览后就被扔进了垃圾桶。

伊莎贝拉·佩雷拉举手发言。这位葡萄牙文化部前副部长肩负着一段堪称典范却又令人沮丧的职业生涯。她的职业道路循规蹈矩——或许对于一个内心渴望不寻常冒险的人来说，过于循规蹈矩了。她毕业于科英布拉大学，最初是一名专攻民事诉讼的律师，之后才加入公共行政部门。这次职业转变源于她内心的召唤，也源于她对私营部门的失望——在那里，她发现金钱往往凌驾于正义之上。她曾处理过几起涉及前葡萄牙殖民地的敏感案件，积累了处理赔偿纠纷的专业知识，这使她在委员会中获得

了公认的权威。佩雷拉是一位受挫的理想主义者，她对在一个她明知存在缺陷的体制中服务感到失望。

“韦伯先生，这家法国非政府组织是否有权代表其未明确指定的日本继承人行事？这类来文往往因为这个障碍而失败。我见过太多案情实质扎实，却因代理权问题而功亏一篑……”

她停顿了一下，意识到自己不小心流露出了悲观情绪。韦伯翻阅着他的手写笔记——他固执地拒绝数字化，声称手写有助于思考，但这主要掩盖了他对现代性的恐惧，他感到现代性令他不堪重负。他那些密密麻麻、字迹工整的纸页，见证了他一丝不苟的工作。

“佩雷拉女士，您的问题直指本次来文所提出问题的核心所在。但申请人已经预料到了这种反对意见。”

韦伯停顿了一下，细细品味着即将揭示他一直在研究的论点的这一刻。

非政府组织“物归原主”（Retour et Restitutions）援引了法国民法典第1301条规定的“事务管理”原则，该原则允许一个人在没有他人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有效地代表他人行事。我必须承认，这很巧妙。

韦伯不禁赞叹这种推理的精妙之处。

“他们的论点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日本继承人实际上无力对法国政府采取行动。”

他翻阅笔记的速度很慢，这让他的同事们很恼火，但也让他能够掌握每一个细节。

非政府组织专门就可受理性的问题撰写了一份长达37页的简报，并引用了112个案例法。这真是一份专业的报告。他们引用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几项判决，这些判决承认协会在类似情况下拥有提起诉讼的资格。

工作组成员对部分申请人准备申请材料时的严谨细致表示赞赏。这与他们经常收到的草率申请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些申请往往只是毫无根据地发泄个人不满。

托马斯·哈里森对这个解释微微皱眉。他体现了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这种传统重视现实主义而非概念上的优雅——这掩盖了他对欧洲大陆微妙之处的厌恶，他认为这些微妙之处过于繁复。他那身由萨维尔街一位声名显赫的裁缝量身定制的威尔士亲王格纹西装，暴露了伦敦金融城的影响，也凸显了英国学术界低调却不容忽视的时尚。他关于普通法和罗马-日耳曼家庭法差异的著作在英语国家的大学里颇具权威性，但也暴露出他对声称要分析的民法的具体细节缺乏了解。

“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分析，”他承认道，“但就通常的国际标准而言，我认为它站不住脚。法国人往往认为

他们的民法适用于任何地方。这种思维方式反复出现，他们难以想象其他法律体系可能更有效。我已经在我们的法庭上见过类似的论点被驳倒，尽管我必须承认，这个论点确实颇具创意。但创意不能取代概念上的合理性。请允许我问一个从您演讲一开始就让我很感兴趣的问题。该组织如何声称了解并维护从未见过面、也从未委托过它任何事务的日本继承人的真正利益？这种代理权的推定在我看来……相当大胆。在普通法体系中，我们对委托和代理权问题要严格得多。未经他人明确同意，任何人不得声称代表他人行事。”

反对意见一针见血，哈里森对此心知肚明。尽管国际法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灵活性，但在一点上却毫不妥协：必须明确界定并代表所谓的受害者。当合法继承人远走他乡时，这一细节往往会使最令人信服的法律论证也无济于事。

卡门·瓦斯奎兹将这一观察记在了笔记本上，顺便赞赏了英国人这种微妙的策略。

“哈里森先生，您的反对意见确实值得关注，”她语气平稳地插话道，“但我们需要在详细评估过程中非常仔细地审查证据可采性问题。不过，我注意到您在听取全部事实陈述之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对程序性问题作出裁决之前，先审查指控的实质内容，岂不是更明智吗？”

瓦斯奎兹的责备礼貌而坚定。他厌倦了看到辩论总是偏离主题，陷入程序性问题，从而回避那些令人不安的实质性问题。

“在讨论程序性问题之前，或许由我们的报告员概述申请人所依据的实际、可观察和客观情况会有所帮助。韦伯先生，请您发言。”

德国律师点头表示同意。

“申请人的论点围绕着对三项连续官方行为的质疑展开，结构非常精妙，”他开始说道，一边寻找其中最重要的段落。“据她所说，每一项行为都存在重大违规之处，令人质疑法国征用行为的合法性。”

韦伯打开文件，翻到贴有红色书签的一页。

“第一个争议事件。1944年10月，戴高乐将军下令将松方藏品作为‘敌产’没收。然而，申请人对此分类提出异议，认为法国从未正式对日宣战。如果这一分析成立，整个法国体制都将从根基上动摇。”

该非政府组织出具了一些看似真实的档案文件副本，以佐证其指控，其中包括外交信函、加密电报、政府会议记录……

拉斐尔·莫拉莱斯此前一直心不在焉地在笔记本上涂涂写写，突然猛地抬起头。这位前智利外交事务顾问曾因调

查与南美军事独裁政权有关的财产掠夺案件而声名鹊起——这段往事至今仍困扰着他，也加剧了他对所有国家（即使是民主国家）的怀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曾是他最热衷的领域，但也正是在那里，他目睹了有组织的有罪不罚现象，并因此感到最为失望。莫拉莱斯亲眼目睹了太多证据消失，太多证人翻供，太多官员逃脱法律制裁，以至于他再也无法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言辞。

“韦伯先生，”他插话道，“关于两个盟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的如此严重的指控，我们的部门能否独立核实？因为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申请人提交的文件，无论这些文件乍看之下多么令人信服。我职业生涯中见过太多伪造的证据，所以难免心存疑虑。”

莫拉莱斯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在皮诺切特统治时期，太多伪造的文件经手过他的办公桌。在这类诉讼中，文件证据的真伪往往决定着最终结果，他早已学会对那些看似完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证据保持警惕。

“您的意见不仅切中要害，而且至关重要，”韦伯回答道，他松了口气，因为他的谨慎得到了认同。“您强调独立鉴定是任何严肃评估的必要前提，这一点完全正确。我已联系了我在德国联邦档案馆的前同事霍夫曼，他建立了一套高度可靠的文件分析方法。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法国国家档案馆进行核实，那里保存着自由法

国和临时政府的所有文件。我们理事会只需通过机构间合作的常规渠道提出正式请求，即可获得对所提指控的最终确认或驳斥。”

这个建议很巧妙，大家都立刻明白了。韦伯巧妙地把举证责任转嫁给了法国当局。

如果巴黎同意公布所要求的资料，其内容将有助于解决争端。如果当局拒绝披露，则此举可能被解读为间接承认其立场薄弱。

伊莎贝拉·佩雷拉挥了挥手，表示她想介入。

“申请人是否提出任何证据，说明法国为何在宣战问题上保持含糊其辞的动机？”

“佩雷拉女士，您说得太好了。该非政府组织正在对这看似蓄意的策略进行全面分析。”

韦伯翻了好几页，寻找合适的段落。

自由法国政府刻意混淆了自身作为抵抗运动和主权国家的地位。这种模糊性使其既能声称拥有合法政府的特权，又能规避国际法的约束。

卡门·瓦斯奎兹点头表示同意。

“我们确实会在初步结论中指出需要进行文件核实。但请韦伯先生继续您的陈述。申请人还对哪些其他行为提出质疑？”

非政府组织提出的第二个质疑点涉及1951年《旧金山和约》的适用。该条约不应适用于与法国并无正式战争关系的国家的财产。申请人在此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根据定义，该条约仅适用于公法意义上的“敌方财产”。然而，如果如申请人第一部分所述，法国并未与日本处于正式战争状态，那么位于法国领土上的日本财产就不能被归类为敌方财产。因此，《旧金山和约》不适用于法国的情况。

托马斯·哈里森挺直身子坐在椅子上，流露出一种他试图掩饰的兴趣。

“这种分析假设《旧金山条约》的起草者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的歧义。这岂不是低估了当时外交官们的智慧吗？”

“这是一个有趣的反对意见。但该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条约筹备辩论摘录表明，法国相对于日本的确切地位问题从未得到解决。”

韦伯翻阅着笔记，寻找确切的出处。

“根据他们的研究，美国谈判代表刻意回避提出这个问题，以免危及盟军阵营的团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通过沉默达成的共识。”

伊莎贝拉·佩雷拉对这个论点表现出好奇，她俯身去看自己的文件。

“这项分析的内部逻辑令我感到不安。如果事实前提正确，申请人指出的矛盾似乎很难从纯粹的逻辑角度反驳。但是请问，该论证质疑的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因为我认为，论证的重点并不止于《旧金山条约》的矛盾。”

“佩雷拉女士，您没有弄错。第三项也是最后一项争议行为是1958年的法令，据称该法令的颁布违反了宪法规定，最终认可了对这批争议藏品的征用。该法令的颁布据称公然违反了1958年法国宪法，该宪法规定政府法令仅允许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而无权用于通常属于议会管辖范围的国际艺术品捐赠。”

这一论点在议会中引起了低声的关注。除了关于最初拨款合法性的实质性问题之外，该案件还提出了宪法形式上的问题，触及了法国公共权力组织的基础。

拉斐尔·莫拉莱斯上台发言。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将面临一项在三个层面上都属于非法的征用。1944年的最初征用缺乏法律依据，1951年滥用国际条约，以及1958年违宪的合法化？”

“正是如此。该非政府组织谈到了一种‘连锁反应’，即每个行为都试图为前一个行为辩护，但最初的脆弱性却会污染整体。”

托马斯·哈里森发言时一如既往地克制，但这克制中却难以掩饰他对法国陷入困境的兴奋之情。他从未在公开场合失态，而是以典型的英国式沉着冷静发表讲话。

“韦伯先生，如果您对申请人论点的分析正确——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那么我们将面临一起明显的侵犯财产权的案件，而且法国法院还未能伸张正义。您认为这种情况值得我们调查吗？因为在我看来，我们正在触及西方民主国家法治的根基。”

英国代表的质询委婉地流露出他对看到欧洲大陆竞争对手陷入尴尬境地的得意之情。除了对所提出的论点进行详细分析之外，专家们还必须确定，这份文件是否包含足够的理由，足以启动针对法国政府的对抗性诉讼程序。

“这是我的初步评估，”韦伯证实道。“这份文件提出的事实问题远远超出了我们通常收到的请愿书的范围。”

韦伯感到一阵久违的兴奋。这起案件融合了他所钟爱的所有元素：法律的复杂性、历史意义以及国际层面。

“文件的质量和所指控违规行为的严重性在我看来足以证明进行对抗式审查的合理性，因为该非政府组织已经用尽了所有可用的内部补救措施。”

韦伯此举定下了基调，展现出一种他此前从未见过的决心。松方事件并非又一起请愿。法国人必须做出解释。

“尤其考虑到申请人坚持认为法国法律下的法律救济无效。该非政府组织援引了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最近的两项裁决，以证明法国法院是如何践踏司法公正的。”

这一举动来得正是时候。议会开始意识到形势对法国不利。沉默许久的拉斐尔·莫拉莱斯挺直了身子，坐直了腰板。

“韦伯先生，您能否详细解释一下这起著名的司法不公事件？在我看来，这项指控极其严重，尤其对于一个自诩为人权摇篮的国家而言。”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义愤填膺，仿佛他毕生致力于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韦伯喜欢那种证据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一摆出来的时刻。

“申请人向我们提交了两份极具启发性的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裁决。第一份裁决日期为2022年11月23日，第二份为2024年5月14日。在这两起案件中一案情几乎与松方案如出一辙——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甚至未对案件实质进行审查，便宣布申请不予受理。其中一起案件中，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未作明确说明的情况下，对申请人处以三千

欧元的罚款。这是一种恐吓手段，旨在阻止那些胆敢质疑国家征用行为的人。”

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两项裁决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它们使“司法不公”的指控变得无比具体。该组织的成员都怀着一个共同的执念：确保民众能够有效诉诸司法。这是他们的共同信念，也是他们民主的凝聚点。

伊莎贝拉·佩雷拉无法抑制住愤怒的表情。

“仅仅因为敢于要求伸张正义就要罚款三千欧元？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恐吓！法国怎么能为这种做法辩护？”

佩雷拉目睹了太多被司法系统抛弃的受害者，因此她对这些做法深感痛心。

“没错，佩雷拉女士，”韦伯表示赞同。“该非政府组织在其简报中引用了欧洲人权法院一贯谴责此类威慑做法的判例法。”

卡门·瓦斯奎兹不经意地瞥了一眼手表，内心在效率的需要和努力压抑的求知欲之间摇摆不定。仅仅一个半小时就耗费在一次沟通上，而还有十二份文件等着他们处理呢！松方案无疑占据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她对这个非政府组织深表同情，因为他们成功地构建了如此有力的论证。在她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她很少见到民间社会组织提出如此透彻的论点。

“鉴于时间已经不早了，我提议我们立即就该案的初步可受理性进行投票表决。其余案卷将推迟到下次会议审议，就这么定了。”

她的提议充分体现了她对松方案的重视——这种重视是她通常会努力压抑的。因为卡门·瓦斯奎兹通常不会为了一个案子而改变自己的日程安排，无论准备多么充分。

她环视众人，以她与生俱来的权威补充道：“就我而言，这份文件似乎足够充分、证据确凿，足以正式通知法国。毕竟，这是程序。法国政府将在其规定的期限内就案件的可受理性和实质内容提出辩护。”

她顿了顿，仔细斟酌着措辞。

——我承认我很好奇巴黎将如何为这种披着合法外衣、实则组织的掠夺行为辩护。因为，即便我们承认法国曾与日本交战——这一点尚待证实——但这就能成为没收私人收藏家文化财产的理由吗？

随后的点头表明了辩论过程中形成的共识。就连起初持怀疑态度的托马斯·哈里森最终也接受了证据。

“我必须承认，我最初是持怀疑态度的，”哈里森坦言。“您也知道我对程序方面有所保留。但必须承认，这项请求提出的问题确实十分严重，值得进行彻底审查。”

伊莎贝拉·佩雷拉点了点头。

“文件资料质量很高，论证也很充分。这起案件值得认真对待，这一点毋庸置疑。此外，它还具有超越法国案例的象征意义。如果我们允许这种做法继续下去，将会向其他国家发出一个灾难性的信号。”

拉斐尔·莫拉莱斯赞同大多数人的观点。

“我们所面临的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足以证明启动真正的对抗式诉讼程序是正当的。尤其考虑到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态度，它对我们的原则表现出一种蔑视，这种蔑视绝不能被忽视。”

韦伯用力点头表示同意。

“亲爱的同事们，我认为我们正在处理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这个案例可能会开创先例，并在文化归还领域树立新的标准。我们有机会证明，个人权利可以凌驾于最强大国家的利益之上。”

投票按惯例进行。结果明确无误。全体一致通过 *初步认定* 该函件可采纳。反对票为零，弃权票为零。

如此广泛的共识证明了皮埃尔·贝尔蒂埃的说服力，同时也证明了每个人最终看到一个可以挑战顽固国家的案例，而这种喜悦是未被承认的。

卡门·瓦斯奎兹在宣布结果时难掩满意之情。

因此，第421/2025号来文被一致认定为可受理。韦伯先生，我已经指示您准备正式通知法国政府。我们给予他们六个月的时间提交意见，这是通常的期限，但如有正当理由，期限可以延长。亲爱的同事们，感谢你们的精彩发言。本次会议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成为最具启发性的会议之一。

当然，这只是初步的受理决定，目前还只是暂定的。一切都尚未定论。一切都可能根据法国方面反驳的力度而改变，而这场反驳势必会到来。

但安理会成员们很久以来第一次感到，他们确实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们知道，他们刚刚在维护国际法、对抗国家利益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韦伯离开房间时，脸上不禁露出微笑。接下来的几个月，松方案将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占据他的全部思绪。这一次，他将有机会证明，德国的严谨不仅能服务于官僚效率，也能服务于正义。

短短几天内，消息就以闪电般的速度传遍了法国的行政体系。

第九章：法国的反应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日内瓦，2025年4月

该非政府组织的来函于2025年4月通过官方渠道送达法国当局。在外交走廊里，每份文件都遵循着自古以来既定的流程，这份来函最初看起来不过是又一份普通的行政文件。然而，在这看似平常的背后，却隐藏着对国家视为既定惯例的根本性质疑。

法国常驻使馆位于外交区一座名为“莱奥尔莫”（Les Ormeaux）的19世纪建筑内。这座气势恢宏的灰色石砌建筑，醒目地展示着共和国国徽，体现了法国一丝不苟的形象塑造传统。国事厅内摆放着各个时期的家具和精心挑选的艺术品，无不彰显着共和国致力于保护和展示的文化遗产。

洛朗·梅里厄曾担任人权机构关系部门负责人六年。他毕业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和巴黎政治学院，衣着考究，低调却不失奢华。在法国外交部（位于奥赛码头）国际法事务部门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又先后在两任部长办公室任职。然而，他开始对所肩负的法国立场是否足够坚定抱有疑虑。他的职责是捍卫法国，无论个人情感如何，但多年的经验使他练就了一身辨别哪些立场站得住脚、哪些立场站不住脚的本领。

那天早上，梅里厄仔细审阅了高级专员公署的通知。他对相关程序非常熟悉，乍一看，这份通知似乎不太可能动摇他的乐观态度。毕竟，每年针对法国的个人举报都有几十起，而且大多数最终都以举报人彻底失败告终。

随着阅读的深入，他的额头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梅里厄感到那种熟悉的焦虑感再次袭来，每当一份文件有可能揭露政府运作的内部机制时，这种焦虑感就会让他感到无比不安。

他拿起手机，拨通了秘书的号码。

“佩兰女士，您现在能立刻召集小组到会议室开会吗？还有，请联系部里，我需要在上午结束前和司长克莱尔·方丹谈谈。”

“好的，顾问先生。我应该把这次会议列为绝对紧急会议吗？”

“比如说……普通紧急程度，但优先级高于所有其他事项。并且要告知同事，我们可能会晚些结束。”

挂断电话后，他望着雨点敲打着窗户，看了一会儿。几分钟后，他得向他的团队宣布另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而这一次，与他处理过的其他案件不同，他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掌握了所有必要的信息。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只有经验最丰富的员工被召集来进行初步评估。房间本身体现了对奢华的追求：实心橡木

拼花地板、红木桌、酒红色皮质扶手椅。墙上挂满了国家博物馆名画的复制品——讽刺的是，其中一些作品的真伪可能正受到质疑。

埃莉丝·莱涅尔第一个到达，腋下夹着她的档案。她毕业于索邦大学和伦敦国王学院，对欧洲大陆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体系都驾轻就熟。在巴黎一家律师事务所取得辉煌的开端后，她出人意料地加入了公务员队伍，这让她的前合伙人大吃一惊。这一决定固然是出于她强烈的共和主义情怀，但也源于她对公务员高层权力的渴望。她从小就被灌输追求卓越和个人成功的理念，但她仍然渴望为公众利益服务。多年的经验告诉她，这两者并非总是能够完全一致。

尼古拉斯·布兰查德紧随其后。他曾担任四年文化专员，为讨论带来了法律专业人士往往缺乏的博物馆事务方面的实践经验。布兰查德堪称一位尽职尽责的公务员的典范，他对艺术的热爱使他对文化外交中那些更为肮脏的方面感到不适。他最初选择这份职业是出于对艺术作品和艺术交流的热爱，并逐渐发现文化也是一种权力工具。

最后抵达的是使团的亚洲事务专家让-马克·鲁塞尔。他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汉学家，曾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东京工作十年，对法日关系的复杂性了如指掌。他的到来

意义重大。梅里厄怀疑此案的影响可能远不止于纯粹的法律纠纷。鲁塞尔具备一线外交官的典型特征：他能洞察即使是最晦涩难懂的案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和人文因素。在日本的多年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他对这个国家和人民始终怀有真挚的感情，这使他对日本文化中至关重要的荣誉问题格外敏感。

我们刚刚收到通知，有人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了一份针对法国的新来文。我们最近几周一直在关注的松方案，现在正式进入了程序。

语气刻意保持中立，仿佛这通通知只是又一项行政手续。

梅里厄继续说道：“在深入探讨细节之前，我想请各位先说说你们的第一印象。鲁塞尔先生，您了解法日关系，这件事让您有何感想？”

“顾问先生，我必须说，时机非常关键。日本目前正经历着民族主义的复兴。日本政府已将追回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日本文化遗产列为优先事项之一。近期已有先例：例如与大英博物馆就葛饰北斋版画进行谈判，以及与美国就1945年后被扣押的艺术品进行磋商……”

鲁塞尔说话很克制。他知道，在礼貌的双边关系表象之下，隐藏着根深蒂固的怨恨。

梅里厄打断道：“你认为这种交流背后可能存在政治因素吗？”

——这很有可能。攻击我们的非政府组织自称是法国的，但并不能保证它没有与日本方面勾结。在我职业生涯中，我经常看到一些看似独立的组织实际上是更广泛国家议程的幌子。

艾莉丝·莱涅尔举起了手。她的性格使她常常倾向于客观分析，而不是地缘政治推测。

我可以提一点看法吗？即便这次沟通真的是东京方面策划的——这一点还有待证实——但这并不会改变论点的说服力。我整个周末都在仔细研读这份文件，不得不承认，它的证据非常充分。

“请详细说明，”梅里厄问道。

——他们显然可以查阅我们认为属于机密的档案。包括1944年的内部信函、当时的专家报告，甚至还有……你猜怎么着……1951年的电报，而我们自己从未将这些电报存入公共档案馆。

房间里一片死寂。莱涅尔感到一阵不安，这种不安感每次遇到准备充分的案件时都会袭来。她懂得尊重有能力的对手，即便他们的利益与她相悖。

尼古拉斯·布兰查德是第一个打破沉默的人。

—这怎么可能？这些文件应该是机密文件。

“这也是我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埃莉丝·莱涅尔回答说。“要么是我们部门内部有人泄密——这非常严重——要么这些文件是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比如家族档案、私人收藏，甚至可能是国外档案……”

梅里厄迅速记下笔记。内部泄密的可能性令他担忧。在信任是团队合作基石的环境中，猜疑可能会长期毒害人际关系。

— 我们需要进一步调查此事。与此同时，莱涅尔女士，您能否概述一下他们的论点实质？

—乐意之至。她详细地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让-马克·鲁塞尔本能地领悟到这种有条不紊的攻击所带来的后果。

他们毫不留情。如果他们的论点成立，我们恐怕将面临一个大问题。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梅里厄表示赞同。“布兰查德先生，从博物馆学的角度来看，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尼古拉斯·布兰查德创建了自己的档案。

—事关重大。这些都是我们馆藏中的标志性作品。它们的消失会在我们的展览布局中留下巨大的空白。从象征意义上讲，这将是一场真正的灾难。这些作品出现在我们的旅游宣传册、明信片和国际展览目录中……

梅里厄揉了揉太阳穴。他感觉那种每当他紧张时就会发作的偏头痛又要来了。

一更不用说这对其他西方博物馆的影响了。如果我们屈服，将会开创一个英国、德国和美国同行永远不会原谅我们的先例。

“正是如此，”让-马克·鲁塞尔插话道，“我从伦敦和柏林的联系人那里得到了一些非正式的反馈。他们正在密切关注此事。大英博物馆在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塑和贝宁青铜器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如果我们在松方身上栽跟头，他们担心会引发连锁反应。”

鲁塞尔表达的是一种令他个人深感忧虑的担忧。他毕生致力于国际文化交流，却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充满不信任的世界取代合作。

“你的建议是什么？”梅里厄问道。

我们必须避免给人留下屈服于压力的印象。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输。我们必须找到第三条道路。

艾莉丝·莱涅尔怀疑地挑了挑眉。

“选哪一个？我们的选择有限。要么在议会面前拼死抗争，要么事先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但我很难想象，如果不默认承认他们的主张，我们该如何谈判。”

尼古拉斯·布兰查德建议说：“或许还有另一种方法。我们可以提议与日本建立文化伙伴关系。这样既能尊重他们的诉求，又不放弃所有权。”

布兰查德坚持这一理念，不愿看到他关于国际文化合作的理想破灭。

梅里厄注意到了这个想法。

——有意思。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他们的论点成立，人权理事会就不会满足于半吊子的措施。

“正因如此，彻底的分析才如此重要，”埃莉斯·莱涅尔强调说。“我们必须调动最优秀的专家，逐条剖析他们的说法。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查明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些机密文件的。”

让-马克·鲁塞尔表示同意。

——我们还需要事先做好准备工作。我建议我们低调地联系日本驻巴黎大使馆。如果此事涉及政治因素，最好通过官方渠道处理。

梅里厄看了看手表。他感到必须采取行动才能重新掌控局面。

好的。我们接下来会这样处理。莱涅尔女士，请您与部里的各个部门协调应对措施。我希望在十五天内收到一份全面的分析报告。

布兰查德先生，请联系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的官员。我们需要一份完整的博物馆学评估报告以及关于这些藏品的全部信息。

鲁塞尔先生，请您谨慎地向我们的欧洲合作伙伴和日本联系人打探消息。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听说过此事，以及他们的立场是什么。

他站起身来，示意会议结束。

—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会面，汇报初步进展。我要明确一点：这个案子现在是我们绝对的首要任务。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第二天早上，埃莉丝·莱涅尔从七点就坐在办公桌前。她通宵研读了有关文化赔偿的国际案例法，得出的结论远非令人安心。她的桌上堆满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书、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以及大量国际仲裁庭的裁决。所有这些文件都对法国的传统立场构成了相当不利的影响。

莱涅尔的手机响了。是该部副部长克莱尔·方丹打来的。
— 艾莉丝？我今天早上收到了你的留言。你能用几句话概括一下情况吗？

— 你好，克莱尔。简而言之，我们遇到了大麻烦。攻击我们的非政府组织提出的论点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有力得多。

“这么严重？”

唉！他们发现了之前无人察觉的漏洞。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获取了我们以为绝对安全、不会被窥探的文件。

方丹默默承受了这一打击，带着经历过其他危机的人特有的隐忍。作为巴黎高等商学院（HEC）的毕业生，她的经验告诉她，最严重的问题往往是最后才被发现的。

我们需要尽快见面。你今天下午能在巴黎吗？

当然。我需要准备什么吗？

一把所有能带的东西都带上。部长从今天早上就开始亲自关注这件事了。相信我，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艾丽丝·莱涅尔挂断电话，一脸困惑。部长如此迅速地关注此事，要么意味着他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了消息，要么意味着爱丽舍宫正在密切关注。无论如何，压力即将升级。她深谙国家运作之道，知道部长的关注足以将最琐碎的事情变成重大事件。

她的电脑响了。是尼古拉斯·布兰查德发来的短信。 “

艾莉丝，我今天早上和奥赛博物馆首席策展人克劳德·瓦特兰通了电话。他同意明天和我们见面，但我一提到松方事件，他就显得很恼火。他甚至称之为‘敏感事件’。我感觉他们肯定还有什么事瞒着我们。附注。 ”

她立即回复道：“我今天下午要去巴黎见克莱尔·方丹。你能安排我明天上午和瓦特林见面吗？还有，尽量打听一下是否还有其他人能提供一些关于收购条件的信息。ÉL。”

在卢浮宫，亚洲艺术部首席策展人弗朗西斯卡·博尼尼的办公室里正在进行电话交谈。

—克劳德？我是弗朗西斯卡。我刚接到日内瓦常驻代表团的电话。他们想和我们谈谈松方的作品。

“啊，”电话那头的克劳德·瓦特兰说道，“自从上周在《世界报》上读到那篇文章后，我就一直在等这个电话。你还记得1958年的那次收购吗？”

—大概知道。那是在我们出生之前的事了。不过，昨晚读完那篇文章后，我查阅了我们的档案。里面有一些……嗯，令人不安的内容。

每当她发现自己所服务的机构存在缺陷时，博尼尼都会感受到这种令她不安的情绪。作为学者之女，在追求真理和正直的熏陶下长大，她很难容忍对事实的妥协。

—比如什么？

—法国私人收藏家发来的抗议信，声称对其中几件作品拥有所有权。存在争议的专家鉴定报告。最重要的是，

一份1959年的内部报告提到了将这些作品纳入国家遗产名录过程中的“违规行为”。

克劳德·瓦特林叹了口气。

“我原本希望我们能对这件事的某些方面保密。但如果某个非政府组织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我们就别无选择。”

“问题是：我们在透明度方面愿意走多远？这些作品是我们馆藏的杰作。移除它们会造成巨大的缺口。”

“我知道。但我们不能对监管部门撒谎。如果他们质询我们，我们就必须说实话。”

——全部真相？

瓦特林正在权衡他的回应会带来哪些后果。

“弗朗西斯卡，我们是策展人，不是政治家。我们的职责是保护艺术作品并向公众展示，而不是掩盖过去的错误。如果这些藏品的收购存在违规行为，那么现在就揭露出来，总比十年后在国际法庭上被审判要好得多。”

“你说得对。但我们这样做会让一些人不高兴。”

“或许吧。但我们问心无愧。”

当天下午，埃莉丝·莱涅尔乘坐TGV高速列车前往巴黎。旅途中，她最后一次重读了非政府组织案件中最具争议的论点。

她到任时，欧洲和外交部正处于动荡之中。走廊里充斥着低声交谈，她遇到的几位同事都刻意避开她的目光。松方事件引发了诸多猜测。莱涅尔察觉到了行政危机的征兆：当敏感事件开始引起轩然大波时，走廊里就会弥漫着一种特殊的紧张气氛。

克莱尔·方丹正在等他，陪同她的是多边文化事务部部长奥利维耶·勒孔特。

“艾莉丝，谢谢你这么快赶来。奥利维尔今天花了一整天时间查阅我们的内部档案，他的结论……令人担忧。”

奥利维耶·勒孔特看起来筋疲力尽。他肩负着沉重的负担，那些真相他宁愿从未揭露过。

“我查阅了所有可查阅的文件，包括那些从未存入国家档案馆的文件。我必须告诉你，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

“怎么说？”艾丽丝·莱涅尔坐下后问道。

“首先，有些文件本不应该离开我们的档案库，却落入了非政府组织手中。比如电报、与日本方面的往来信件……”

克莱尔·方丹打断了他。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得到这些东西的吗？

“有几种假设。要么是内部人员泄露的——这将非常严重——要么是来自私人档案。”

“那么实质内容呢？这些文件是怎么说的？”

“这些文件表明，当时的法国当局意识到了这笔征用行为的可疑之处。1951年，我方驻东京大使发来一份电报，其中写道：”

“松方家的继承人正式对我们对该藏品的所有权提出异议，他们的论点并非毫无道理。”

艾莉丝·莱涅尔感到胃部一阵紧缩。这个消息证实了法国的处境十分脆弱。

“那么巴黎方面作何回应呢？”

——奥赛码头方面已指示 *“坚定地坚持我们的立场，不要进行可能只会使局势复杂化的详细讨论”*。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以善意为由进行辩解。如果这些文件确凿无疑，它们就表明法国明知自己犯了错。”

“这还不是全部，”奥利维尔·勒孔特继续说道，“我找到了一份1958年由我们部门起草的内部备忘录，其中建议‘尽快通过立法手段规范这些作品的归属状况，以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纠纷’。因此，1958年的这项法令本质上属于监管性质，并非例行的行政行为，而是为了匆忙掩盖一次可疑的侵占。”

艾莉丝·莱涅尔闭上眼睛几秒钟。她正在评估自己即将建立的防御体系会如何崩溃。

“我们将很难证明我们立场的合理性。”

“这话说得太轻描淡写了，”克莱尔·方丹赞同道。“问题是：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有几个选择，”艾莉丝·莱涅尔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首先，我们会积极抗争，希望理事会不会对这份来文采取行动。但鉴于非政府组织掌握的文件，这不太可能。”

“第二种可能性？”奥利维尔·勒孔特问道。

“我们事先协商达成和解协议。我们默认承认继承人的权利，但会找到一个能让我们保住面子的办法。长期借展、巡回展览、文化合作……”

“第三个呢？”克莱尔·方丹问道。

“最彻底的办法是承认错误并归还作品。这样做虽然当下会给我们带来痛苦，但却能避免遭受更具破坏性的国际谴责。”

方丹坚定地摇了摇头。他的直觉告诉他，有些选择根本行不通：

“我需要把这件事上报给部长。这个决定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专业能力范围。艾莉丝，你能准备一份明天早上交

的简报吗？务必把所有细节都写进去，不要有所隐瞒。”

“当然。但我必须警告您。如果我们选择对抗，我们就有失败的风险。而如果我们失败了，其后果将远远超出法国的范畴。”

奥利维尔·勒孔特表示同意。

“艾莉丝说得对。”

“因此，精心制定战略至关重要，”克莱尔·方丹总结道。“我们必须在法律、外交和沟通等各个方面都无可指摘。”

第二天，克劳德·瓦特兰在奥赛博物馆接待了尼古拉斯·布兰查德和艾莉丝·莱涅尔。他很紧张，双手不安地比划着，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瓦特兰一生致力于艺术事业，直到晚年才发现，这项崇高的使命也存在着他宁愿忽略的盲点。

“瓦特林先生，”尼古拉斯·布兰查德开口说道，“我们需要您提供关于您收藏的松方作品的确切获取情况的专业知识。”

“听着，我得坦白地跟你谈谈。这件事多年来一直让我感到不安。2018年我上任时，就想审查我们所有的战后收购项目，而松方事件立刻让我觉得很成问题。”

一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说说获得这些作品的条件。1944年，我们从罗丹博物馆的地窖里找回了这些作品，它们自战争开始以来就一直被存放在那里。”

“你是说我们实行了自助服务？”尼古拉斯·布兰查德惊讶地喊道。

“这有点夸张，但也不完全错误。国家财产管理局确实编制了清单，但缺乏严谨的专业鉴定和来源核实。必须承认，那个时代并非注重细致行政工作的时代。”

克劳德·瓦特林走到他的保险箱前，拿出了一份落满灰尘的文件。

“早在1946年就出现了争议。我找到了一些巴黎艺术品经销商的来信，他们声称对其中几件作品拥有所有权。他们声称这些作品是战前从松方本人处购买的，且订有正规合同。”

“发生了什么事？”艾莉丝·莱涅尔问道。

“当时的当局断然驳回了这些说法。官方认定松方的所有资产都属于‘敌产’，因此予以没收。”

他打开文件，取出几封泛黄的信件。

“你看，这是我们当时的馆长和文化部在1947年的一封往来信件。我们的馆长写道：‘如果继承人能拿出确凿的证据，这些收购可能会受到质疑。’”

尼古拉斯·布兰查德脸色苍白。他发现，自己曾全心全意为之服务的机构，其根基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高尚。

“那么，该部对此作何回应？”

— 必须 *“尽快规范局势，以避免任何麻烦”*。

艾莉丝·莱涅尔明白这些爆料对于诉讼程序的继续进行至关重要。

— 瓦特林先生，如果我们被要求在国际机构面前为自己辩护，您是否愿意为这些事实作证？

他犹豫了一下，仔细斟酌着措辞。

“听着，我的职责不是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法国政府的立场，而是维护我所领导部门的科学和道德操守。如果你正式问我这个问题，我会凭良心回答。”

—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会如实说明这些作品的获取情况，即使这不符合法国的利益。我不能对已证实的事实撒谎。”

尼古拉斯·布兰查德和埃莉丝·莱涅尔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他们刚刚意识到，保守党人不会无条件地支持他们。瓦特林的正直品格让他们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还有一件事，”瓦特林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昨天，卢浮宫的弗朗西斯卡·博尼尼在她自己的档案中发现了更多令人尴尬的东西。”

“什么类型的物品？”艾莉丝·莱涅尔问道。

“1959年的专家报告对某些作品的归属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显然，在1944年的仓促时期，我们的前辈们将一些实际上是复制品或工作室作品的作品，归于名家名下。”

尼古拉斯·布兰查德猛地坐了起来。他感到一阵眩晕，因为他一直以来所确信的一切都在逐渐崩塌。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当时是为了保住那些赝品而战？”

“并非赝品，而是艺术和商业价值被严重高估的作品。例如，有一幅所谓的‘梵高’作品，很可能是蓬塔旺画派的作品；还有一幅所谓的‘塞尚’作品，可能是20世纪初的仿作。”

艾莉丝·莱涅尔愤怒地指出，她正在衡量这些爆料的影响。

“这些专家报告当时是否已提交给监管机构？”

“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根据我们拼凑出的信息，这些报告被掩盖是为了避免丑闻。试想一下，如果公

众得知法国政府竟然执着于收藏来历不明的作品，会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

“那么现在呢？这些报告还存在吗？”

“弗朗西斯卡在部门档案馆里找到了它们。它们从未被移交给国家档案馆。”

尼古拉斯·布兰查德双手抱头。

“我们不仅面临法律上的败诉风险，而且看起来就像多年来一直执迷于二流作品的傻瓜一样。”

“恐怕有些作品的确如此，”克劳德·瓦特兰证实道，“幸运的是，莫奈的三幅画、梵高的《阿尔勒的卧室》以及雷诺阿的两幅画都是真迹——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并不能改变根本问题。”

艾莉丝·莱涅尔收起了笔记本。

“瓦特林先生，您能否把所有这些文件的副本发给我们？我们需要它们来准备辩护。”

“当然。但我得提醒你，如果这件事曝光，我们就不得不对战后藏品进行全面重新评估。而这可能会暴露出许多其他问题。”

当晚回到日内瓦后，埃莉丝·莱涅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洛朗·梅里厄、尼古拉斯·布兰查德和让-马克·鲁塞尔

齐聚会议室，但气氛与前一天截然不同。巴黎的爆料让整个团队都笼罩在阴霾之中。

“我认为，经过过去48小时的磋商，我们需要评估一下目前的形势。莱涅尔女士，您能否总结一下我们目前的处境？”

情况比我们最初预想的还要糟糕。这家非政府组织不仅掌握了我们以为是机密的、足以让我们陷入困境的文件，而且我们自己的保管人也不愿意无条件地支持我们。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发现了一些严重削弱我们立场的证据。

她打开文件时，动作精准到位，一副处理疑难案件经验丰富的律师的样子。

“首先，当时的法国当局明知这种征用行为有问题，档案资料足以证明这一点。其次，早在1946年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我们却故意置之不理。最后，我们极力维护的一些作品甚至都不是真迹。”

让-马克·鲁塞尔忍不住插手了。他很担心这些爆料会带来什么后果。

“我的天哪！我们的前辈怎么会制造出这样的烂摊子？”

梅里厄提醒道：“我们需要把事情放在当时的背景下看待。当时我们刚从战争中走出来，政府一片混乱，优先

事项也分散在其他方面。但当时做出的决定，如今却给我们带来了难以克服的难题。”

梅里厄站了起来，希望通过这场运动来发泄他的沮丧情绪。

“我们需要展望未来。除了松方的作品这一具体案例之外，我们整个文化外交模式都受到了质疑。我们准备好挑战它了吗？”

“完全正确，”伊莉丝·莱涅尔插话道，“我今天早上接到了英国同行打来的电话。外交部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他们担心，不利的先例可能会重新引发其他索赔。”

“他们的意思是？”

“在欧洲范围内协调我们的辩护工作。其理念是在人权理事会面前展现统一战线，所有相关国家的论点保持一致。”

“这或许有效。但这有可能看起来像是前殖民列强针对被剥夺了文化遗产的国家而发起的阴谋。”

“这就是风险所在，”梅里厄同意道。“我们必须在西方团结和尊重合理诉求之间找到平衡。”

“我或许有个主意，”尼古拉斯·布兰查德建议道，“为什么不提议设立一个国际文化归还基金呢？西方国家可

以为这个机制提供资金，用于补偿那些文物被掠夺的国家，同时又能将这些文物保留在它们现有的收藏中。”

艾莉丝·莱涅尔摇了摇头。她的现实主义让她拒绝那些回避问题核心的方案。

“理论上这很有意思，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我们的对手在法律上站得住脚，他们不会满足于经济赔偿。”

“尤其是在日本这起事件中，金钱并非问题所在，”让-马克·鲁塞尔补充道，“如果这是一笔商业交易，日本完全可以按市场价格回购这些作品。不，这其中显然蕴含着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

鲁塞尔表达了一个他的同事们难以接受的事实。

梅里厄看了看手表。他感到需要通过计划来重新掌控局面。

“必须立即做出决定。我们没有时间去纠结于假设性的解决方案。我的建议是：同时准备三种方案——全力抗争、和解谈判，以及承认错误并归还作品。与此同时，我将探明巴黎方面以及我们欧洲伙伴的反应。”

“那么最终的决定权在谁手中呢？”尼古拉斯·布兰查德问道。

“无论如何，这都不会是我们决定。如此重大的案件必然要上报部长级，甚至爱丽舍宫。我们的职责是准备信息，客观地提出各种方案。”

艾莉丝·莱涅尔关闭了她的档案。

“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工作吧。我有十五天时间来准备一份完美无瑕的辩护，即使我并不真的相信自己能做到。”

“我还会准备和解谈判所需的材料，”尼古拉斯·布兰查德补充道，“谁知道呢，这个非政府组织或许会接受我们的论点。”

“至于我，”让-马克·鲁塞尔总结道，“我会谨慎地评估日本方面的心态。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传统渠道解决争端，那将远比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冲突要好得多。”

在日内瓦团队准备辩护的同时，其他方面也在积极行动。在巴黎，克莱尔·方丹与最高级别的国家官员进行了多次秘密磋商，寻求对这起逐渐失控的案件的指导。

四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三晚上，当她抵达爱丽舍宫顾问办公室时，办公室里一片昏暗。前大使、后来成为总统亲密合作者的阿尔诺·普里让以恰当的庄重态度迎接了她。

“克莱尔，谢谢你这么晚才来。松方事件甚至在这里也开始引起关注了。自从昨天早上接到日本首相的电话后，总统就对此事非常重视。”

克莱尔·方丹感到心跳加速。她意识到案情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了。

“首相是否直接联系了爱丽舍宫？”

“官方说法是，这是一次礼节性通话，为6月份的七国集团峰会做准备。但首相话里话外地暗示了‘某些争端需要本着合作精神加以解决’。此意已被清晰地理解。”

“换句话说，东京是在向我们施压吗？”

“事情远比这更微妙。他们是在让我们承认，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比公开对抗要好。而且他们说的或许是对的。”

阿诺·普里让打开了一份标有“国防部机密”的文件。他的眼神流露出疲惫，仿佛在处理在他到来之前很久就已犯下的错误所带来的后果。

“我委托情报部门对非政府组织‘物归原主’（Retour et Restitutions）进行了评估。评估结论……令人深思。”

“从哪个意义上来说？”

“该组织是法国的，其领导人也都很正直。但它却从一个与东京政府有关联的日本文化基金会获得了大量资金。这虽然不违法，但却耐人寻味。”

克莱尔·方丹默默记下了这些信息。她怀疑这件事远不止是简单的关联性指控那么简单。

“这证实了我们的怀疑。这一切背后很可能存在政治因素。”

“这彻底改变了局面。我们不再面对非政府组织的诉求，而可能面对的是日本的某种策略。而这，实际上或许是一个机会。”

“为何如此？”

“如果东京方面愿意谈判，我们可以将讨论范围扩大到松方事件之外。贸易关系、技术合作、文化项目……这场危机肯定可以成为双方和解的契机。”

Prigent表达的正是这种理想主义愿景，即把每一个困难都转化为国家伟大的工具。

“这假设我们准备在文化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

“这是总统让我研究的问题。为了维护与日本的关系，我们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而这又会对我们与其他伙伴的关系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我们不与欧洲盟友协商就放弃，他们是不会原谅我们的。”

“因此，你与伦敦和柏林的协调工作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要采取行动，就必须携手并进。克莱尔，我直说了吧。总统不赞成归还这些作品。但我们的国家藏品绝对不值得我们与日本之间爆发危机。正因如此，你的作用才显得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既能满足日本方面要求，又不至于开创危险先例的办法。长期借展、加强博物馆间的合作、象征性地承认权利……必须找到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方丹深知自己任务的复杂性。她必须在有限的资源下，协调各种相互冲突的需求。

“我需要知道我们给自己设定的界限是什么。如果找不到其他解决办法，我们是否准备考虑归还？”

“不，归还完全不可能。”

普里让的声明犹如醍醐灌顶：这些是爱丽舍宫在任何借口下都不会逾越的红线。

与此同时，让-马克·鲁塞尔也在进行着自己的秘密磋商。他曾是驻东京的外交官，与日本政府和文化界人士保持着广泛的联系。他的通讯录对于了解此事的真正利害关系至关重要。他安排在巴黎第七区一家不起眼的小日式餐厅与日本驻巴黎大使馆文化专员山形京孝会面。十年前，他们在小皇宫举办的日本艺术展上相识，此后一

直保持着朋友关系。这种私人关系使得他们能够进行比官方渠道通常允许的更为坦诚的交流。

“京孝，谢谢你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同意见我。”

“让-马克，你很清楚，我们的私人情谊超越了这些偶然因素。但眼下形势很微妙。”

他们用日语点餐——这是让-马克在东京生活多年后保留下来的习惯——然后小心翼翼地切入正题。鲁塞尔很欣赏这种外交回归人性化的时刻。

“关于松方的事情……你当然知道吧？”

“这很难忽视。过去一周，它一直是日本媒体的头条新闻。而且，我必须说，这对法日关系来说并非好事。”

让-马克·鲁塞尔啜饮着茶，享受着这个仪式，这有助于他重新获得进行艰难谈判所需的心态。

“贵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是什么？”

“官方立场？我们没有立场。这是法国一家非政府组织发起的私人行动，我们无权干涉。”

“那非官方的呢？”

山形京孝笑了。

“虽然并非官方说法，但人人都知道，这批藏品对我们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松方先生是我们伟大的

文化赞助人之一，看到他的作品分散在国外博物馆，一直是日本公众舆论的痛点。”

“甚至到了引发事端的地步？”

“没有人希望发生事端。但日本公众舆论对文化遗产问题非常敏感。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利，可能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让-马克·鲁塞尔放下了鼓槌。他觉得他需要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坦白说，要达成友好和解需要什么条件？”

“法国至少应该在象征意义上承认，1944年的那次征用……这么说吧，是值得商榷的。未必违法，但确实值得商榷。”

“然后呢？”

“接下来，需要找到一个能让日本重新与这段历史遗产建立联系的方案。不一定是立即归还，但至少要有一个中期的计划。”

“什么类型的方案？”

“我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法日文化中心……长期借展……如果双方都发挥创造力，可能性还有很多。”

让-马克·鲁塞尔将这些提议记在心里。他正在评估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余地。

“如果法国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呢？如果我们只是依据条文进行辩护呢？”

山形京孝的脸色不易察觉地变得严肃起来。鲁塞尔认出了这种表情变化，他经常在日本对话者谈及国家尊严等问题时观察到这种变化。

“那将令人遗憾。不仅对我们的双边关系不利，对法国的国际形象也有损害。世界舆论对文化归还问题日益敏感。”

“你是指其他类似的争端吗？”

“显而易见。如果法国系统性地阻挠这些问题，可能会鼓励其他国家提出更激进的要求。比如埃及的文物、非洲的部落艺术、希腊的大理石雕塑……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同时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守势。”

这正是法国当局所担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让-马克·鲁塞尔转移了话题，试图评估日本动员的规模。

“那么贵国的公众舆论呢？人们如何看待这起案件？”

“民众对归还文物的诉求确实给予了广泛的支持。日本人认为，他们的文化遗产在20世纪遭到大规模掠夺，先是西方列强，后是战争时期。追回松方藏品将被视为一种正义的伸张。”

离开餐厅后，让-马克·鲁塞尔对局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日本并不想对抗，但也不会退让。必须找到一个能让两国都保住面子的解决方案。

在法日磋商的同时，欧洲各国首都之间也展开了密切的磋商。松方事件不再仅仅是法日之间的争端，而是对西方国家在文化赔偿诉求面前团结一致的一次考验。

在伦敦，英国外交部组织了一场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代表的会晤。英国外交部的会议室，维多利亚时代的木镶板和历任大臣的画像，为这些昔日殖民强国之间的会谈提供了合适的场所。建筑本身也让人想起，在那个时代，文化合法性问题远没有现在这么紧迫。

文化事务副国务大臣威廉·彭伯顿爵士主持了会议。他善于将危机转化为合作契机，这种才能使他成为欧洲外交界备受重视的对话者。

“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为了讨论一个与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即使这个问题直接针对的只是我们的法国朋友。”

代表法国参赛的克莱尔·方丹对此表示赞同。

“感谢您主动发起此次磋商。松方事件牵涉到的远不止法国的利益。”

德国代表汉斯·穆勒问道：“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吗？”

穆勒是受过处理历史争端训练的德国外交官之一。德国在处理归还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使德国在这类讨论中拥有特殊的合法性。

“情况令人担忧。攻击我们的非政府组织论点有力。我们获胜的希望渺茫。”

意大利代表朱塞佩·比安奇向他的对话者发表了讲话。

“如果你们输了，对我们其他人会有什么影响？”

“这真是个非常不幸的先例，”克莱尔·方丹直言不讳地回答道，“你所有来路不明的藏品都可能面临类似的指控。”

威廉·彭伯顿爵士双手合十。

“这就是我们所担心的。如果联合国开创了有利于归还的先例，我们将面临铺天盖地的请求。”

汉斯·穆勒对此表示强烈赞同。他在德国的经历使他对其中的风险有着敏锐的认识。

“德国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我们的博物馆里充斥着许多来历不明的藏品。如果国际法朝着归还原则发展，我们将陷入尴尬的境地。”

“更不用说经济方面的问题了，”朱塞佩·比安奇补充道，“赔偿所有被掠夺的国家将花费欧洲各国数十亿欧元。”

克莱尔·方丹抓住了这个机会，提供了她一直以来所寻求的协调服务。

“所以我们需要协调一致。如果我们能团结一致，就更有可能维护现状。”

“你具体提出了什么建议？”

“首先，我们需要协调彼此的论点。我们必须捍卫相同的原则：取得时效、善意取得、藏品的公共利益……”

“然后呢？”汉斯·穆勒问道。

“就所有归还事宜进行持续磋商。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人受到攻击，其他人都会提供支持和论据。”

朱塞佩·比安奇摇了摇头。

“这有点纸上谈兵了。例如，就日本的情况而言，我们实际能做些什么呢？”

克莱尔·方丹已经准备好了答案。

“您可以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第三方意见，说明该非政府组织的主张威胁到国际文化交流的平衡。这将有助于加强我们的论点。”

威廉·彭伯顿爵士似乎很感兴趣。他正在评估法国提议的巧妙之处。

“这并非不可能。但作为交换，如果我们在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塑或其他争端中遭到攻击，法国是否应该承诺支持我们？”

“没错。这就是欧洲的团结。”

朱塞佩·比安奇对此表示怀疑。他的经验让他对那些关于国际合作的漂亮话心存戒备。

“问题是，没人会上当。大家都会认为我们抱团是为了不归还我们的艺术珍品。”

威廉·彭伯顿爵士以英国人一贯的克制结束了会议。

“我想我们意见一致。我们都希望在文化归还问题上协调彼此的立场。但在落实过程中，我们必须非常谨慎，避免给人以自私自利的印象。”

克莱尔·方丹提议：“我们将起草一份关于保护欧洲公共藏品完整性重要性的联合声明。未来几天，您可以与我们分享您的意见。”

离开伦敦时，克莱尔·方丹确信她已经获得了欧洲伙伴的支持。但她也清楚，如果松方事件对法国不利，这种支持可能会非常脆弱。欧洲的团结不会轻易被权力斗争所动摇。

回到巴黎后，她被紧急召到欧洲和外交部。

部长的幕僚长伯纳德·瓦利耶是一位精明的资深公务员。他总能在危险事件爆发前就识别出来，正是这种才能使他得以在政治变革中幸存下来。

“克莱尔，请坐。我今天早上接到了三个电话。第一个是爱丽舍宫打来的，他们已经有些不耐烦了。第二个是我的日本同事打来的，他明确表示东京方面希望我们采取行动。最后一个是卢浮宫打来的，他们担心这会对我们的其他藏品造成影响。”

克莱尔·方丹拿出了她的文件。她从瓦利耶的举止中察觉到压力正在增加，这将大大增加她任务的难度。

“幕僚长先生，目前的情况需要谨慎行事。但我们已经确定了几种方案。”

她向贝尔纳·瓦利耶概述了埃莉丝·莱涅尔提出的三个方案：全力辩护、和解谈判，或承认错误并作出赔偿。瓦利耶认真地听着。他知道，接下来几个小时做出的决定将对法国的处境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三个方案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爱丽舍宫正式反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宣布要将国家博物馆的艺术瑰宝归还给日本，公众会作何反应！反对派会群起而攻之。”

瓦利耶表达了笼罩整个事件的种种限制。他能够预判公众舆论的反应，这使他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顾问。

“我明白。但我们也必须考虑长远后果。如果我们阻挠后失败，我们的国际形象将遭受持久损害。”

“您个人有什么建议？”

克莱尔·方丹犹豫了几秒钟。她意识到自己的回答将影响整个法国战略。

“与非政府组织进行和解谈判。我们仍有机会找到一个体面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等待太久，就有可能陷入被动局面。”

“那么我们的欧洲伙伴呢？他们会接受我们放手吗？”

“他们宁愿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也不愿遭受惨败。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既能保留核心要素又能令日本人满意的创新方法，他们就会接受。”

伯纳德·瓦利耶拿起电话，直接拨通了部长的电话。他详细地解释了情况。十分钟后，通话结束。随后，伯纳德·瓦利耶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表情对克莱尔·方丹说道。

“部长态度明确。命令来自上级。情况已经改变。对总统而言，与非政府组织进行任何谈判都是不可能的，归还艺术品更是绝无可能。因此，只剩下第一个选择：全力防守。明白了吗？”

“非常清楚，幕僚长先生。”

方丹深受打击，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通过协商解决的最后希望破灭。

“请随时告知我最新情况，我可承受不起任何意外。”

既然诉讼已成为首选方案，各方便集中精力完善法国的辩护策略。然而，矛盾的是，这种明确反而缓解了压力。那些为法国政府效力的人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熟悉的领域：无论国家立场本身存在何种缺陷，都要坚持不懈地捍卫它。

由于法律并非一门精确的科学，而只是一种简单的技巧，因此只需逐一驳斥非政府组织的论点即可。法国政府非常擅长此类工作。

但与此同时，权力走廊里也在推进另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将揭示政府算计的全部复杂性。

第十章：立法僵局

巴黎，文化部，2025年7月15日

瓦卢瓦街上的办公室闷热难耐。巴黎正经历着一个异常炎热的夏天，就连17世纪的古老城墙也无法再为这座城市带来凉爽。

在这座气势恢宏的建筑内，一切活动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走廊里回荡着高跟鞋敲击老旧镶木地板的清脆声响，夹杂着文件翻动的沙沙声和不间断的电话交谈声。一场改革正在酝酿之中。而且并非普通的改革。自2017年11月28日总统在瓦加杜古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讲以来，法国政府一直在努力落实一项曾引起轩然大波的承诺。

“我无法接受几个非洲国家的大部分文化遗产都留在法国，” 共和国总统曾向非洲青年如此宣告。

犹如晴天霹雳。博物馆界一片哗然，外交官们面露难色，律师们则纷纷翻阅法律条文。有人视之为天才之举，一个足以重塑后殖民时代关系的远见卓识；也有人认为这纯粹是哗众取宠，一场毫无长远影响的宣传噱头。但这都无关紧要。方向已定，政府机构必须遵从。

于是他们纷纷效仿。经过数年无休止的审议，咨询了全国所有能找到的文物专家，以及旷日持久的谈判，最终形成了一个最低限度的立法框架，剔除了其中最令人不安的部分。继此前关于反犹太主义掠夺和归还人类遗骸

的两项框架法之后，这项关于向国家归还文物的法案使整个过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这种做法使他们能够在不扰乱既有秩序的情况下满足所有要求。

自从选择了法律途径后，松方案就显得次要了。至少一些官员是这么认为的。非政府组织“物归原主”在联合国提起的诉讼确实引起了轰动，但相关部门已经重拾信心。他们的立场坚定，论据也准备充分。

在部委五楼的会议室里，一场工作会议正在召开。会议的目的是审查法案的进展情况，并探讨其与正在进行的法律纠纷之间的关联。椭圆形的桌子在荧光灯下闪闪发光，周围环绕着历任部长庄严的画像，他们仿佛慈祥地注视着这些新上任的公务员。

安托万·德拉克鲁瓦主持会议。这位幕僚长身着米色亚麻夏季西装，系着浅色领带，这是为了应对气温而做出的着装调整，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与生俱来的沉稳气质。

总统在瓦加杜古的承诺？不过是一种需要应对的制约因素，仅此而已。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既营造出革命雄心的假象，又维护了现有秩序的基本平衡。

—亲爱的同事们，我们今天齐聚一堂，是为了审查本届五年任期内最重要的文化项目之一的进展情况。部长昨天提交的法案，正是总统2017年11月在瓦加杜古所作承诺的直接落实。我们正在为1815年至1972年间被非法侵

占的作品设立一个例外，打破了不可转让原则。这体现了总统希望在更加公平的基础上，重塑我们与非洲伙伴关系的愿望。

提到瓦加杜古演讲，在餐桌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每个人都记忆犹新。这不仅仅是一项行政改革，它体现了一种旨在永久性地革新法国处理国际遗产问题方式的愿景。

亨利·拉瓦内尔开始发言。这位顾问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拥有公法教师资格，他与国务委员会和总理办公室协调，负责法案的起草工作。他堪称权力精英的典范，曾在共和国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精通宪法的复杂之处。拉瓦内尔兼具法国精英阶层特有的博学与投机。对他而言，这项法案是平衡各方利益的杰作，展现了他化解矛盾的精湛技艺。即便最终结果削弱了总统承诺的实质内容，也无关紧要；关键在于论证的精妙之处。

“幕僚长先生，这项法案非同凡响。”

拉瓦内尔很喜欢这一刻。经过几个月对文本的仔细审查，与一大群一丝不苟的律师就每一个标点符号进行谈判，在经历了各方都捍卫自身利益的部际会议之后，他终于可以展示他的心血之作了。

我们选择的地理范围使我们能够处理所有与向各国归还文物相关的问题。当然，这包括我们的非洲伙伴，但也

包括所有可能声称拥有属于其国家遗产的文物的国家。埃及、希腊、意大利、整个地中海盆地……我们的方法旨在具有普适性。

他俯身看向文本。

一所选时期，即1815年至1972年，涵盖了我们历史上最具争议的领土侵占行为，从拿破仑的征服到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的生效。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现代化且有效的机制，使我们能够协调一致地处理所有国家的领土主张。

德拉克罗瓦点头表示赞同。这份提案至少在纸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它在实践中以及经受住政治压力后能否站得住脚，还有待观察。德拉克罗瓦很清楚这项法案的缺陷。它实际上造成了州与个人之间的歧视，这可能会引发轩然大波。

“您认为未来几年我们可能需要处理多少起案件？”

拉瓦内尔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们最合理的估计是，未来十年内可能会有大约五十起索赔案件，主要来自我们的非洲伙伴。贝宁、马里和塞内加尔都已表达了他们的意愿。这对我们的服务部门来说是可以处理的，尤其是在程序包括成立双边科学委员会以确保我们决定的客观性的情况下。”

五十例。这些数字让在场人士安心不少。与许多批评家预言的法国博物馆藏品被洗劫一空的末日景象截然不同，也与策展人担心藏品遭到合法掠夺的噩梦大相径庭，政府方面预计的实施将是一个有控制的方案。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可控有序。

过去八年担任奥赛博物馆馆长的凯瑟琳·杜布瓦代表了博物馆机构的立场。她曾是卢浮宫的策展人，并深度参与了改革的筹备工作，这使她拥有了代表同行发声的特殊权威。她的专业知识备受尊重，她的分析也广受重视。她真心致力于大众的艺术教育。然而，她对艺术的热爱使她对托付给她的藏品产生了近乎母性的占有欲。在她看来，归还藏品的要求是对艺术的亵渎，是对世界遗产的肢解。因此，她运用自己敏锐的智慧，为这种本质上出于保护本能的行为进行理论辩护。

“幕僚长先生，”她平静地插话道，“通过将讨论范围限定在国家索赔上，我们避免了如果采取范围更宽泛的做法可能导致的个人诉求潮水般涌来，从而保护了我们的藏品。继承人、被剥夺遗产的收藏家、社区……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打开闸门，将会造成怎样的混乱。”

杜波依斯的沉着冷静充分说明了前期准备工作的出色。策展人的意见得到了重视，他们的反对意见也被采纳。政府成功地在总统的愿景和博物馆的运营限制之间找到

了平衡点。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是数月闭门谈判的结果。

拉瓦内尔补充道：“我们还制定了强有力的保障措施。每一项请求都必须有书面记录，并有无可辩驳的证据支持。专家委员会将以严谨的态度审查每一起案件，因为这关系到案件的利害关系。”

法律事务主管让-克洛德·戈麦斯发表了讲话。他为人低调，但却是此次行动的关键人物之一。

戈麦斯是一位不愿抛头露面、更喜欢隐于幕后而非公众视野的高级官员。他精通国际法，虽然缺乏个人魅力，却拥有百科全书般的条约和公约知识。他的谨慎掩盖了他真正的远见卓识。比起他的同僚，他更能感受到他们正在构建的体系中存在的危险。但他的性格使他无法公开表达自己的疑虑，只能偶尔发出一些警告，而这些警告似乎无人理会。

“该程序还规定外交部对每一项请求进行审查。我们不能将这些文化遗产问题与更广泛的关切割裂开来。归还文物也是一项外交政策行为。”

戈麦斯的观察结果与几位参与者的担忧不谋而合。

松方案只是众多案例之一，并未被特别渲染。对法国政府而言，联合国程序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和框架，并未质疑政府行动的连贯性。两个平行世界，绝不会碰撞。

“我亲爱的同事们，”德拉克鲁瓦说道，“讨论我们的新立法与正在进行的私人诉讼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特别是非政府组织 *Retour et Restitutions* 发起的诉讼。”

人人都知道这桩案子，但谁也不愿提及。它就像一根刺，一根沙子，随时可能堵塞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

拉瓦内尔抓住了这个机会。这是他最喜欢的主题：法律的精妙之处以及不同类型诉讼之间的学术区别。

一幕僚长先生，将范围限定于国家间争端，这符合总统的承诺。他明确针对的是国家间关系和文化外交，而非私人与公共机构之间的纠纷。

凯瑟琳·杜波依斯对博物馆和媒体界了如指掌，她知道法律上的区分并不总是能经受住舆论和新闻批评的考验。她打断了拉瓦内尔的话。

“但是亨利，这种限制难道不会被视为明显的矛盾吗？如果我们承认国家享有归还的原则，为什么我们要将私人受益人排除在外？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区别对待？”这些问题触及了核心问题。实际上，这一选择掩盖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目的：限制改革的范围。

拉瓦内尔挥了挥手，不以为意这个反对意见。他已经听过这种说法几十遍了，他的回应早已熟稔于心，是在之前的准备会议上反复斟酌的。

一完全不是，凯瑟琳。国家间的纠纷属于双边关系范畴，因此需要特殊的处理方式和程序。而私人纠纷则属于其他机制和机构管辖。现有的民事诉讼程序保障了当事人的权利。法院、上诉法院、最高法院……一整套机制已经到位。

“那么，更具体地说，松方案又是怎么回事呢？”德拉克罗瓦追问道，身体微微朝拉瓦内尔倾去。

“此案正在联合国机构进行处理，”拉瓦内尔以带着安抚意味的语气回答道，“我们外交部的律师正在准备一份论据充分的辩护。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当局并未正式支持该非政府组织的行动。这充分说明了这项行动的边缘性。”

让-克洛德·戈麦斯认为有必要介入，以澄清法国的立场。

“没有官方说法，但或许有非官方的说法……”

“重点不是这个。我们别把事情搞混了，”德拉克罗瓦坚定地说，“继续，让-克劳德。”

我们已对相关程序进行了详细分析。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此事上没有约束力。其提出的任何建议都只是象征性的。我们有充分的先例来支持我们的立场。

从会议开始到结束，凯瑟琳·杜波依斯一直机械地摆弄着笔，她决定第二次发言。

“就我们博物馆而言，馆藏作品的地位保持不变。此次涉及的松方藏品中的十八件作品仍然是我们永久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会展出这些作品，也会将它们外借给合作伙伴，并继续执行我们正常的文化政策。我们无需采取紧急措施或改变我们的展览计划。”

这一声明反映了政府的思路：一切照旧。松方案？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与正在进行的改革毫无关系。

亨利·拉瓦内尔舒服地窝进了扶手椅里。

“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的立法框架不能涵盖私人，”他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的分析——相信我，我们为此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表明，如果允许私人提出索赔，可能会影响到法国所有公共收藏中的一万五千到两万件作品。”

他让这个数字产生效果后才继续前进，对自己的小小武力展示感到满意。

一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申请会如潮水般涌来，彻底淹没我们。我们原本就超负荷运转的团队会被成千上万种类型的申请压垮。俄罗斯贵族的继承人要回他们的圣像，战争期间被剥夺财产的收藏家的后代，意大利家族要回他们在拿破仑时期被没收的画作……行政管理上将会一片混乱。

凯瑟琳·杜波依斯用力地点了点头。

—更别提处理所有这些案件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每一项申请都涉及对国家、部门乃至有时是国外档案馆的大量研究。我们需要对艺术品进行详细的鉴定，以确认其真伪并记录其来源——而这需要巨额费用，包括专家费、科学分析费和差旅费。此外，还需要专门的咨询来理清错综复杂的继承、买卖和捐赠关系……预算将会飙升。而我们的策展人，本应从事他们真正的工作——研究、展览和文化推广——却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翻阅尘封的档案，去查明某某女士的祖父是否真的在1815年被盗走了他的路易十六风格的五斗橱。我们的博物馆将会变成侦探社。

亨利·拉瓦内尔对此补充道。

如果向个人敞开大门，我们的整个藏品就会笼罩在持续不断的猜疑之中。1972年以前购入的每一件作品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因为最轻微的怀疑、最微不足道的谣言而被质疑。届时，我们将无法安心地筹划展览，无法放心地将作品借出国外而不担心是否会被归还，也无法制定连贯的文化政策。简而言之，那将是一场噩梦。

“那么具体来说，财务状况如何呢？”德拉克罗瓦追问道，他既关心预算方面的问题，又暗自担忧他们的论点越来越趋于被动。

一仅处理所有潜在案件就需要数百万欧元，还不包括我们不得不归还的艺术品的市场价值。国家根本负担不起这笔开支，尤其是在当前的预算环境下。

让-克劳德·戈麦斯为影片增添了另一层含义，他怀着沉重的心情。

一更不用说向行政法院上诉、紧急程序、简易程序等风险了……任何退货或拒收的决定都可能受到相关部门的质疑。我们的法律服务将会不堪重负，瘫痪无力。

所有人都对这场荒诞的演示感到满意。政府找到了应对之策：既能履行总统的承诺，又不至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既体现了雄心壮志，又体现了务实的管理风格。但内心深处，一些参与者却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不安。

德拉克罗瓦察觉到与会者逐渐达成共识，以这种类型的活动所必需的乐观态度结束了会议。

我们很高兴找到了目标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平衡点。这项改革体现了进步和负责任的态度，既保护了公共利益，又满足了国际伙伴的期望。

他以领导者的天然权威分配任务，他知道一切都已成定局，但仍然保持着协商的形式。

亨利，你正在与议会部门密切协调，确保法案按时通过。自上次国民议会解散以来，立法议程一直很紧凑，但

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凯瑟琳，你的团队已经在为新程序做准备了。工作人员需要接受培训，信息系统需要进行调整，并且需要预先了解可能出现的初步需求。

会议在彼此的自我满足感中结束，每个人都带着完成任务的成就感离开。

接下来的几天里，庞大的行政机器以其特有的机械效率迅速运转起来。亨利·拉瓦内尔全程监督着这项行动，他一心只想确保改革的顺利实施。关于赔偿利弊的哲学辩论，关于殖民遗产的道德争论，统统都被抛诸脑后。改革必须成功，程序必须天衣无缝，期限必须按时完成。他作为一名高级公务员的职业生涯，就维系于这个项目之上。

在夜深人静之时，当行政的喧嚣让位于独自的沉思，拉瓦内尔不禁怀疑自己是否犯了错误。他在会议上曾如此精彩地捍卫的“国家与个人”的区分，在他静谧的办公室里却显得像是用来掩盖谬误的诡辩。然而，这些疑虑在清晨到来时便烟消云散，被行动的兴奋和建筑师审视自身作品时的自豪感所驱散。

他在每周例会上向同事们解释说：“关键在于要证明我们已经掌控了整个流程。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停滞不前。要循序渐进地推进，这样才能让每个人都安心。”

起初，馆长们对藏品可能迅速减少的前景感到担忧，但在得知只有各州才能提交正式索赔后，他们才恢复了平静。凯瑟琳·杜波依斯起初对法案的局限性有所顾虑，但在协调会议上，她终于不再掩饰自己的如释重负。

— 最终，我们最重要的文物不会因首批预期的归还请求而面临风险。这些请求可能涉及民族志物品、面具、祭祀雕像……当然，它们很重要，但并非核心文物。我们有能力处理这些归还事宜，而不会从根本上损害我们的公共服务使命。

分析与前期研究一致。最初的指控确实涉及非洲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是在殖民时期以往可疑的方式获得的，但并未在巴黎主要博物馆的永久藏品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布朗利河岸博物馆、奥赛博物馆和卢浮宫的藏品库中，已进行了秘密清点，以识别可能受影响的作品。结果并未发现任何令人担忧的情况。最多只有几百件藏品，均已编目、记录和估价。这是一个可控的库存，足以让国家在不清空展柜的情况下满足其需求。

在塞雷，皮埃尔·贝尔蒂埃以一位阅尽世事的老手的幽默，预料到了这场闹剧。他见证过无数肤浅的改革和失败的革命。这位教授预言，政府会选择回避，满足于对国家造成的破坏最小的要求。

他兼具敏锐的智慧和一种幻灭的厌世情怀，这在他最深刻的分析中熠熠生辉。数十年的奋斗磨砺了他，却并未使他变得愤世嫉俗。他保留了伟大理想主义者特有的能力：既能洞察人性的缺陷，又能坚定地相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他表面上的坚韧掩盖着内心深处的敏感，只有在他那如同教堂般幽静的书房里，面对着那幅《阿尔勒的卧室》的复制品，他才会允许这份敏感流露出来。皮埃尔·贝尔蒂埃就是这样一位从伤痛中汲取力量，从失望中保持清醒的人。

“我的朋友们，”他在非政府组织的月度协调会议上带着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解释道，“部长理事会最新新闻稿中公布的这项法案证实了我们从一开始就怀疑的事情。国家故意将私人个体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这实际上是在承认它认可赔偿原则……但不包括我们。这纯粹是歧视。”

维罗妮克·富尼耶像档案管理员一样一丝不苟地收集着组织的所有文件，在整理当天的新闻报道时，她不禁露出了微笑。她最初出于一种行动主义精神加入这个团队，却被权力运作的内幕深深吸引。她对政治和行政微观世界的全新视角，丰富了皮埃尔·贝尔蒂埃的分析。

——这种明显的矛盾之处恰好符合联合国程序的要求。他们将如何向人权理事会的专家解释，他们正在为各国建

立一种特殊的机制，却将私人排除在外？他们如何为这种差别待遇辩护？

负责处理案件法律方面的律师杰拉德·伦方总是会在错误的时间提出正确的问题，律师们总是倾向于把看似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 在新的立法环境下，我们的程序策略是否仍然有效？法国法律的演变是否会削弱我们的论点？

“恰恰相反，这项法案强化了我们的立场，而我们无需改变任何做法，”贝尔蒂埃回答说。“我们启动的联合国程序仍然适用，甚至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您看，国际专家懂得区分美好的意向声明和具体的执行情况。如果这项法案在议会获得通过——而它一定会通过——它将表明这确实是蓄意的歧视。同样的问题，但却是根据申请人的身份区别对待。这正是国际人权公约所谴责的。”

松方事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双方都自信地坚守着各自的立场。法国政府沾沾自喜地宣称，他们找到了在核心人道主义价值观和自身利益之间的平衡点。而皮埃尔·贝尔蒂埃及其团队则继续展开激烈的理论辩论，揭露政府政策中的矛盾和不一致之处。

通过关于向国家赔偿的法律将标志着瓦加杜古会议所作承诺的正式完成，但同时也将暴露出该法律在面对私人索赔时的内在局限性。

接下来的几周里，亨利·拉瓦内尔多次往返于内阁和波旁宫之间。议会程序注定充满风险，倒不是因为政治反对派一文本已获得广泛共识—而是因为那些急于彰显自身主导地位的议员们无疑会提出各种修正案。

拉瓦内尔担心自己的作品会受到议会的审查。他夜以继日地设想每一种可能的反对意见，准备了一系列论点来捍卫文本中的每一个标点符号。

国民议会文化事务委员会办公室里一片繁忙景象，人们像往常一样交谈着。来自吉伦特省的社会党议员、该文本的报告员西尔维·波蒂埃非常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

曾任策展人的西尔维·波蒂埃是一位亲力亲为的人。多年博物馆工作经历让她保持了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专业知识的由衷尊重。但她从政的经历也让她练就了一身本领，能够轻易发现最复杂行政体系中的漏洞。

“亨利，”她打招呼道，“我已经仔细阅读了你的文本。总的来说，写得很好。但我有一些问题可能会在会议期间提出。”

拉瓦内尔安顿了下来。

“我在听，西尔维。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首先，关于举证责任的问题。你的文本规定，请求国必须提供非法占有的证据。但是，我们如何定义这个概念？根据当时的法律，拿破仑的征服是非法的吗？殖民地扩张又该如何界定？界限在哪里？

这位议员指出了该系统的一个潜在缺陷。拉瓦内尔预料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依据当代国际标准。1954年《海牙公约》、1998年《华盛顿原则》、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这些成熟的体系使我们能够将这些概念客观化。

“第二点，”西尔维·波蒂埃毫不气馁地继续说道，“你们排除私人诉求，很好。但是，如果国家沦为私人利益的代言人，你们又该如何处理？如果一个政府明天决定正式支持某个非政府组织的诉求，你们的体系是否适用？”

这个问题很尴尬，拉瓦内尔也明白这一点。他犹豫了一下，这一点他的谈话对象也注意到了。

— 该程序包括由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每项请求的合法性。如果国家提出的请求掩盖了私人利益，将会被发现并予以制裁。

“它是如何被发现的？由谁发现的？依据什么标准？”
这位议员追问道。

拉瓦内尔感到形势正在恶化。他必须重新掌握主动权，即使这意味着发表一番关于改革精神的陈词滥调，从而搅浑水。

—西尔维，重要的是要记住这项改革的精神。我们是在文化外交的框架下开展工作，旨在弥合民族记忆。向我们表达了期望的非洲国家并非试图利用私人诉求。他们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为了重建分散的民族遗产而行动。

这场争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西尔维·波蒂埃表示同意，但有所保留。她并没有被这种伎俩蒙蔽。

—我并非反对，亨利。但我们必须预料到一些模糊不清的情况，以及可能出现的滥用行为。作为报告员，我的职责要求我预先考虑到公开会议上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反对意见。

在巴黎各大博物馆，策展人群体对这一过渡时期怀着复杂的心情。虽然排除私人诉求在很大程度上让许多人感到安心，但仍有一些人对改革的具体影响感到疑惑。

在奥赛博物馆的咖啡馆里，凯瑟琳·杜布瓦安排与一些同事进行一次非正式的工作午餐。巴黎各大机构的负责人围坐在桌旁，交流了各自的观点。

“凯瑟琳，”吉美博物馆馆长菲利普·康德苏问道，“您如何看待松方案在这种背景下的发展？联合国程序难道不会开创一个令人尴尬的先例吗？”

凯瑟琳·杜波依斯啜饮了一口咖啡，然后才回答。

“坦白说，菲利普，我并不担心。我们这十八件藏品都有详尽的记录，并已纳入我们的馆藏。它们是我们博物馆的标志性藏品。参观者了解它们，也欣赏它们。我们不存在收到赃物或来路不明的藏品的情况。”

“当然，但道德层面的论证可能很有分量，”非洲和大洋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玛丽-克莱尔·科梅拉德插话道，“如果联合国专家认可这一说法，将会给政府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这纯粹是一种象征性的施压，”凯瑟琳·杜波依斯反驳道。“我们已经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很多国家对这类禁令置若罔闻。”

卢浮宫策展人伊夫·萨洛蒙提供了一个他希望能够令人安心的观点。

一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松方是一位日本私人收藏家，而非日本政府的官方代表。他的收藏源于个人兴趣，即便这与日本向西方艺术开放的背景有关。这并非殖民掠夺。

分析结果让听众安心。松方案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使其区别于典型的非洲诉讼案件。

“然后，”凯瑟琳·杜波依斯补充道，脸上带着一丝勉强掩饰疑虑的微笑，“我们非政府组织‘物归原主’的朋友们可能高估了他们影响人们的能力。制造声势是一回事，取得实际成果又是另一回事。”

在塞雷，皮埃尔·贝尔蒂埃并没有袖手旁观。他深知，一切的关键不仅在于法律途径，更在于公众舆论，因此他精心策划了一场媒体攻势。他的通讯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维罗妮克，”他一边扫视着媒体联系人名单，一边对他的助理说，“我们需要发表一份强有力的声明。国家归还法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揭露政府虚伪的绝佳机会。”

维罗妮克·富尼耶非常擅长另类沟通，她一边查看笔记本电脑一边点头。

“我已经联系了《世界报》、《解放报》和《电视周刊》的专家。他们对改革持批判态度。在国际方面，我们在英国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的联系人也对此很感兴趣。”

这个非政府组织团队已经掌握了媒体运作的诀窍：措辞犀利的新闻稿、无可挑剔的纪录片资料、以及为电视新闻量身定制的声明。一场信息战正在初见成效。

杰拉德·伦方负责协调此次活动的欧洲部分。

我收到了欧洲议会的积极反馈。一些议员对赔偿问题很感兴趣。就此议题举行公开听证会可能会给法国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

“好主意，”贝尔蒂埃回答说。“我们需要将这场讨论欧洲化，使其更具广阔的视野。法国再也不能孤立地处理这些问题了。”

每一次媒体露面，每一次公开表态，都是旨在孤立法国立场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但这场全面攻势也开始暴露出政府战略的初步缺陷。文化部宣传部门对辩论的进展方式感到沮丧。

通讯主管玛丽·莫罗在一次紧急危机会议上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她经历过足够多的媒体风暴，深知如何识别重大危机的预警信号。

“安托万，我们在叙事一致性方面存在问题。一方面，我们赞扬我们对非洲国家的归还政策的优点；另一方面，我们坚决反对有充分证据支持的私人索赔。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在媒体上越来越难以维持。”

德拉克罗瓦让人感到安心。

“玛丽，我们的立场很稳固。”

一旦问题就在这里，安托万，普通民众无法理解这些微妙之处。对他们来说，文化补偿就是文化补偿。我们关于国家与个人地位差异的解释，在他们看来似乎晦涩难懂。

出席会议的亨利·拉瓦内尔试图为他的计划辩护。

“我们必须立场坚定。如果我们妥协，就会打开潘多拉魔盒。明天，成千上万的权利人将会来敲我们的门。这正是我们制定这项法律想要避免的。”

“但是亨利，”玛丽·莫罗反驳道，“这种非此即彼的做法对我们不利。它让我们看起来像是漠视道德问题的技术官僚。非政府组织‘物归原主’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攻击我们，不是从法律角度，而是从象征意义上。”

分析一针见血。习惯于谈判博弈的政府部门，如今却体会到了现代传播残酷的规则。在媒体环境中，即使是最有力的论点，在精心炮制的叙事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舆论战已经打响，而双方实力悬殊。政府部门自信满满地坚守法律立场，却又深陷自身矛盾之中；而非政府组织则灵活敏捷、意志坚定，完全掌握了另类传播的技巧。这场斗争对政府部门而言，比预想的要艰难得多。尽管媒体一片哗然，反对派也提出了诸多批评，但经过激

烈却在意料之中的辩论，议会最终还是通过了这项法案，并于2026年3月9日由共和国总统颁布生效。

第十一章：漫长的战役

日内瓦，万国宫，2027 年 9 月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办公室里，恼怒的情绪开始显露。自松方案正式通报法国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十个月。三十个月过去了，却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没有一份关于案件实质内容的详细意见。

主持审判的卡门·瓦斯奎兹谨慎地打量着报告员克劳斯·韦伯。在她耐心的面具下，隐藏着多年来学会掩饰的沮丧。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法官，她早已习惯了诉讼当事人拖延审判的伎俩，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端倪。但在这里，几乎完全不存在有罪不罚的情况。

“克劳斯，这是我们第六次提出催办请求。第六次！对于一个喜欢对世界指手画脚的国家来说，这可真不少。”

韦伯带着他特有的、对一切事物进行分类的狂热阅读着他的笔记，这源于他普鲁士童年时期养成的习惯——秩序成了他抵御混乱的避难所。他一丝不苟的态度掩盖着内心深处对这些拖延战术的愤怒，这些战术正将国际正义变成一场闹剧。

“你知道吗，卡门，我仔细研究了他们的所有回复。真是高明。首先，他们声称‘案情极其复杂’，多要了六个月的延期。”

然后是‘前所未有’的调查规模。又是六个月。我必须承认，他们的借口库存相当丰富。

他继续翻阅着一封封充满恶意和不诚实的信件。

“而且，注意了。突然之间，他们的内部部门不再‘足够胜任’了。他们需要‘国际知名’的外部顾问。当然，这还需要六个月的时间。过去九个月里，他们一直‘难以查阅国家档案馆的资料’。”

卡门·瓦斯奎兹发出了她特有的那种轻笑，只有在荒谬达到顶峰的时候才会发出这种笑声。

“用我们老家的话来说，就是蜗牛策略。他们显然指望的是消耗战。在他们看来，要么这案子会被人遗忘，要么媒体会对此感到厌倦。”

韦伯点了点头。人们能感受到他眼中流露出的疲惫，他目睹国际正义屡屡被现实政治所践踏。

“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强迫他们。他们可以把事情拖上好几年。”

这个承认虽然残酷，但却很现实。联合国人权保护体系就像纸老虎：外表光鲜亮丽，实则软弱无力。

巴黎，2027年11月

在奥赛码头，克莱尔·方丹精心策划了这场拖延的芭蕾。她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外交地图，这足以证明她毕生致力于优雅的回避。

她向同事们解释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尽可能拖延时间。时间是我们最好的武器。四五年后，当委员会做出决定时，没有人会记得松方了。”

负责多边文化事务的奥利维耶·勒孔特并不缺乏创造力。

“具体而言，我们已确定了八个环节，可以在不显得无理取闹的情况下申请延期。深入的专业鉴定、跨部门磋商、国务委员会的批准、欧洲磋商……每个环节都能为我们争取六到九个月的时间。”

在瓦卢瓦街的文化部，安托万·德拉克罗瓦正在使用多种拖延战术。

“我们的策展人必须承认一点：每拖延一个月，我们的藏品压力就会减轻一些。这场争论最终会平息，就像其他所有争论一样。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

凯瑟琳·杜波依斯习惯于抑制同事的热情，这次却忍不住扮演了扫兴的角色。她天生的沉着冷静，源于二十年的博物馆工作经验，这让她觉得德拉克罗瓦的乐观或许源

于盲目。她肩负着双重忠诚的重担：既忠于她所在的机构，又忠于她认为已被践踏的道德准则。

“安托万，我原则上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们并不天真。皮埃尔·贝尔蒂埃的非政府组织不会坐视不理。它肯定会做出反应，加大宣传力度。这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塞雷，2028年1月

皮埃尔·贝尔蒂埃将整份文件广泛散发给媒体，强调政府的不作为。在《世界报》，朱斯蒂娜·布歇——她凭借十年的调查性新闻工作积累了坚定的信念——正在撰写一篇将在司法部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

*“松方事件终于揭露了我们法国所谓‘高尚’文化政策的真面目。言辞慷慨，行动卑鄙。”*她愤怒地打字道，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怒火。

*费加罗报》*的措辞同样犀利，尽管包装更加精美。一位资深的国际关系专栏作家，利用其既有地位所赋予的尖锐讽刺，进行了辛辣的反讽。

“法国拒绝认真对待松方案，无异于自掘坟墓。我们的大使们向其他国家提出透明度建议，简直是自取其辱。自己在联合国都鸵鸟埋沙，又怎能高谈阔论呢？”

这些批评在热衷于激烈辩论的巴黎小知识分子圈子里引起了共鸣。在索邦大学，乔治·佩莱蒂埃教授甚至组织了一场题为“*国家面对国际机构的规避策略*”的研讨会。这个标题颇为浮夸，意在暗示各国政府在对自己有利时，非常擅长对国际机构置若罔闻。佩莱蒂埃是一位从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地缘政治分析家的人，他认为这印证了他关于资产阶级虚伪的理论。

比较国际法期刊主编海伦·法布尔教授兴致勃勃地发表了她的分析。她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女性，曾在男性主导的领域中奋斗多年才站稳脚跟，因此，当她的分析被证明富有洞见时，她格外珍惜这些时刻。

“法国的立场凸显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联合国可以随意训诫成员国，但它根本无法强迫它们合作。松方案鲜明地表明，当面对一个拒绝听从的国家时，国际法完全无能为力。”

皮埃尔·贝尔蒂埃静静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六十八岁的他，既感受到岁月的沉重，也体会到战略家眼睁睁看着计划一步步实现的满足感。他脸上深深的皱纹，见证了他一生致力于那些注定失败的事业—有时也致力于那些力挽狂澜、最终取得胜利的事业。这些经历让他内心感到平静。

“亲爱的朋友们，”他开口说道，语气中带着他特有的耐心和教学技巧，“法国当局的种种诡辩丝毫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如果他们采取不同的做法，我才会感到惊讶。而且，说实话，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固执对我们有利。”

维罗妮克·富尼耶毫不掩饰自己的困惑。她当初加入这个团队时，对正义的到来抱有幻想，但数月的斗争彻底粉碎了这些幻想。这位三十多岁、来自私营部门的干练女性，正痛苦地体会着变革的缓慢。她作为新人的急躁与这位资深活动家的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贝尔蒂埃先生，恕我直言，我不太明白您的逻辑。我们从一开始就希望尽快做出决定，他们的阻挠对我们究竟有何益处？拖得越久，我们就越有可能被遗忘。如果人们看不到实际成果，动员的势头就会减弱。”

皮埃尔·贝尔蒂埃站起身，走向那面贴满多年来报纸剪报的墙。他年纪大了，走路略微有些佝偻，但目光依然锐利如初。他从这些文献资料的积累中找到了一种档案管理员的乐趣。

“维罗妮克，仔细看看我们这场小小的斗争从一开始到现在是如何演变的，”他指着一些最能说明问题的头条新闻说。“起初，我们只能在报纸的文化版面露面，在一些无人问津的专业杂志上刊登寥寥数语。如今，文化

掠夺事件已经频频登上二十多个国家的头版头条。对于一个原本打算低调处理的案件来说，这成绩还不错，不是吗？”

他列举了几则特别引人注目的新闻标题，这些标题证明了他们事业的国际化进程正在逐步推进。从他的举止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一位战略家看到自己的策略奏效时的自豪之情。

——“法国是否在逃避责任？”、“法国政府正面临掠夺”、“松方：巴黎玩弄系统性阻挠游戏”……每拖延一个月，公众的讨论就更加激烈。

几个月来一直关注此事的杰拉德·勒方逐渐领悟到皮埃尔·贝尔蒂埃论证中的精妙之处。起初，他对这家非政府组织的做法持怀疑态度，更倾向于传统的法律途径。但随着年龄增长——他已接近五十岁——他开始接受这种建设性的批评，甚至觉得颇为有趣。

“贝尔蒂埃先生，您的意思是说，法国的阻挠正在把我们的案件变成国家掠夺的象征吗？这就是他们的计划吗？”

“没错，”贝尔蒂埃证实道。“法国政府顽固地拖延联合国的程序，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这反而增强了我们的道德权威。他们每要求一次延期，每找一个官僚借口，每被媒体曝光一次伎俩，都在摧毁我们法国外交一贯秉

持的体面形象。最终，他们的阻挠适得其反：暴露了他们的虚伪。这简直太容易了。”

当夸张的言论掩盖了现实时，维罗妮克·富尼耶有些担忧，她用一个问题将同事们拉回了现实。她的管理本能开始发挥作用了。

“贝尔蒂埃先生，具体来说，在他们系统性的阻挠下，我们还要等多久？”

贝尔蒂埃露出了无奈的表情。

“如果我实事求是地说——你知道我讨厌给人虚假的希望——我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要到2031年或2032年才能等到最终决定。”

几声沮丧的叹息在小小的聚会中回荡。贝尔蒂埃很快就用他那些老练的活动家特有的、略显恼人的智慧，把大家拉回了现实。这些老活动家见证了潮流和急躁情绪的兴衰更替。

“朋友们，这段时间不应被视为惩罚。恰恰相反！它给了我们时间巩固立场，扩大影响力。每过一年，我们的诉求就越发有力，他们那些站不住脚的论点也越发经不起推敲。”

杰拉尔·勒方特善于指出别人避而不谈的实际问题，他对此表示不满。作为一名律师，他对意识形态冲突的看法远没有那么浪漫。

“但是我们如何才能让媒体关注持续五六年呢？公众舆论不可能永远关注我们的案子。人们总会感到厌倦，这是人之常情。”

贝尔蒂埃走到电脑前。他喜欢数字，尤其当数字能证明他的正确性时。这种教授式的习惯一直伴随着他，是他多年教学生涯的遗风，那时他必须通过论证来说服他人。

“你误会了。我们的目的并非扮演娱乐者来延长演出时间。我们提起松方案只是为了引出法国和西方文化掠夺这一更大的问题。”

他打开了一份保存完好的档案，里面简直是个信息宝库。

“自从我们在联合国发起这项倡议以来，我们已经收到了93份关于其他被掠夺藏品的援助请求。93份！这些请求来自犹太家庭、纳粹迫害下的私人收藏家、非洲村庄、美洲原住民社区、亚美尼亚组织……”

松方案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维罗妮克·富尼耶开始意识到这一现象的规模，于是重新组织了语言。

“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我们打开了一个缺口，所有掠夺行为的受害者都正涌向这里？我们开创了一个先例？”

“没错，维罗妮克。松方案证明，即使是年代久远的国家掠夺行为，也是可以受到挑战的。我们已经证明，受害者有能力迫使最强大的国家对其可疑的侵占行为做出解释。”

随后的事件以令人不安的准确度证实了这些预言。松方事件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引发了一场远超法国国界的抗议运动。在英国，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协会纷纷致函，要求归还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非洲艺术品。在美国，一些部落对19世纪博物馆的几项藏品收购提出质疑，并收回了他们的圣物。

这场运动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学术界迅速将争议转化为研讨会。在哈佛大学，大卫·梅辛教授组织了一门完全致力于挑战制度性文化掠夺的当代策略的课程：

“松方案表明，严谨的论证如何能将专家之间的争论转化为一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运动。皮埃尔·贝尔蒂埃成功地将一个原本局限于专家圈内的问题政治化，并赋予其象征意义。”

在牛津大学，詹妮弗·布兰登教授从英国学派的批判视角分析了这一问题的意义。这位毕生致力于后殖民时代不平等研究的学者，在那里找到了对其理论的验证：

“此案残酷地揭露了当代西方文化政策的矛盾之处。博物馆如何能一边声称肩负教育使命，一边又保存那些已

被证实是通过掠夺手段获得的文物？松方案直接提出了我们文化机构道德合法性的问题。”

在法国，这场争论逐渐蔓延到所有文化机构，导致博物馆界出现分裂，而博物馆界历来以职业团结为纽带。一些策展人不顾上级的压力，开始勇敢地质疑一些藏品的购置。

巴黎，2029年2月

在奥赛博物馆，凯瑟琳·杜波依斯低调地组织团队进行头脑风暴，以预测未来的需求。时代精神正在转变，她意识到需要做出调整。她的管理背景赋予了她一种克制，但她的良知又驱使她保持开放的态度。

“我们必须承认，松方案引发了对我们最可疑收购项目的广泛质疑。我们必须为应对类似挑战做好准备，并建立一套连贯的原则。”

卢浮宫绘画部主任亨利·洛雷特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从文物修复的各个层级一路晋升，对藏品的完整性有着近乎偏执的执着，同时也理解其中的伦理问题。

“我们必须解决藏品来源问题，但绝不能质疑我们藏品的基本完整性。”

在卢浮宫学院，文物保护专业的学生们就松方事件的影响展开了热烈的辩论。他们从小接受后殖民主义思想的熏陶，不再认同长辈们以博物馆为中心的观点。

“我们怎么能接受在顽固地拒绝承认文物掠夺的机构工作呢？”博物馆学硕士研究生玛丽·舍瓦利埃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愤慨问道。

他的同事塞德里克·卡米莱里回答说：“我们必须区分当前的责任和过去的责任。这些作品已经成为法国八十年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你是说八十年来一直收赃物吗？”玛丽反驳道，“东西你留了很久，并不代表它就属于你。”

辩论揭示了松方事件对法国意识演变的持久影响。

塞雷，2030年3月

这位教授以一种与其国际影响力形成鲜明对比的谦逊态度来衡量他所参与发起的这场运动的规模。毕生致力于捍卫那些看似注定失败的事业，让他明白社会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的朋友们，我们已经基本实现了我们的主要目标，将敏感的赔偿问题转变为一场社会辩论，”他手里拿着一杯冷咖啡，在非政府组织的年度审查会议上宣布道。

他走向那面墙，墙上贴满了成千上万张关于世界各地文化掠夺的剪报。这些堆积如山的资料证明了一种固执，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好笑。

“看看这种演变。几乎每周都有媒体报道文化归还问题。我们让这种曾被无奈和恐吓所压制的讨论得以发声。”

维罗妮克·富尼耶掌握了统计数据，正在评估具体的后果。

“贝尔蒂埃先生，我们的网站每月访问量超过一万五千人次。而且我还没提到社交媒体，我们在那里到处都被提及。”

杰拉德·勒方特谈及未来前景时，展现出了几年前他自己都不曾有过的乐观态度。

“文化掠夺问题如今已牢牢扎根于全球民主辩论之中。西方政府再也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皮埃尔·贝尔蒂埃表示赞同，但同时也保持着对过早乐观的理性谨慎。年龄让他对来得太容易的胜利心存戒备。

“您强调我们的成功是正确的，但我们必须警惕任何沾沾自喜的行为。”

弗朗索瓦丝·马丁提出的问题自然而然地牵动了整个团队的心。她曾是一名记者，后来转行到非营利部门工作，因此仍然保持着媒体专业人士的清晰思路。

“贝尔蒂埃先生，我们如何才能在长期内保持这种势头？我们如何才能防止这场运动在取得具体成果之前就失去动力？”

“弗朗索瓦丝，我们不再需要独自一人无限期地坚持这场斗争。其他人应该在各自的领域接过火炬。这场运动的规模远超我们个人，这才是最好的结果。”

他走进书房，拿出厚厚一叠信件。他把所有东西都存档的习惯现在看来完全有道理了。

“过去六个月里，我收到了十一个在不同国家新成立的、专门致力于打击文化掠夺的协会的章程。所有这些协会都直接借鉴了我们的经验。这场运动正在走向自主，它不再需要我们也能生存下去。”

这一披露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此案从一家小型地方非政府组织的孤立斗争，演变为一场国际运动的象征和催化剂，这场运动正在永久性地改变权力平衡。

两年后，即2032年12月，皮埃尔·贝尔蒂埃终于可以露出一丝苦笑。他的分析完全正确。松方事件的争议仍然在联合国那台尘封已久的机器里停滞不前。但法国的拖延适得其反。巴黎越是拖延，这个问题就越发具有全球性。世界各地涌现出数十个效仿“物归原主”（Retour et Restitutions）模式的组织。它们拥有同样的资源，同

样的决心去追查其他掠夺行为。这场运动发展到如此规模，以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终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常设委员会。正式名称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归还”。

联合国秘书长本人也参与其中，在其年度讲话中提到了“*国际文化和解*”的必要性。这显然是在暗指受松方事件启发而兴起的运动。

塞雷，2032年12月

在弥漫着薰衣草和旧书香气的家中，皮埃尔·贝尔蒂埃虽然沉浸在道德胜利的喜悦中，却也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年复一年。但最终，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他所发起的运动将远远超越他的生命。这种前景带给他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他曾一度怀疑自己奋斗的意义。

他日益衰弱的健康状况迫使他将其最繁重的任务委托给合作者。他对这场运动的影响力依然巨大—无人敢质疑他的领导方向—但他很清楚，自己正逐渐从一名积极的参与者沦为一名象征。

“朋友们……”他在最后一次发言中对他们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

他停顿了一下，瞥了一眼从一开始就挂在他办公室墙上的梵高名画《阿尔勒的卧室》的复制品。

“所以，没错，人权理事会或许会做出对我们不利的裁决。或许我们永远无法正式赢得这场官司。但这并非重点。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启动了一项不可逆转的进程。”

在塞雷花园里，十二月的阳光依旧温暖着石头，老教授沉思着自己走过的路。法国政府无力阻止思想的转变。新的国际力量平衡已经形成。贝尔蒂埃从中找到了他年轻时理想主义时期从未奢望过的满足感。

在奥赛博物馆凉爽的空调大厅里，梵高的《阿尔勒的卧室》继续默默地诉说着它的故事。如今，它所代表的远不止是艺术的永恒之美，它更象征着正义最终得以伸张所需的耐心。

因为在争取真理的斗争中——皮埃尔·贝尔蒂埃很久以前就明白了这一点——只有坚持不懈和对时间的信念才重要。两年后，即2034年，人权理事会在多年犹豫之后终于作出裁决，实际上对法国侵犯财产权和拒绝伸张正义的行为予以制裁。然而，此事在国际媒体上却只占据了寥寥数笔。此案已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案例，其官方结论的重要性远不及它对全球态度产生的变革性影响。

皮埃尔·贝尔蒂埃已无法亲身享受他最后的胜利。一年前，他安详地在睡梦中离世，身边环绕着他的书籍和文件。在联合国谴责之后，法国陷入了困境，最终不得不进行谈判。松方藏品中的六件作品将归还日本，巴黎则保留其中最珍贵的几件，以换取丰厚的文化和经济补偿。这是一种典型的法国式妥协，虽然只部分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但却保留了国家藏品的核心部分。

西方博物馆被迫设立专门处理藏品来源问题的部门。在公众舆论和受松方精神熏陶的新一代策展人的压力下，他们制定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政策。

西方普世主义并没有消失。

但他顺应了当代对正义和尊重人民权利的诉求。松方案证明，一个人，只要身边有少数忠实的追随者，仅凭真理，就能挑战最强大的国家。争取国际文化正义的漫长斗争仍在继续，由成千上万的新斗士接力推进。

在皮埃尔·贝尔蒂埃长眠的塞雷公墓，一块纪念牌匾上镌刻着他最喜欢的格言：“真理来得慢，但终究是真理。”松方事件有力地印证了这句话的正确性。时间证明了这位加泰罗尼亚老教授的预言是正确的。

结语

这部小说现已完成，其灵感源于真实事件，但以虚构的框架呈现，展现了国家支持的文化掠夺的复杂机制以及通往修复性正义的漫长征程。它向所有像非政府组织“物归原主”（Retour et Restitutions）一样，为真相的最终胜利而勇敢奋斗的人们致敬。

本文所述的松方案表明，衡量正义的标准不仅在于获得具体的归还，更重要的是，它可能还体现在公众舆论的逐步转变上。有时，坚持不懈地提出正确的问题比立即获得答案更为重要。

愿这部小说能够激励更多人采取实际行动来维护正义，并为文化艺术领域更加公平的世界的到来做出贡献。
